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教会大学的缘起	(11)
第一节 在炮舰呼啸中传播福音	(11)
一、利玛窦来华与清廷禁教	(11)
二、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	(18)
第二节 武力征服不能代替文化认同	(25)
一、对华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25)
二、两种文化的深刻分歧	(31)
第三节 传教重心转向办大学	(38)
一、对教会教育认识的统一	(38)
二、重心在办教会大学	(41)
第二章 教会大学的概貌	(47)
第一节 教会大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47)
第二节 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经济状况 和治校方法	(56)
一、办学方针	(56)
二、组织机构	(58)
三、经济状况	(64)
四、治校方法	(70)
第三节 对几所教会大学的个案考察	(73)
一、燕京大学	(73)
二、岭南大学	(79)

三、湘雅医学院.....	(83)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大学	(90)
第一节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90)
第二节 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97)
一、收回教育权斗争的爆发	(97)
二、全国各地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01)
第三节 五卅、北伐与教会大学	(105)
一、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的教会大学	(105)
二、五卅、北伐对教会大学的影响	(109)
第四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113)
第一节 在中国民族觉醒面前的新措施	(113)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	(113)
二、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116)
第二节 农村实验区工作计划流产	(117)
一、“实验区”计划的实质	(117)
二、“实验区”计划的破产	(121)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一二·九”运动	(124)
一、燕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	(124)
二、全国各地教会大学的响应	(129)
第五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教会大学	(131)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131)
一、在战火中内迁	(131)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134)
第二节 战后从呼吁和平、民主到迎接全国解放	(139)
一、卷入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	(139)
二、迎接全国解放	(144)
第三节 大陆教会大学的消亡	(147)

一、最后的阴谋策划·····	(147)
二、教会大学的消亡·····	(149)
第六章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	(153)
第一节 正确认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 历史作用·····	(153)
第二节 西学东渐的一个载体·····	(158)
一、西方科学技术的东渐及对中国科技近代化的某些 促进作用·····	(158)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164)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东学西渐·····	(169)
第七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	(174)
第一节 教会大学世俗化、正规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	(174)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导向作用·····	(180)
一、洋务运动时期·····	(180)
二、戊戌维新时期·····	(184)
三、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	(187)
第三节 对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	(190)
一、在理、工、农、林、医、体专业设置方面的先驱作用 ·····	(190)
二、开我国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等社会教育的先河 ·····	(194)
第八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 ·····	(197)
第一节 教会大学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若干特点·····	(197)
一、办学宗旨的二重性·····	(197)
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若干特点·····	(200)
第二节 中国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涌现·····	(207)

一、一批批民族觉醒的先导者.....	(207)
二、大量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	(212)
三、两个典型人物的个案考察.....	(216)
附录 1:21 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	(225)
附录 2: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242)
后记	(244)

前 言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的对华侵略开始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对华以资本输出为主代替商品输出为主,在军事政治上则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侵略的需要,就加紧了对华的“精神输出”。他们利用天主教、基督教机构等在中国创办学校,弘扬西方“文明”,奴化中国人民的意识,培养洋奴买办,借以建立和巩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在对华实行和平渗透的“精神输出”过程中,19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居领先地位。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98人,其中美国有73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1/3以上。^①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10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这也是早期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特点。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正掀起一股向海外宣教的狂潮。从1868年到1918年,美国派往海外的传教士达8000多人,其中有2500多人来到中国,约占总数的1/3。^②这个时期,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数量上遥遥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5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58页。

领先西方诸国,而且越来越重视把教会工作大规模地转向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主要目的,他们并不讳言,概括起来有如下述:

第一,鉴于传统的福音传播方式不合中国国情,传教士的父道主义(Missionary Paternalism)更易激起中国人的反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采用办学的方式布道,可以培养一种“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的特殊人才,以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的发展方向。传教士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和富于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有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育永久特殊的贡献。”^①

第二,西方列强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用以掩盖其政治侵略目的,以培植一批能控制中国发展的“精神领袖”。1908年《日本外交时报》刊载的《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一文中说:“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情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②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那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那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

^{①②}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如果及早地注意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①

第三，西方列强通过办教会大学，对华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为逐步地“革新”中国文化，使中国民族走上“西化”、“基督教化”奠定社会基础。《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中赞扬道：“教会学校实尝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在《新教育》五卷一、二期上刊登的一篇《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中又说：“必有彻底纯洁的基督教，方足使中国彻底的受基督教化。……至教区之增加扩充，非基督教之终鹄，不过为达到大目的之一种手段。大目的盖在造成中国为一基督教民族。”^②

第四，西方列强通过教会教育，“巧妙的控制”中国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着泯灭正在日益兴起的中国革命的企图。1938年4月《基督教教育季刊》所载《基督教教育目的》一文中说：“现在的世界上，正有左右两种的革命。偏于右的是法西斯，这是属于上层阶级的革命；偏于左的是共产主义，是下层阶级的革命。……我们现在需要中间的革命。……我们先要改变我们的心，以后方能改变个人，改变社会的秩序。”^③ 直至1948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天主教召开公教教育会议，于斌主教在会上还杀气腾腾地说：“今天，我们一面要戡乱，一面还要努力于建设，天主教该领导整个社会，建设真、美、善、圣的新中国。”^④ 教会教育这个泯灭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总起来讲，西方列强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特殊目的和作用，

①②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③④ 同上书，第4—5页。

决不止于办教育本身,而是有其更深远的政治企图,归根结蒂,是为了争夺中国人心、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如1915年一位美国驻华使节盛赞美国在中国教育上的成就时说:“凡初至中国之人,有一事足以深印于其脑海中者,即美人对于中国教育之热心毅力,冀以形上形下之道,唤醒此最大多数之支那民族也。”接着,他指出在中国进行“智力投资”有一本万利的效益。“夫美人之在中国,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以狭义言,固深有裨于中国前途,特以广义言之,则美人之所得,亦正无涯量,盖助人即以助己,此固一定之理也。”^①直至全国大陆解放前夕,协和医学院美国校长顾林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美国顾问兰安生的信中还说:“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各教会大学,比用二百万美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②可见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其罪恶目的是供认不讳的。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西方在中国发展教会教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尤其是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数列强都已参战的机会,加速了在华教会教育的发展。这时教会学校净增数,美国所占比例在70%以上。特别是先后创办了一大批教会大学,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福州的华南女大、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燕京女大、协和医科大学,这16所院校,后来经过改组,成立“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3所(北京大学、

① 《美国在中国教育上之势力》,载《中华教育界》第四卷,第三期。

② 见1952年7月《新华月报》第162页。

山西大学、北洋大学),新建的私立大学也为数不多。这样,美国教会大学不仅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而且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要多,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说: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①而这些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学都向美国注册,其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而直接升入美国的州立大学或其他有关的大学、研究院,并可获得相应的学位。

帝国主义者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教育上的侵略目的,他们在旧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教育组织和机构,比如广学会(1887年,上海)、中华基督教协会(前身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华教育会”,1877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876年,上海)、在华基督教大学纽约托事部(1915年,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4年,北京)等等。这些组织和机构对教会学校起着联络、领导或支撑的作用。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得到了封建主义的大力支持。如: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告各省督抚:“外人在内地开设之学校,均无庸立案。”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公告说:“只要教会学校请求考核承认,政府以宽大为怀,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准予依照私立学校的手续办理。”^②蒋介石政权同样执行如此媚外、惧外的政策。尽管192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私立学校规程》,1927年公布了《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私立大学校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等,按这些规定,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的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会的中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等等,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20页。

^② 参考《中国教育年鉴》第一辑。

但在实行中有的照办了,有的则阳奉阴违,有的学校则受外国教会之命,以暂行停办相威胁,致使教会学校的实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为差会所控制。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早期曾发生百余次教案,遍及全国十八省。1909年在中华教育会第六届年会上就出现过中国籍教师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非宗教同盟”,继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1923年有邓中夏、恽代英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苏州会议”,通过纲领,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中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西方殖民主义者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他们调整的目的不是取消教会学校的宗教目标 and 政治意图,而是要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使“教会学校教育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即把基督教这根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更好地移植到中国来,根据中国国情的变化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去,借以巩固殖民主义的统治。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发展教会高等教育,其目的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近现代教会大学的历史也只得宣告结束。然而这种教会教育制度的消亡,决不意味着帝国主义者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危险已不复存在,相反地,面对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崛起,它们只是改变了“精神输出”的方式而已。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二)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而曲

折的。影响这过程的除政治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如文化、社会、教育等诸方面的因素。如果说我们上面讲的只是着重从政治视角来研讨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的问题，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也反映了它的基本方面；但是，在当今条件下就显得不够了。

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小。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大趋势日益明显。“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乃至宗教信仰都涵摄在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之中”。而今天“一体化”世界的形成，又是人类几千年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冲撞与融汇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当从“全球一体化”的观点出发，以更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在广阔的视野里，用多维的方法，来研究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过程，这样就有可能发现以往不曾发现甚至被忽视了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而能够突破现存的研究格局，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争取有较为新的、可以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研究成果。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试图朝这个方向作些努力。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注意了如下几点：

(一)着眼于中国近代化。西方在中国办教会大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是企图以基督精神统治中国，并为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服务；但由于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排拒（尤其是对异质精神、价值观的抵制），以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至酿成 1922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 1924 年开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到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教会大学重新建立其办学目标，逐步地转向了已为中国近代化服务。如在大学中增设了农科、工科及医学等科目，也开设了不少研究及实验中心，引进现代科技。教会大学有的也向学生灌输为社会、国家服务的精神，培养有责任的公民理想，以及鼓励学生参与农村建设和反日爱国运动等等。

这些在客观上似乎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动机与效果。恩格斯曾说：“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①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大体也是如是。西方教会是要通过办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以取代旧式士大夫，进而控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意愿演进。传教士变成教育家这一角色嬗变，不仅向中国引进了某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教会大学的大多数师生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波及全国，几乎各个教会大学都先后建立党的组织，广大师生在党的指引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这是与西方教会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三)慎重区别各种关系。西方在华兴办教会大学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不仔细地分析，往往容易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看作侵略行为。在这些来华传教士中，确有披着传教士外衣而敌视中国人民的侵略分子；也有从事教会教育而不完全赞成他们国家侵华政策的；有的虽不完全赞同他们国家的侵华政策，但有白种人的优越感；也有同情中国人民并对中国表示友好的；其中除多数来自美、英、法、德等国之外，也有来自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的。我们不仅要对决策者和一般人加以区别，就是在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中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尤其要区别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的界限，区别基督教中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界限，区别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界限。这样才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4页。

特征和历史规律。

(四)作用的两重性。教会大学从它开办时起就有宗教课和文化科学课,它既传播基督福音又传播文化科学知识。随着历史的进展,宗教课和文化科学课的比重有所改变,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教会大学先后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大学的专业从神学科、文理科、医科逐渐增设教育科、农科、法科、社会学科等,教育的内容从宗教扩大到世俗。我们既要看到教会大学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又要看到它在文化科学方面的作用。就文化科学知识来说,它既可以用来为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活动服务,又可以用来为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这不同的社会效应不仅取决于办教育者,而且还取决于受教育者。就教会大学的办教育者而言,他们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严重的挑战,引起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他们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也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有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这点上它又是外来新文化的传播者。

总之,西方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但又不能单纯从政治的视野还必须从文化学等角度来考察,才能使我们获得一种较为全面和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从而既看到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曾充当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和桥头堡,又看到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某种积极的作用,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的相当重要的位置 and 对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有过一定的历史业绩,等等。要知道,这种文化交流当时是在极不平等、不公正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帝国主义的炮舰和不平等条约充当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渗透的前锋和后盾,就中国本身来说则是处于一种被欺侮、被凌辱的局面中承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去

中国闭关锁国一个半世纪,落后了,吃了大亏。”^①又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②今天,我们的情况和过去根本不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我们吸收、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再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强制,不是被迫地,而是主动地、自觉地这样去做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多方面地研究和总结这类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动包括西方宗教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是基督教理性和世俗化进程中的产物。它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总结,也许有助于更好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第一章 教会大学的缘起

第一节 在炮舰呼啸中传播福音

一、利玛窦来华与清廷禁教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习惯上可以追溯到 7 至 9 世纪。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年），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的阿罗本携真经到长安，当时被称为景教。14 纪初期，元顺帝遣使团上书教皇请求派主教来中国传道。元代对基督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既包括早先流行的聂斯托里派，也兼指后来传入的罗马圣方济各教派，信徒人数达三、四万，但这些都是昙花一现，不曾对中国历史发生过大的影响。在两个完全相互独立发展起来的伟大文化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是明代中叶耶稣会士的来华。

1583 年（万历十一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肇庆，并建立了传教据点。以此为端倪，耶稣会士竞相来华，其间著名者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毕方济、罗雅各、利类思，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傅汛际，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瑞士传教士邓玉涵。在这些传教士中，利玛窦最为突出。这位少年时代便献身于“上帝的事业”的天主教徒，不仅对神学有深入的钻研，而且曾得到罗马神学院教授、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等名师的指教，相当广泛地涉猎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因而在他身上，既具有教士的虔

诚,又具有学者的渊博。1601年,利玛窦偕同庞迪我到达北京,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和优待,中国皇帝赐给他们房屋居住,并旨令:“所需皆由皇帝供给,每阅四月,颁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①

耶稣会士的东进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推动是分不开的。16至17世纪为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原始积累的狂潮把新兴资产阶级推进到非洲、美洲、亚洲,拉开了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殖民史的帷幕。在这场殖民扩张运动中,殖民者采取“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政策,教会作为殖民事业的重要支柱从而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这个古老富饶的东方大国自然是他们垂涎已久的。

新航路开辟以后,罗马教皇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炮舰,大肆向东方国家扩展宗教势力。为使中国成为从属于罗马教廷的一个教区,教皇在葡萄牙政府的支持下成批派出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处处呈现出一派江河日下的景象,但就国势实力而言,中国毕竟不是西方殖民势力立即就能征服得了的。面对现实,大部分耶稣会士还不敢有太大的政治企图。至于布道,由于中国文化悠久,自成体系,传统思想、风俗习惯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传教士发现也不是容易顺利进行的,因此,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采取了一些机动灵活的政策。

联系上层人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十分注意打通官场关节,取得官方支持。1581年,耶稣会派遣罗明坚、利玛窦等先打扮成商人,跟随葡萄牙商人到广州和肇庆,向地方官吏“赠送厚礼”,试探建立联系。1583年,罗明坚偕同利玛窦重至肇庆,向地方当

^① 高龙倍,《江南传教史》上编,第一卷,第十章第三节。

局再次“送礼”，从而取得进入肇庆的许可。1595年，利玛窦为上北京进谒万历帝，打开中国接受天主教的大门，到了南京。因南京不敢允留，他只得折回南昌，在临江府，与建安王结交，谈论西方交友之道，整理成《与建安王论友》（习称《交友记》），献给建安王。利玛窦的名声为之大振。其后，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以重金买通宦官马堂，得以进见万历帝，向皇帝进赠礼物，并上疏。他们带给皇帝的礼物有天主图像一幅，圣母图像两幅，天主教经典一本，珍珠镶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大小两具，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从此利玛窦等藉朝廷之支持积极开展传教活动。

打通学术界。洞悉中国内情的利玛窦深知，要使被中国人视作“旁门左道”的天主教真正植根华夏大地，最要紧的是和学术阶层联络。而打通学术界人士，使他们不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①“坦然接受并认识基多（督）圣化的价值”，^②有必要以学术为媒，借西洋科学、哲学、艺术以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为此，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学有专长的中国士人的帮助下，展开了大规模的西洋学术评介工作。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尤其是自然科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初到肇庆，就介绍数学、地理、天文等方面的知识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他在北京住了10年，曾连续译著了《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圆容较义》等图书，其中有一些是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传教，所以书中往往掺杂了不少神话。例如他在讲到天文学时就添进了基督教的地狱说，“地之中心有恶人受罚的地狱”等等。尽管当时传教士在传播科学知识时掺杂了不少反科学的东西，但还是介绍了当时欧洲的一些科学知识到中国来，对于填补中国的缺门，扩大知识面，丰富中国的

①②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地中国社会》第二册，第215页；第一册第249页。

科学文化,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当时传教士译着的科学著作,除利玛窦译介的外,还有:

熊三拔译著:《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其《农政全书》;

金尼阁著,王征译述:《奇器图说》;

邓玉涵编著:《崇禎历书》一百卷;

汤若望编著:《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法历书》等;

南怀仁译著:《神武图说》、《康熙永年历法》、《赤道南北星图》、《仪象志》、《神輿全图》、《坤輿图说》等;

白晋、张诚译:《实用几何学》;

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合绘:《皇輿全览图》。

顺应中国习俗。利玛窦等传教士很清楚地认识到,要进入中国社会,必须深切了解中国国情和民心,为此,必须顺应中国传统与习俗,改变固有传教方法。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① 利玛窦等人初入华时,着和尚袈裟,到南京后,利玛窦发现,僧侣在中国既没有象他们在欧洲那样高的声望,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且身披袈裟与中国官方和文人交往反而诸多不便,于是从 1594 年起,他改穿儒服,戴上儒冠,并自称为儒者,以优游于士大夫群中。为借助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和思想宣传天主教教义,利玛窦早在澳门时,便潜心钻研中国典籍,“按图画人物,请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编,无不尽畅其意义。”^② 由于利玛窦对中国国情有较为深切的了解,他的传教活动能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

① 柳诒徵:《中华文化史》(下),第 661 页。

② 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记》。

“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上层社会，利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① 他所改绘的世界地图，也充分迎合中国人的情绪，如许多地名都沿用中国旧图名称，使得中国人“虽欲不信不能也”。

利玛窦等不仅从传教的方式上适应中国国情，而且企图从教义内容上把天主教“中国化”。利玛窦等踏上中国的土地后，逐渐发现儒家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拥有巨大权威。他说：“儒教是中国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② “中国哲学家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③ 面对着与天主教在民族上迥然相异但又有深厚传统的儒学，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被迫进行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合儒”和“补儒”，以便天主教在中国顺利传播而不至于和儒学发生冲突。

所谓“合儒”，最核心的是从先秦儒家经典中找出与天主教相似的语句、段落，望文生义地来证明天主教和儒学是相契合的。如说儒学的“仁”等同于天主教的“爱”。利玛窦指出：“仲尼说仁，惟曰爱人。……仁也者，乃爱天主与夫爱人，”“行斯仁者，百行全备矣。”^④ 甚至认定，天主教的敬天爱人与儒学的忠孝廉节同出一辙：“惟在天主一教，……以敬天爱人为宗旨，总不外克

①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②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0 页。

③ 同上书，第 31 页。

④ 《天主实义》第七编。

己尽性忠孝廉节诸大端。”^①等等。

所谓“补儒”，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认为汉代以后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泯灭了先秦儒家“事天”的真意，需要天主教来拨乱反正，恢复儒家的真面貌；（二）孔孟先儒虽然正确，但他们的说理还不够完备，需要天主教来“补充”某些残缺不全的地方。

为使天主教移植到中国思想的土壤上来，利玛窦等传教士试图通过“合儒”和“补儒”，使天主教“儒学化”。不过，这种“儒学化”是以坚持天主教的出世思想和信仰主义的基本立场为前提的，如果说，“合儒”是以天主教的出世理想和信仰主义来诠释儒学的话，那么“补儒”就明白无误地要以以上两方面来改铸儒学。实质上也就是给天主教套上一幅儒学的假面具。

即使如此，由于利玛窦等采取了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手段，因而传教工作比前有了一定的进展。如1584年，即利玛窦来华两年后，中国天主教信徒只有3人；1596年，计有100余人；1605年约有1000余人；1610年利玛窦去世这一年约有2500人；1615年有5000人；1617年有13000人，到清朝康熙年间约达15万人。

随着天主教势力的发展，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始对天主教教士自上而下的渗透深感忧虑，并开始察觉到其来华的真实意图。一篇署日为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的条陈的作者谓传教士“……对士大夫谈，则言天性；对徒辈论，则言神术。”^②作者已意识到传教士双管齐下，一部分人致力于影响对伦理道德和欧洲科学感兴趣的上层人士，一部分人宣扬人皆可以进天国，并极言

① 《正教奉褒》上册。

② 《破邪集》卷一，第22页。

地狱之苦，以勾引平民百姓入教。一位出生在福建南部漳州的人士认为：“此夷藏奸为市忠，助统令人喜其有微功，祈禱令人疑其有神术，自鸣钟、自鸣琴、远镜物，令人眩其有奇巧。且也金多善结，礼深善诱。”^①作者接着指出，他们的秘密意图无非是要摧毁中国的所有的祭礼，所有的道德和哲学传统。士大夫对传教士的认识和呼吁不能不引起清王朝的极大惊警。

从17世纪开始，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内部发生“礼仪之争”，一部分传教士对天主教中国化提出了批评，这种意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1704年11月20日，教皇格勒门十一发布禁约七条，宣布：(1)不准以天或上帝称天主；(2)不准礼拜堂悬挂有“敬天”字样的匾额；(3)禁止基督教徒祀孔、祀祖，以之为异端；(4)禁止教徒供奉牌位在家，及“固有灵位、神主等字眼”。教皇的禁约表明，天主教传教士一反利玛窦所开创的耶稣会传教士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儒家学说的传统，无视中国根深蒂固的礼俗和社会特点，从而导致中国文化中排斥外来文化的封闭性意识的强化。这不能不反映到统治阶级的营垒中去。当多罗主教前来中国宣布教皇禁令，要求教士一体遵照执行时，康熙于1707年3月17日在苏州对孟由义等九名教士申明自己的主张：“奉旨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②对多罗，康熙则下了逐客令，交澳门总督看管。继之，康熙又派耶稣会士到教廷，要求教皇收回成命，但遭拒绝。在罗马教庭三令五申禁约，并禁止耶稣会士对礼仪问题进行任何申诉的情况下，1717年4月16日，康熙下令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

① 《邪毒实据》，载《破邪集》卷三，第33页。

②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又在嘉禾携来的教皇“禁约”教谕后面硃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 随即天主教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各省教堂或改或毁。后来，雍正、乾隆、嘉庆以至道光中年，对于传习天主教均有明文禁止。

二、用地舰轰开中国的大门

直到 19 世纪初，新教才开始传入中国，传教者首先是英国人，后来是德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分别派遣传教士到广州、澳门和临近中国的南洋群岛建立传教据点，为欧美在东方扩展殖民主义势力效劳。当时英国教会先后成立了基督教知识传播会和非洲与东方行教会等海外传教组织，到 1795 年，英国国教会与长老会公理会合作成立了伦敦传教会。这些传教组织最初都以非洲作为海外传教区，随即又进入印度开展布道活动。

早在 17 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广州和澳门设立商馆，长时期垄断着英国对华贸易。到 18 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又获得英国政府给予的鸦片专卖权，开始与年俱增地向中国非法倾销鸦片，造成大量毒品泛滥，戕害中国人民。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政府又图谋接收法国在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故 1793 年，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来华，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和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准许英国派传教士到中国自由传教等要求，但遭到乾隆帝的拒绝。

^①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 14 通后硃批。

到19世纪初,英国伦敦传教会开始策划派遣传教士直接到中国来。1804年,伦敦传教会物色到一位22岁的青年罗伯特·马礼逊,决定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他是英国殖民主义者派赴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仍不能以公开的身份从事传教活动,他隐居在广州的美国商馆里达一年之久,而后被聘为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取得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同时,他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编纂《华英字典》和翻译《圣经》的工作上,以便为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开展作准备。

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正热衷于扩大鸦片走私,攫取暴利,不可能容许英国传教士有更多的活动余地,马礼逊考虑到,为开拓在华传教事业,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求援,谋求美国方面继续同他合作,以共同打开对中国传教的局面。因为,此时的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已居各国对华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为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美国已相继设立了基督教差会,最早成立的有1810年设立的美部会(后改为公理会)、1814年设立的浸礼会差会和1820年设立的正公会、美以美会差会等。美国基督教差会意欲开辟对华传教事业,马礼逊的呼吁立即得到响应,美部会决定派裨治文来中国并同马礼逊配合。1829年10月7日,美部会给裨治文发了一封很长的“指示信”。现摘录其要点以窥其貌:

裨治文牧师亲爱的先生:公理会咨询委员会任命你为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感到这是他们指定你去担任具有巨大利益和责任的一项事业。……

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

你心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韧不拔。作为基督的一个战士，你要抱着希望，在这个成就中高兴地有你的的一份。

.....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

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

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当前拦住去路的障碍必须扫除，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我们仍然认为，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福音的影响就将在中国觉察到，虽则我们并不企求奇迹的出现，可是上帝的旨意会迅速打开一个宽敞而有效的门户。过去30年的政治革命，可作为他人的先驱，其影响将扩充到那些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政府中去。因此要抱着希望而工作。.....

由于你要去的地方范围大，利益广，你将比几乎所有的兄弟们有更多的便利，为此，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理会差会部作出完整的报告。.....①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aloman Bridgman*, 第20—27页。

以上“指示”特别提到所谓“过去 30 年的政治革命”，意指美国 19 世纪初推广的扩张政策所经历的 30 年，其间美国攫取了北美大部分土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已到海外扩张的时期了。美国企图把其影响渗入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中国政府中去，而传教士是美国向东方伸展的最理想的先遣军。这封“指示信”可以说是利用传教士到中国扫除障碍，为美国的入侵作准备工作的先遣令。

1829 年 10 月 14 日，裨治文在纽约上了船，与他同行的还有雅裨理。经过 135 天的航程，他们于 1830 年 2 月 25 日到达广州，马礼逊热情接待了他，并对他在华活动给以直接指点。继裨治文而来的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和伯驾医生，他们是 1833 年和 1834 年先后来到广州的。此外，还有一名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于 1831 年底抵达澳门。

尽管早期新教传教士为扩展传教事业多方设法，广辟门路，采用了多种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如翻译典籍、出版中文报刊杂志，举办社会慈善事业等等以进行传教，但入教者仍寥寥无几，令人失望。

1834 年，在广州的全体英侨（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封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作为后盾，由英国全权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和勒索一系列特权，对此，在华的欧美传教士也几乎完全表示赞同。这时已担任《中国丛报》编辑的裨治文并急忙为此作了论证。裨治文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①

① 《中国丛报》，1835 年 1 月，第 406—416 页。

一年之后,《中国丛报》在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武力强迫中国签订一项不平等条约。裨治文还为该文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在追述中外关系的历史后写道:

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货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只要有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3亿6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他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裨治文的[编者按语]:“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学会应该怎样对付一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的措施的鼓吹者。”^①

1836年11月,《中国丛报》全文登载了格拉斯哥东印度协会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所提的八条意见,往后成为中英不平等条约的雏形。

1840年6月,英国蓄意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这不仅代表了英美商人的意志,同时也是传教士们的迫切希望。多年来他们一直鼓吹对清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战争的结果,清政府被迫订了城下之盟,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第一批丧权辱国的条约。

《南京条约》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第一

^① 《中国丛报》,1836年2月,第441—449页。

付枷锁，它规定了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为传教士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美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通过这项条约，美国除取得英国已经获得的特权外，还规定：“合众国人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①

继美国之后，法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根据条约第 22 条，不但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医院、学校等，而且中国还承担了保护天主教堂的义务。此条款为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文化渗透奠下了一块基石。同年法使拉萼尼要求耆英奏请道光帝批准弛禁天主教，耆英只得照办。道光帝接到耆英奏本后，即在上面硃批“依议钦此”。拉萼尼得寸进尺，在获得天主教弛禁后，进而要求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道光帝步步退让，于 1846 年 2 月 20 日发布上谕，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给还天主教旧址。从此，清朝 100 多年来的“教禁”完全废止，外国侵略者又扫清了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障碍。

战争既然为对华传教事业打开了一个缺口，传教士们便蜂拥而入。撤离南洋或澳门的传教基地者这时又纷纷往香港及五处通商口岸传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他们在中国已陆续建立了 200 多个传教据点。

根据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及清政府当时的声明，清王朝实行教禁解冻和传教宽容政策，并不允许教士们进入内地传教。清廷规定，传教士“只于五口通商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即便在口岸范围内传教，也必须是“以早出晚归为限，不准在外过夜为断”。对于限制自由进入内地的规定，不仅传教士心怀不满，

^① 转引自陈景善：《中国近代教育史》，第 46 页。

西方各国政府更加仇视。为了取得深入中国内地的特权，以英法为首的侵略者在设法寻找战争借口，酝酿发动新的战争。这时，传教士不顾清廷禁令，潜入内地传教，据王先谦的《东华续录》等史书记载，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起，到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这15年间，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违反条例规定，非法潜入中国内地的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美国、西班牙、德国等7国的52名传教士，而此前早已潜入内地的数十人尚未计算在内。传教士在潜入内地的活动过程中，常受到来自民众甚至是地方当局的抵制和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基督教在华的地位与态势得到根本改变，简而言之，具有以下几项特色：

（一）依据条约，各国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各省传教，不必局限于以前的五处通商口岸。

（二）传教士由于本身具有各该国国民的身份而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各国教士的行动、言论免受中国法权的统辖。

（三）各国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四）依据条约，不仅中国政府对于基督教应“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对于籍居中国的教民亦“毋得骚扰”或“欺侮凌辱”。

（五）中国政府退还清初禁教期间所没收的教产。

有了条约的庇护，外国传教士便可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各个角落。

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的活动还稍加“敛戢”的话，那么在1860年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既有在内地置产租房的条约规定，又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0余年间，基督教新教在中国获得进一步发展，更多的英美传教士在新的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进入中国各地。据统计，外国在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

1858年仅有81人,1864年即增至189人,到1874年则更多达436人,在十几年里,教士人数就增加将近5倍。在这400多人中,以美国教士最多,占48%;英国居第二位,占44.5%;再次为德国,占7.5%。1860年后,天主教在华设立了澳门、南京、北京三个主教区,有的省分为几个教区,而耶稣教南京教区,就下辖10余个主教区,传教士和教徒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第二节 武力征服不能代替文化认同

一、对华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鸦片战争为基督福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播福音作为巨大的原动力驱使着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1894年美国学生国外志愿传教运动大会的记录中记下了下面具有典型性的话:

我为什么去中国?……原因之一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每个月都有100万人在不信仰上帝的状态中死亡,你们能想象一个人这样死去吗?你能想象吗?……另一个理由是因为中国生活着3亿不信仰上帝的人。啊,兄弟姐妹们,你们想到过不论是对将来还是对现在都没有一点希望的生活吗?①

这种观点在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中颇为流行。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分为受罚和得救两部分,只有带着上帝恩典的福音传播者才能拯救站在地狱边缘的千百万异教徒。而中国生活着

① 巴乐满,《我发现东方》,纽约,1935年版,第12页。参见杰西·格·卢茨著,曾钰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9页。

3亿多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因此有必要采取向“河中洒种”的边缘战略,也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向中国散发福音书和在街头布道,以吸引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入教。这种直接布道的方法在19世纪下半叶,被在华传教士普遍采用。英国传教士杨格非是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堪为“街头传教士”的典型。他于1855年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抵达上海,第二年他即单独传教,不但到上海县城,还跑到禁止外国人去的松江县、青浦县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格非又沿江到达汉口,在那里建立传教基地。随之,他打算到武昌开辟据点,他认为在武昌立足,就等于立足于湖北全省。但武昌是省会,并不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能在武昌建立教堂。杨格非对英国驻汉口领事提出这个计划,请求英国领事向武昌清朝官员施加压力。经交涉,杨格非终于在武昌租到土地,汉口外国商人捐助了500英镑给杨格非。就这样,外交官、传教士和洋商三位一体联合行动互相支持,取得了条约以外的特权。杨格非开始在武昌建立传教据点并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他在中国活动了20年以后,1885年,他总结道:“我似乎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中国爬行,夺取的欲望很多,而达到的目的却甚少。”^①可见他的传教活动并不成功。后来,他还计划向西至四川,向南至湖南等省扩张,也未能成行。

讲经布道、散发福音书、发展教徒,占据了早期西方传教士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对于建立学校、医院、出版机构等世俗性活动,他们既无暇顾及也毫不热心。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既然战争为他们打开了中国人接受上帝的通道,不平等条约为他们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无限的前景,只需采用宣讲福音直接传教的手段,就可以使中国“一夜之间皈依基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p. 391

传教士已不大采用马礼逊时代即已开始的用教育等间接方法影响中国的方式。教育活动虽然也间或地采用,但只是个别传教士的副业,或者纯粹是宗教活动的补充。例如,1864年入华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早年是一位虔诚的布道师,他到登州后不到半年就开办登州文会馆,但那主要是为妻子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他本人在70年代以前一直忙于巡回布道,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他靠骑驴和步行走了20000多公里的路程,几乎访遍了山东所有地方。每到一地,他都要向当地群众宣讲福音,发给各种宗教小册子。在旅行布道过程中,他还注意调查了解山东的幅员、人口、气候、物产等,向美国差会总部报告。他在一份给差会的报告中说:“山东省比我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还要大三分之一,居民有3000万之众。……我要大声疾呼:让长老会攻打这个省份。在过去的时代里,中国的宗教与政治都是由山东而出,在将来它要把基督教给中国。”^①同时,他在报告中也谈到当时山东“风气未开,人多怀疑”,更兼基督教教义在许多地方与中国传统习惯不合,故入教者寥寥,传教工作进展缓慢。在他的日记中也多处记载外国传教士遭到山东人民抵制、敌视以至发生冲突的情况。他还谈到自己平时总是手枪不离身,“晚上睡觉时也是如此”。^②有两次他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就是用手枪来威吓群众才得以脱身的。传教士谢卫楼的经历也很相似,他于1869年受美国公理会的派遣来到华北通州,他刚来乍到就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协助传教,在通州和城外的几个分堂实习讲道,并在潞河男塾教一些课。他在通州活动了七、八年之后,传教效果不佳,入教者甚少。

19世纪,摆在传教士面前的严酷现实是:一方面,传教士狂

^{①②} 参见 D. W. Fisher: C. W. Mateer. 弗氏著《狄考文》。

热地要求扩展对华传教事业,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基督教采取的态度是置之不理,漠然处之。美以美会入华10年后才发展了它的第一名教徒,公理会传教士1847年进入福州,1856年才有第一位信教者。广州本是一直与西方世界有联系的口岸城市,传教士在这里办了报纸、学校,由传教士伯驾开办的新豆栏医院也一直人满为患,但直到1874年即第一位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此传教17年之后,才有了基督徒。从《南京条约》后,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20年,教徒仅有1000人;从《天津条约》后,他们大肆进入内地活动,但直到70年代初,教徒人数也未突破10000大关。传教活动的劳而无功,使一些传教士感到十分懊恼。1856年,杨格非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谈到了他在中国传教的困难:“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过的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吃什么?我们将喝什么?或是我们拿什么来蔽体?他们留心听道,听了以后说,很好。但只到此为止。”^①另一位传教士对当时布道的效果作了这样的描述:教堂往往设在街边,听众寥寥,多时只是传教士的助手和佣人。传教士在街头邀请路人进堂听道,但敢于进堂的人不多,即使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来看洋人奇怪的蓝眼睛和高鼻子的,或是来听听外国人奇怪的口音。对外国人传播的福音感兴趣的人当然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在传教士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没有兴趣了。有些传教士发现中国人很看重书籍,因此就采取了发宗教宣传小册子的办法来吸引听众。这些小册子常常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有时,要书的人是如此之多,传教士只得向空中抛掷小册子让大家去抢,看谁能拿到本子。不幸的是,传教士常常发现,他们所发的宗教小册子被当作废纸去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p. 57

卖,或用来包东西和做鞋底。^①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早期传教士更多的采用“施医”和“办教育”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尤其是以办教育当作主要的辅助手段。因为宣讲福音很难找到听众,有些传教士便从街道上收容一批衣衫褴褛的穷孩子或乞丐,安排他们的食宿,教他们识字读经,这样便有了固定的听众,因而也就出现了最初时期的教会学校。这种教会学校只能是传教活动的副产品,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论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开办的,学校的主课就是宗教。天主教办的学校里强迫学生读《教义问答》(或《教会问答》),内容是讲述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规;基督教办的学校里学生要读《圣经》,主要选读其中有关的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教义,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此外他们还强迫学生参加弥撒或做礼拜以及其他各种宗教集会,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考核,让他们接受洗礼入教。传教士通过宗教课和宗教活动严格控制学生的思想,若有越轨活动,轻的则处以体罚,停止领圣餐或不给饭吃,重的则开除教籍、开除学籍和追回学杂费。天主教小学主要属于教理学校性质,让学生背诵教理和教规,除礼拜天参加教堂弥撒外,早晚都要做功课,不是做学校的作业,而是参与宗教仪式,忏悔和祈祷,整天沉浸于宗教气氛之中。

由于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质和它所追求的教育目标,生源越来越成问题。如前所述,学生主要来自穷苦人家或与教会有联系的家庭,很难招到官宦家庭的子弟。而且,学校尽管采取免费入学,并提供食宿等办法,但进校学生仍然不多,中途退学的也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学生。

中国官绅家庭不让孩子进教会学校,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

^① 香便士:《十字架与龙》,第2版,纽约,1885年,第249页。

敌视基督教，而且因为学校完全不符合中国的教育目标。中国传统教育偏重科举，而教会学校所能提供的经典教学未能使学生达到应付科举考试的水平，它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常常不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言文。教会学校不但不培养学生正统的观念，反而宣扬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分歧的宗教教义。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获得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知识，以及向学生灌输传统的思想，而传教士则念念不忘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基督教性质，他们几乎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表示尊重。这当然是中国官绅所不能容忍的。既然招不到上层家庭的子女，传教士只得依靠主要地从街上招收乞丐或穷孩子，以充实学校；即使采取这种免费入学的办法，学校仍难招到学生，而且流失率很高。1844年，阿尔德赛在宁波创办的中西女塾不单供给衣食，还给学生家长津贴，以弥补其女儿不在家帮助家务的损失。但报名入学者依然寥寥无几，有的即便入了学，隔数日又因恐惧而逃回家去了。入学人数增加得比较缓慢，还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和外国人结交，而且许多人认为传教士免费办学必定动机不良。学校发生的几次传染病，似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只有在教学之外，还供给衣、食、住和医药费的情况下，传教士才使一些家庭把他们的女儿送到学校读书。登州蒙养学堂的流失现象也很严重，学生往往不满学习年限就逃亡或被家长“无故领回”。为了保证学生中途不退学不逃跑，许多学校采取订立契约的办法；按照契约，家长同意子弟在学校学习一定的年限或学到毕业，如果在规定时间以前家长要学生离校，那么家长必须付清其子女在学习期间的伙食费。这种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就总的情况来看，教会学校依然不景气，仍然门庭冷落。据《文会馆志》载：自1864年至1872年“计设学九载，教习5员，共收生徒85名，而学满6年仅4人。”还有一些学校因中国人的敌视

而不得不停办,如卢公明牧师在福州开办的一所男校,1853年当中国教师的一位亲戚因与福州传教士合作而被捕入狱的消息传来后,教师和家长因恐被看作是参与传教士活动而变得谨慎起来,以致学校不得不关闭。虽然卢公明不久又开办了另一所学校,但即使是免费供给伙食和教育,学校仍难以招到有才能的学生,因此,到1859年,他放弃了办学计划。

二、两种文化的深刻分歧

中国自从汉武帝执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以儒家经籍为基础的旧礼教旧思想,长期以来被历代封建王朝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因此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要人们改奉外国来的上帝是极端困难的。早期天主教传教士被殖民主义者派遣来华的目的本是要“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对中国发动“精神战争”,但却遇到了孔夫子挡住了路。他们发觉如果要在中国获得立足之地,就必须利用儒家经典并作出一些妥协,于是利玛窦等传教士进行了天主教“儒学化”的尝试,虽曾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像谢和耐所评论的:广大中国的士子学人“最初曾把传教士看作反佛教的先锋和孔子的崇拜者,他们记取传教士的教诲尤其是与中国传统貌似一致的地方。伴随着他们进一步了解天主教教义的内容,和当他们幡然领悟传教士的终极目的时,他们的态度变了。”^①到清代中叶天主教已是音沉响绝。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的遭遇?其深层的内在的也是最本质的原因则是因为中国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同西方基督教教义这两种文化形态存在深刻的分歧:

^① 谢和耐:《中国文化和基督教的冲撞》,剑桥,1986年版,第43页。

(一)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基督教作为宗教,和其它宗教一样,也要划分出此岸和彼岸两重世界。这就是它所虚构的天堂地狱的神话。在这一神话里,人们信奉上帝,皈依耶稣,行善禁欲,并不能立时使人脱离现实的苦难,而是身后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在来世得救。理想的乐土是在彼岸世界,而不是现实的尘世。它又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英国伦敦会的中国籍助手梁发在他执笔撰写的由马礼逊修改定稿的《劝世良言》里说:“世间万国之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神天上帝不过如父母爱子女一般,无所不致。”^①

儒学则不然。儒学的核心内容即所谓的“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的人格理想;“外王”就是以尧舜时代为最高的理想。“外王”之功业自然不是彼岸世界的,“内圣”同样如此。成圣成贤就是践履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正是现实世界中的。纲常名教的实质是维护君权、父权、夫权,因此践履纲常名教以屈从在上者的权威为前提,这同基督教依赖上帝的权威到达天堂有共同点。但儒学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德性是在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伦理关系中形成和完善的,无须到彼岸世界去寻求解脱。所以儒学以为人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理想。这不仅构成“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基督教的“三原罪说”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与儒学的“三纲五常”的尖锐对立,并对其构成严重威胁。由于三纲五常等观念在千百年来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维持着封建帝王的统治秩序,使封建社会赖以生存和运转,对它的破坏,意味着对封建权力结构的破坏。基督教因此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安定的邪教,而遭到整个封建势

^①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71页。

力及其控制的社会的反抗。

(二)理性与信仰的对立。基督教作为宗教,以信仰主义为基础。西方传教士强调首要的是确立对基督教的绝对信仰,认为灵魂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崇拜上帝,入教者必须深信所奉之圣教为至真至实至善至公之教,其它的宗教学说均为最邪最恶最私之妄说。从这种信仰主义出发,传教士希望中国人放弃对祖宗的崇拜,而信仰世界上唯一的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上帝,并参加崇拜仪式。

而儒学的主流恰恰是理性主义。孔子贵仁而且将“仁”和“智”并举,所以孟子说他是仁且智。在孔子看来,“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没有对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自觉的仁德。这是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同时,孔子以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作为行“仁”之方,也包含着以理性原则为前提,即肯定人同此心,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判断是非、善恶,于是才有“能近取譬”。以后孟子发展了这种理性精神,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理性,舜把理性充分发挥了,所以能明察万物以及人伦关系,从而能自觉地“由仁义行”,而不是自发行“仁义”。这里强调的依然是:人的道德行为是以理性认识为前提的。由孔孟奠定的这种理性主义是儒学的主流。

基督教的信仰主义贬抑理性,这就不能不和有着深厚理性主义传统的儒学发生抵牾,西方传教士发现,由于儒家理性主义的长期熏陶而形成的实用理性的思维品格,中国人普遍地喜欢折衷和综合,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调和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中国的仕宦学者普遍存在着信仰调和主义倾向,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等。可以说,在中国并没有坚定的、完全的、纯粹的宗教信仰,没有像基督教经典中所明白确定的信条。在中国,宗教信仰不过是一种散漫的联系,信仰里面

包含着否定的成份,比之肯定的成份略少一些。除了一般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僧侣、道士以外,没有人真正信奉佛教或道教,有之,则是由于恐惧或诱导而予以敬奉。看来,中国人是无法接受基督教对上帝和来世的执着和痴迷的。

(三)祭祖祀孔与基督教宗教仪式的冲突。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祭祀孔子、崇拜祖先的传统。祖先崇拜不只是表示尊敬祖先和祈求保护,也表示家族中内聚力和“慎终追远”的孝思。在一个同姓的村落中,一般有一个祠堂,祠堂的神龛上摆了许多祖先的牌位,春秋祭礼在那里举行。这就是内聚力和孝思的象征。传统中国社会的祖先崇拜,表现了中国人有着以过去为取向的崇古心理,而表达对祖先孝思的办法是举行宗教仪式,而不是表现为宗教的狂热。

多神是中国传统宗教思想的另一个方面。不管是神性人物、自然神或鬼怪,中国人都相信它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人力无法克服的,只有祈祷。这些神,以天为主宰,其下有日、月、山川、关圣帝、道德君、妈祖、佛祖等等各种各样的大小神圣,人们加以敬奉只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达到特定的目的。

把祖先崇拜和泛神崇拜结合起来,是中国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体现这一特色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神龛上的“天地君亲师位”,这个牌位不但说明了社会中的阶层关系,而且说明了阶层中的人际关系。神牌的供奉对中国的家庭、社会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诅咒它将危及一切;而基督教来华的目的在于摧毁中国的祀孔祭祖的传统,使中国改信唯一的真神——上帝,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基督教男女教徒混合做礼拜,这简直是对传统文化的明显的挑战,不能不遭到中国民众的普遍反抗。

由此可见,基督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价值系统,

它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融入了资本主义文化因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具有封建社会特性的文化系统,它与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并形成一套封闭的价值观念和独特的风俗礼仪,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价值观一旦接触,必然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但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首先视中国传统思想为异端,必欲取而代之,进而借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特别是不平等条约的有关条款,以求实现中国皈依基督的目的,这就使得东西文化冲突往往采用政治的手段,以至暴力的方式。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加剧了中国人对洋教的反感。武力的征服没能代替文化的顺从,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并没有因国门的开放而放弃对基督教思想的抵抗。

中西文化的矛盾和隔阂,给基督教宣教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时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他们一方面以为可以凭借大炮和不平等条约,用西方的上帝来“开导这个半开化的异教国家”,来征讨这个“自古以来被魔鬼占领的在地球上最顽固的堡垒”;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一般采取漠视的态度,对于入教的教徒,严厉禁止其祭祀天地祖宗。传教士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更采取敌视的态度,公然宣称要“把儒教这个梦魇去除掉”。另一方面又抱着白种人的优越感,自命不凡地把传教活动视作“白人的责任”。杨格非说得非常坦率,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说:“难道我们不是比他们(中国人)优越得多吗?我们不是更雄伟、更聪明、更灵巧、更人道、更文明?不仅如此,我们不论在哪一方面,不是

比他们更有价值吗？”^①他们把中华民族归入没有“文明教化”的“劣等民族”，说中国人是什么“骄傲、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愚昧、偏见”的人民。^②号称《万国公法》专家的丁韪良，在他编写的《邦交提要》中，竟明目张胆地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辩护，胡说什么：“公法”只能保护“有化之国，自强之国”，许多东方无“教化”的民族，“内政不修，外交不明，营私舞弊，气象愁惨……”，已经“不得为国”，所以可以把它们“覆宗绝嗣”加以毁灭。^③当时著名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还把不信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种巨大的罪过；如果中国人民坚持不信，则“奉教之国”、“文明之邦”就可以本着耶稣的“爱人如己”、“己所欲施于人”的金科玉律，对“高抗不从者，则必从而罚之，如兴师问罪，务使归化而后已”。^④丁韪良声称，中国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用大炮送来的文明才能进入世界文明国之列。对这种无视中国固有文化、依托国际侵略势力的宣教事业，连“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1932年调查中国教育时，也不得不承认：“初起的宣教事业，是一种含战争意味的慈善事业。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救法，所以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当敬拜耶稣。”^⑤

在中国国门洞开，带着上帝恩典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拯救他们认为~~是~~站在地狱边缘的东方异教徒时，中国人仍然轻蔑地称呼他们为“夷人”，并信守孟子的格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在这两种文化形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不畏强暴、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T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p. 254.

② 林乐知：《治安新策》。

③ 《邦交提要》，1904年版，下册，第26页。

④ 《自西组东》，第4卷，第50章，第22页。

⑤ 徐宝谦等译：《宣教事业平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1—32页。

不怕牺牲、对西方列强用传教士作为侵略的先锋力量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近代中国,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群众反洋教斗争频频发生,此伏彼起,遍及全国各地。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就发生大小教案五六百起,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反洋教斗争中,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清楚地认识到了,要泯灭人民的反抗意志,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就必须首先解除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声抵抗。也就是说,只有同儒家思想进行妥协,并加以利用和改造,才能从中国上层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打开突破口,通过他们去影响老百姓。为此,在华传教士开始改变传统的“向河中洒种”的边缘战略,把工作重点转向教育,正如一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所说:“宣教为主,教育为次。在原则上我们承认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忠实地努力贯彻,但是理论有时需要修正,当上帝召唤我们转向新的途径时,囿于陈腐的观念而不听从上帝的旨意,也是对上帝的不忠诚。”狄考文、谢卫楼等传教士是自觉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狄考文在旅行布道活动受挫后,及时调整工作重点,用教育推动传教。对于他的转变,《文会馆志》曾这样记载道:“先生莅临登州时,其它传道于中国者,惟赖一己之口舌。……而先生窃思一人之能几何,偌大之中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复结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可见,狄考文所倡导的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对国情、中西文化差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随着传教重心由文化对抗转向教育,19世纪最后20年,教会学校急剧发展,许多学校增设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提高了教学水平,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大学班级。教会大学在萌芽之

中,其中较著名的有 1879 年由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合并的圣约翰书院,后来形成了圣约翰大学;1881 年林乐知在上海开办的中西书院,后来形成了东吴大学;1889 年在广州开设的格致书院,后来形成了岭南大学;1890 年,汇文大学宣告成立,它有除一所预备学校和一所工业学校以外的三个组成部分:文理学院、韦斯理学院和医学院,1892 年毕业第一批共 5 名学生;1897 年杭州育英义塾改名为育英书院,后来成为之江大学的前身。这些学校不再免费招收穷孩子,而是通过开设英语、西学等课程尽力吸收买办、官僚子弟或其它富家子弟并收取较高的学费,这是传教士改变传教策略在教会学校招生上的体现。招收上层人士子弟被认为是突破官绅防线的重要手段。在教学内容上,这些学校开始了从“耶稣或孔子”到“耶稣加孔子”的转变,从二者的对立变为两者的糅合。也就是说,要把基督教教义同儒学思想中有利于基督教发展的东西结合起来,把奴化思想同封建旧礼教思想结合起来,再次地试图把基督教儒学化,以求得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并进而使中国基督教化。

第三节 传教重心转向办大学

一、对教会教育认识的统一

19 世纪来华的每一位传教士几乎都是希望来中国传福音的。但中国的国情促使一部分传教士从单纯地“拯救个人灵魂”转而兴办教育。可以说,这一转变是由于直接的传经布道没有出路时而采取的变通办法。

虽然为了传教的需要办学,但是在教会内部还存在着相当

大的意见分歧。在教会学校的初创阶段，绝大部分传教士对教会办学持否定态度。直到19世纪70年代，许多传教士仍然认为，传教士应该用全部的精神去传播福音，尽快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华民族迅速皈依基督教，并对教会学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皈依基督教感到很不称心。有些传教士甚至认为，传教士花时间教授科学和数学等一些世俗课程，是对神职的背叛，传教士只能把传教经费用于传播福音，没有权利利用这些钱去从事像教育这样的非宗教活动，尤其不应该的是用教徒们奉献的钱来教中国经书。在有些传教士看来，圣经与这些异教著作是不相容的，因为正是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还有人认为，皈依基督教只能靠信仰，而不能依靠知识；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经典的教授将使中国人更不愿意接受基督教教义，通过办学来传教，进展太缓，吸收不了几个信徒。有许多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并没有参加教会工作，而是去通商口岸找赚钱的门路，并且大肆纵欲等等。关于教会应否办学的问题，1860年英国利物浦国际传教士会议和1877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新教传教士大会上都有比较激烈的争论。当时对传教士用教会的经费去办学的指责是很强烈的，他们责难：办了学校，到底基督在人们心灵中的影响有多大呢？

在1877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为了回答对教会办学的种种攻击和责难，向大会宣读了他的长篇论文——《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阐明了教会办学的合理性，还提出了创办高等教育的思想。

狄考文批评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在此以前，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育，都是中等以下程度的学校，其作用只限于让入学的学生读圣经和学习一些基督教教义，

这仅仅是一项训练教民的工作。他认为传教士工作如同军队一样，“军队作战的目的不只是尽量多地杀伤和俘虏敌人，同时它是要战胜敌人的。……教会也是这样，它的目的不只是尽量多地感化个别人使他们成为信徒，同时它还要使万国归顺基督，摧毁异教的堡垒，破坏各种支持异教的异端邪说，解放异教徒使他们服从救世主。”^① 因此，他呼吁扭转错误倾向，发展教会教育，提高教会学校的层次。

为了说明教育作为传教工作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性，狄考文认为基督教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天生的亲和力，这使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出使异邦，凡是教会为推翻异教信仰所需要的一切活动都是它的工作”。这里面就包括了教育，教育是影响人心的方式，通过它可以“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结构中去”，“使中国基督教化”。^②

在论及教会办学宗旨时，狄考文指出：“开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要对学生进行智力的、道德的与宗教的教育，不仅使他们皈依上帝，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帝后能成为上帝手中得力的代理人，以捍卫和促进真理的事业。”他又说：“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中国）涌来，……如果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提高就将落入基督教的敌人手中，被他们作为用来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如果科学不是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传教士是最好的人选，……最适于培养和教育从事上述

^{①②}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

工作所需要的人才。”^① 在这里,狄考文把教会办学的目的说得十分透彻了,而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决不应排斥科学知识,因为科学在传教、控制中国的改革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该看到,狄考文肯定教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是从传教的角度出发的。在传教和教育的关系上,狄考文承认了教育的附属性质。他说:“教育作为教会的一个机构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教育不可能代替传教,传教第一位是无可争议的。”^②

狄考文关于教会教育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的关于教会应该办学的基本观点得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拥护,他对高等教育的提倡及开设西学课程的主张却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有些人仍然认为过分强调教育事业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有些人反对传授西方世俗科学知识,这种观点在大会上明显地占着上风,持这种观点的传教士认为世俗的西学课程会使中国青年更难接近基督。尽管这样,大会还是决定由新教在华各教派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实际上是对教会办学的默认,标志着传教士对教会教育的认识迈出了第一步。狄考文关于教会教育的思想已成为这一时期传教士教育工作者论证教育工作必要性的理论依据,也为日后教会转向高等教育领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重心在办教会大学

7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到1890年,教会学校总数骤增至2000所左右,很多学校还提高了层次。但关

^{①②}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

于教会办学的争论并未因此结束,随着学校数量的增加,程度的提高,传教士已不再讨论教会应否办学的问题,而是转向辩论教育的目标与学校的种类。

有一部分传教士对教会举办高等教育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他们并不反对教会办初级学校。他们认为办学校可以为传教士传福音提供固定的听众,吸收一批学生入教,并且还可以通过学校训练一批中国助手以传播福音。但是他们又认为办学校只能充作传教的辅助,学校的任务就是向儿童传授基督教教义,因为教会儿童读完主要的基督教书籍只须三四年时间,所以只要办初等学校就可以了,最多到中学也就足够了,何必办大学呢?狄考文、谢卫楼、福勒、施约翰、林乐知等是积极倡导创办大学的著名传教士,他们在19世纪晚期越来越倾向于把教会工作的重点转向办大学。他们认为宗教与文化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西方的政治机构、科学和文学即使不是基督教的产物也是依赖于基督教的。向中国传福音就是输入西方文明。中国有着自己悠久而复杂的文化遗产,在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社会中的中国教徒的处境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的教徒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信仰很容易为异教徒的影响所冲淡,以至信仰动摇。因此,提高教徒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巩固信仰,有利于排除异端邪说,有利于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为此有必要加深而不是加宽他们的教育工作。可以看出这两种意见是有着高低之分、远近之别的。前者只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考虑教育,后者则是从中国基督教化的长远目标来考虑的,他们把教育当作使中国基督教化的重要手段。1877年,施约翰写信给波特,说明他创办圣约翰大学的缘由时说:“中国的三个宗教派别:佛教、道教和儒教同错误的历史、错误的科学、错误的地理、错误的年代学、错误的哲学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些

谬误都被说成是具有某种神学基础。……通过传授真实的历史、年代学、地理、哲学等等，现代的科学和文学必然会取代这些谬误。谬误一旦清除，……他们现在所吹嘘的宗教必然会倾覆。”^①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宗教支撑着中国的教育，改变中国的教育，便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宗教，广泛地传播西学知识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

为使中国皈依基督，许多传教士转向高等教育领域。然而，他们在办什么大学招什么学生等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却不尽一致。狄考文、谢卫楼等保守型传教士教育家从培养教会学校教师和教会工作人员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些人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中坚力量，要造就这些人只能从长期与基督教有联系的学生中长期培养，这样的人才是可靠的，所以他们认为教会大学主要是接收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教徒的子女和未来的教会工作人员。对于这种作法，不少传教士教育工作者表示了不同意见。林乐知认为教会大学只招收与教会有关的穷苦人家的子弟是错误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中国要不断地为乞丐开办义务学校呢？倘若让富有的和聪明的中国人先得到上帝之道，再由他们去广泛地宣传福音，我们岂不是可以少花人力物力，而在中国人当中无止境地发挥力量和影响吗？”^②福勒和施约瑟也认为，教会大学应为两个目的服务：“首先为中国的基督教工作人员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次帮助基督教圈子以外的中国人获得西学的好处和接受基督教的影响”^③因此他们主持的大学不但招收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学生，而且通过教授英语、科学及其

① 施约翰给波特的信，1877年。转引自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7—18页。

② 参见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8页。

③ KWANG—CHING LUI: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他学科在内的多种课程,尽力吸引上等阶层子女,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扩大教会影响。在这一类开放型传教士看来,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或他们对基督教的友好态度将能对其它阶级皈依基督教产生强烈的影响。只要上层人士信了基督教,整个中国就会接受福音了,因而教会大学应尽量吸收中国上层非基督教家庭的子女。

为统一传教士在办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促进各教派之间的合作,第二次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于1890年在上海召开。此次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是教育的目标和种类。经过广泛的讨论和交换意见,传教士在办学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为基督征服中国,教会应该创办学校,尤其要重点创办教会大学。

谢卫楼曾在1877年的上海会议上反对教会学校开设除神学以外的西学课程,后来逐渐更新了观念。他在1890年2月北京传教士协会和同年5月上海传教士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了他对教会教育作为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人认识西方的上帝,只有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国家带来的文明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开设由传教士控制的教会大学,才能使中国走向基督化。

狄考文继1877年上海大会的发言,进一步阐述了教会教育的目标:“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学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控制着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它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

地位的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着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① 这样的目标比起单纯训练教民来，更远大了。

新上任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也特别强调教会教育的至关重要，他把教会大学喻为“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它不仅仅是“教会传教、战胜敌人非常重要的战略机构”，而且它“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②

1890年的大会上，传教士最大的分歧是开不开英语课。狄考文坚决反对在教会学校中教授英语，认为这会分散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影响学习宗教知识和其它教会工作人员所必备知识的效果，更主要的是使学生获得脱离教会的跳板。卜舫济则力主教授英语，他认为教授英语不仅能训练中国人的智力，还可铲除学生的排外情绪。其争论的焦点是英语对传教的作用问题，大会的《记录》表明，在讨论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开设英语课。

1890年上海传教士代表大会是对近半个世纪的关于教会办学问题争论的一次总结，它表明传教士内部对教会教育的意见已趋于一致，教育作为差会的合法职责被绝大多数传教士所接受，英国美以美会教士巴伯不禁感到“在传教领域对教育事业缺乏同情的日子已成为过去”。^③ 从此，教会扭转了早期传教活动忽视教育的倾向，完成了新教在华传教策略的全面调整。

① 见《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纪录，1890年》。

② 同上书，第497页。

③ 同上书，第499页。

大会决定改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其工作范围，成立“中华教育会”，并规定每三年开一次全国性的基督教教育会议，讨论各教派各地区的教会学校共同的重大问题。根据“中华教育会”组织第二条的规定：“本会的目的，旨在促进在华教育的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间兄弟般的合作”。从中可以看出，它是在华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所组成的专业性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教会教育跨入了真正“有组织努力”的阶段，改变了过去教会学校各自为政，少有联系的状态，预示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教会教育的大发展，尤其是教会大学的勃兴。

第二章 教会大学的概貌

第一节 教会大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877年和1890年召开的两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完成了新教在华传教策略的全面调整。在教会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出现了教会中、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了教会大学的雏型。到20世纪初年,教会大学得到迅速发展。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成为旧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继续有所扩充。综观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后半期是教会大学发展的早期;20世纪20年代,是教会大学发展的鼎盛时期;30年代以后到50年代初,是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逐渐走向衰退和消亡的时期。

第一阶段:教会大学发展的早期(19世纪后半期)。

为了适应帝国主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传教士提出不应该把教会事业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只训练教民、培养教士等,要重新确立教会教育的方向。继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教会办学问题的争论以后,1890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现了应否办大学的争论。有一部分传教士认为办学校就是向儿童传授基督教教义,主张只要办初等学校或最多办到中学就足够了,不主张办大学。而以狄考文、谢卫楼、福勒、施若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仍积极主张创办大学。他们认为宗教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联系,在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社会里中国教徒的处境,与西方基督教社会的教徒的境况

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教徒的信仰很容易为异教徒的影响所冲淡,以至信仰动摇。只有大力提高教徒的科学文化水平,才有利于巩固信仰,有利于排除异端邪说,有利于提高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他们主张提高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扩大学校规模,要多办大学。^① 1900年以前主要是在中学基础上添加大学班级,学生的数量也很少,那时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不到200人。比较著名的有1879年由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的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1890年开始设置大学课程,有大学生2名;1882年林乐知创办的中西书院设立大学院,后迁至苏州,改称东吴大学;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立格致书院,在美国募集基金;1888年哈巴夫妇抵广州,正式招生,这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864年长老会的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1876年改称登州文会馆,该馆后来同1866年浸礼会在青州设立的广德书院合并于潍县,是齐鲁大学的前身。这些洋学堂,成了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

19世纪后半期的教会大学,尽管还只初具雏形,处在中国传统的正规教育系统的外围,但它几乎独占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当时教会大学经费主要依靠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赠来维持。传教士校长只对差会负责,可以专断一切,享有绝对的权威,只受外国差会的遥控,而不受中国政府管束,俨然西方列强的“文化租界”。教会大学在传播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强制实行宗教仪式,强调宗教和英文课程,轻视中文。出于培养中国宗教领袖的最初宗旨,教会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教徒家庭,毕业后或者在教会学校任教,或者在教会医院工作,或直接从事宣教活动。1895年傅兰雅编著的《中国教育名录》,记载有

^① 参见《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

北京汇文书院何德兰(Z. T. Headland)传教士关于该校历年来毕业生就业情况的报告,他说:“1892年毕业生5人,他们都会说英语,除了一个供职海关外,其余4人都在教会工作。1893年毕业生只有1人,毕业后就在教会学校内教书。1894年有2个学生毕业,一个在教会学校教书,一个当牧师。1895年3个毕业生,2个当牧师,1个在海关工作。”傅兰雅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一般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工作情况。这与当时以科举为出路的中国学界是大相径庭的。因而当时中国社会对教会大学也就持不合作、默许和漠视的态度。^①教会大学与中国正规教育体系几乎不通声息,成为孤悬在中国社会之外的游离体。

这一阶段教会大学多为某一差会独办。在华新教差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教派林立,各自为政。美国基督教史学家赖德烈指出,在19世纪,“尽管新教徒在华的目的和利益是共同的,但他们尚未作出对华传教的一致努力。”^②各差会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纷纷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还没有形成各差会共同的协调机构。由于美国教会对于高等教育更为积极,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是由美国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等创办的,这不仅因为美国差会一般比英国差会财力更雄厚,而且英美差会在华传教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英国差会把人力、物力投入不注重教育的内地,美国差会则侧重比较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和城市地区。美国差会几乎包办了教会大学。这种情形使英国传教士惊呼:“差不多中国的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支持的。”^③

教会大学初创时,无论在办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

① 参见常道直,《对于教会大学问题之管见》,《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

② 转引自徐以群,《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

③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文史》,台北,1978年版,第620页。

学方法还是在组织管理上,均照搬欧美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根本对立,很少考虑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生活,与当时中国官方也没有正式接触。此时教会大学所树立的西方学校模式与中国国情的矛盾冲突产生的后果主要在于学校在择址、招生和传教等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并引起在校学生的不满,以至退学。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封闭系统。

第二阶段:教会大学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

本世纪初,基督教把办学的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方面,教会教育的专业化、世俗化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教会大学已与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和我国自办大学构成双重高等教育系统。教会大学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达到它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呢?这与教会办学宗旨的演变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传教士更加强调培养“控制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的骨干力量。来华之初,传教士采取“向河中撒种”以争取下层群众的“边缘战略”,可是收效甚微。他们逐渐地看到: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① 高等教育作为提高教会形象和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士大夫们)精神渗透的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传教士露骨地宣称:要“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使他们能胜

^① 《同文书会发起书》,1887年,转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57页。

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从而能“控制中国的发展”方向。^① 所以教会要积极创办高等教育。

第二，戊戌变法后传教士利用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高涨，大力发展教会大学。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的惨败震惊了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了“数千年大梦之晚醒。”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积极推动废科举、兴学堂，把改革教育作为革新政治的前提。康有为说，“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②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新政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措施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求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嗅觉灵敏的传教士针对这种情况，急不可待地声言：“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③ 维新运动中所倡导的设立新式学堂，传播西学的思潮使教会大学获得了一个稳步发展的环境，而传教士正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教会大学。传教士韦廉臣对此表述得很明白：“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何把它来建立。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于他们。（中国的）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④

第三，教会教育在竞争中要求联合。直接影响教会大学进入鼎盛时期的是教会学校的合作。19世纪末期，中华教育会就标榜其宗旨为：“旨在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加从事于教学工作的人员兄弟般的合作。”该会企图联合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所有的教育机构并统一协调其业务。但各差会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共

①④ 参见《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上海。

②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第三册之六。

③ 转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41页。

同的协调机构。到 20 世纪,这种规模小、仅相当于中学程度的“大学”,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教派之间的协商合作,教会学校的改组合并已势在必行。否则,教会大学将无法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最早提出要统一教会学校教育并进行分工的是狄考文。他于 1877 年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主张各地区合作建立各级学校,而不要重复同类学校。两年后,《教务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联合”的一封信,呼吁在北京市内及郊区的各个学校联合组成一所大学;这样的合作意味着主办差会经济负担的减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两个理由成为后来赞成教会教育联合的一切论据的核心。但是,19 世纪的传教士对于教会学校的联合还只限于纸上谈兵,甚至狄考文本人到后来都不太愿意为联合而迁移自己的学校的校址和扩大自己学校的教育目标。顽强的个性,不同的重点,以及教派主义等等,都阻碍着合作。同时行政机构也很难协调各校的合并,就是同一个教派在中国的不同差会也缺乏一个协调中心,唯一的统一指挥是来自国外的差会总部。各教派本身是互相独立的,如加拿大的监理会、英国的监理会、美国的南监理会和北监理会都各有差会组织并各派有传教士。

其他各新教教派如浸礼会和长老会也莫不如此。

然而,形势在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以后,中国逐渐掀起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改革高潮,广大传教士普遍地认识到:教会大学必须增加完备的实验室和图书馆,聘请更多更好的老师,从质量上而不是从数量上与公、私立大学相抗衡。因为在数量上教会大学已无法与中国的公、私立大学相竞争了。提高教会大学的质量,把它办成优秀的高等学府,一则可以吸引优秀的学生,他们一旦毕业就可以输送到各个关键部门,从而也就可以更多地控制中国的前途;二则可以期望成为中国公、私立大学的榜样,

从而促使国民教育计划重点的转变。而提高教学质量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与师资都不是单个教派所能胜任的,除非差会集中力量,由几个教派共同维持几所大学,实现教会学校的合并,不然的话,使教会大学成为“模范学校”将成为一句空话,优秀学生将被中国政府所办学校吸引去。也有一部分传教士则从另一角度考虑教会学校的合并,他们不能容忍清政府所公布的五项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崇实。更不能容忍中国的基督徒进国立学校读书,因为在政府承认的学校里除教授儒家伦理以外,还禁止任何宗教教学,因而教会有必要为中国的基督徒提供相当于官办学校教育的基督教教育。要提供这样的教育,也只有通过教会学校的合并,更多地兴办高等教育。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教会大学在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山东地区的美国长老会、英国浸礼会首先在 1902 年 6 月 13 日达成协议,共同办理分别设在潍县(文学院)、青州(神学院)、济南(医学院)的山东基督教大学。以后,联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地区的其他差会也参加进来,1915 年正式更名为“齐鲁大学”,由 5 个美国差会、5 个英国差会,再加一个加拿大差会共同办学。

20 世纪初,为重建被义和团捣毁的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美国公理会、美以美会首先就联合问题进行接触。以后英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也参加进来。经过十几年的无数次谈判,最终形成联合。这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

南京金陵大学 1911 年由南京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参与其工作的差会包括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基督会等。金陵女子大学在 1915 年前后成立,5 个美国差会为其拨款,并派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处理学校各方面工作,以后又有其他差会及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女子学院参与工作,使学校的教学条

件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1910年建校的武昌文华大学,由武昌城中的几个小的差会学校合并而成。1924年,它又与湖滨大学、长沙的雅礼大学等合并成为华中大学,由英国伦敦会、循道会,美国的圣公会、归正会、雅礼会等共同负责。组建华西协合大学的计划早在1905年就已由美国浸礼会、英国圣公会、加拿大联合会共同提出,但由于国内差会总部的反对,一直到1910年这一大学才正式建立。另外,杭州的之江大学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合办,上海沪江大学则是美国南北浸礼会合作的结果。福建协和大学出现较晚(1916年),它是根据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关于在世界各战略要点建立基督教大学的决定,由4个英美差会共同建立。

实现联合增强了教会大学的实力。到20年代,主要教会大学不仅已基本定型,而且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的学生数占整个中国在校学生总数的32%,其中高等学校竟达80%。^①到1926年,所有基督教大学每年入学总人数超过了500人。1919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囊括燕京、齐鲁、金陵、东吴、圣约翰、之江、协和、岭南、雅礼、文华、博文和华西协合等14校,学生共2017人,常经费共1222000银元。当时国立5所大学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常经费为1492223银元。^②可见教会大学的经济实力与中国国立大学相差无几。

第三阶段: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逐步走向消亡时期(30年代至50年代初)。

自从1921年英美教育考察团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口号,尤其是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北伐战争节节胜

^{①②} 《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第8页。

利的形势下,各差会为保存在华既得权益,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案问题。从1929年始到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与之江大学外,所有教会大学均向国民党政府立案注册,形式上成为“青天白日的私立学校”。这时,大多数教会大学的校董会也主要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出任校长,教育经费也多半来自中国方面。强制性的宗教课程和仪式被取消,校方更注重所谓基督精神的潜移默化。教会试图以质量和效率来对中国施加影响。1930年以后,有几所东部的大学迅速发展。到1936年,基督教大学学生人数是10年前的两倍,共约8000余名,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1937年七七事变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除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的一部留在上海筹组基督教联合大学外,一批教会大学西迁到后方。天主教的北平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继续开办。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加速了教会大学专业化和世俗化的进程。过去那种造就肩负“上帝”使命的神职人员的办学宗旨,已逐渐让位于完成培养承担民族使命的知识人才的任务的现实,“天国”的利益已让民族的利益占据了优势,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国家建设和民族进步的需要。到1947年,教会大学有学生12000人,在几年内,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①1947年,由各教会大学在美国的董事部(即创办人会)联合组成的美国中国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依仗美国膨胀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制定新的改组合并计划,试图加强对教会大学的控制,但此时校园的形势已非美国教会所能左右。抗战胜利后,广大师生对国民党的幻想日趋破灭。解放战争期间,许多教会大学成了呼吁和平、民主,迎接全国解放的进

^① 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6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

步学生运动的中心,共产党在教会大学的师生中有很深的基础,为新中国政府顺利地接管教会大学创造了条件。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教会大学始与美国完全脱离关系,改为中国人自办。自此,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走向了消亡。

第二节 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经济状况和治校方法

一、办学方针

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基于传播基督福音的需要,其发展的宗旨是通过大学实施奴化教育,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培养买办人才和洋奴以实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目的。这种办学方针是同教会传教互为表里的。教会大学的明显特点可概括为四句话:根在外国,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办学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宗教。如1877年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杨格非(杨笃信、杨约翰)阐述了许多传教士所共有的观点:“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发展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拯救世人于罪恶之中,为基督征服中国。”^①当传教士把目标转向创办高等教育时,其理由大体可分三类:使上等阶层皈依基督教,以期通过他们影响百姓;有必要对信徒和教会学校、医院及教堂的工作

^①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上海。

人员进行高等教育；希望使整个中国基督教化。^①、即是说，要把中国变成为基督教国家，必须摧毁异端，使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结构中去。

美国新教圣公会全国委员会曾议订了一个所谓《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其中提出了宗教方面的基本原则：“教会学校是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标志，以传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学校当局和作为教会代表的主教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和促进学校的宗教特点。”^② 据此，圣约翰大学在1928年6月14日校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校长报告中就指出：“(1)学校是训练同学为未来基督教的领袖；(2)学校可以有讨论问题的自由，但必须脱离政党，不应参加政治活动；(3)要利用功课及有益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忙而无暇，并于学生中扩大宗教活动；……(4)学生自治会权限必须限制；(5)要基督教徒教师来领导所有教职员，更好地了解基督教哲学；(6)希望基督教气氛笼罩整个学校，我们坚信大学的使命就是宗教宣传；(7)将各种功课与基督教联系起来。”^③

根据上述办学方针，西方差会确定学校必须由传教士及其所信任的中国教徒主持，美国圣公会全国委员会的《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中，对此作了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规定。如该文件指出：“每校应有一圣公会神父作为礼拜牧师，在各教会学校间应有一神父负责圣公会会员的宗教生活和分管学校内的基督事务。所有学校应有礼拜和正式礼拜仪式，应规定基督徒必修课，这门课应由这方面合格的人任教。”在职员方面，要求“每校绝大部分职员应为基督徒，尽可能是圣公会会员。他们有责任促进学

① 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6页。

②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③ 见圣约翰大学档案。

校基督工作。教会将努力提供相当数量的具有献身精神和受过良好训练的美国籍教员”。^①

美国圣公会做出这些规定的最终目的，正如狄考文所说：“如果我们作为教育家能够通过教会学校培养出中国市场上最好的教师，而这些教师又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控制中国。”^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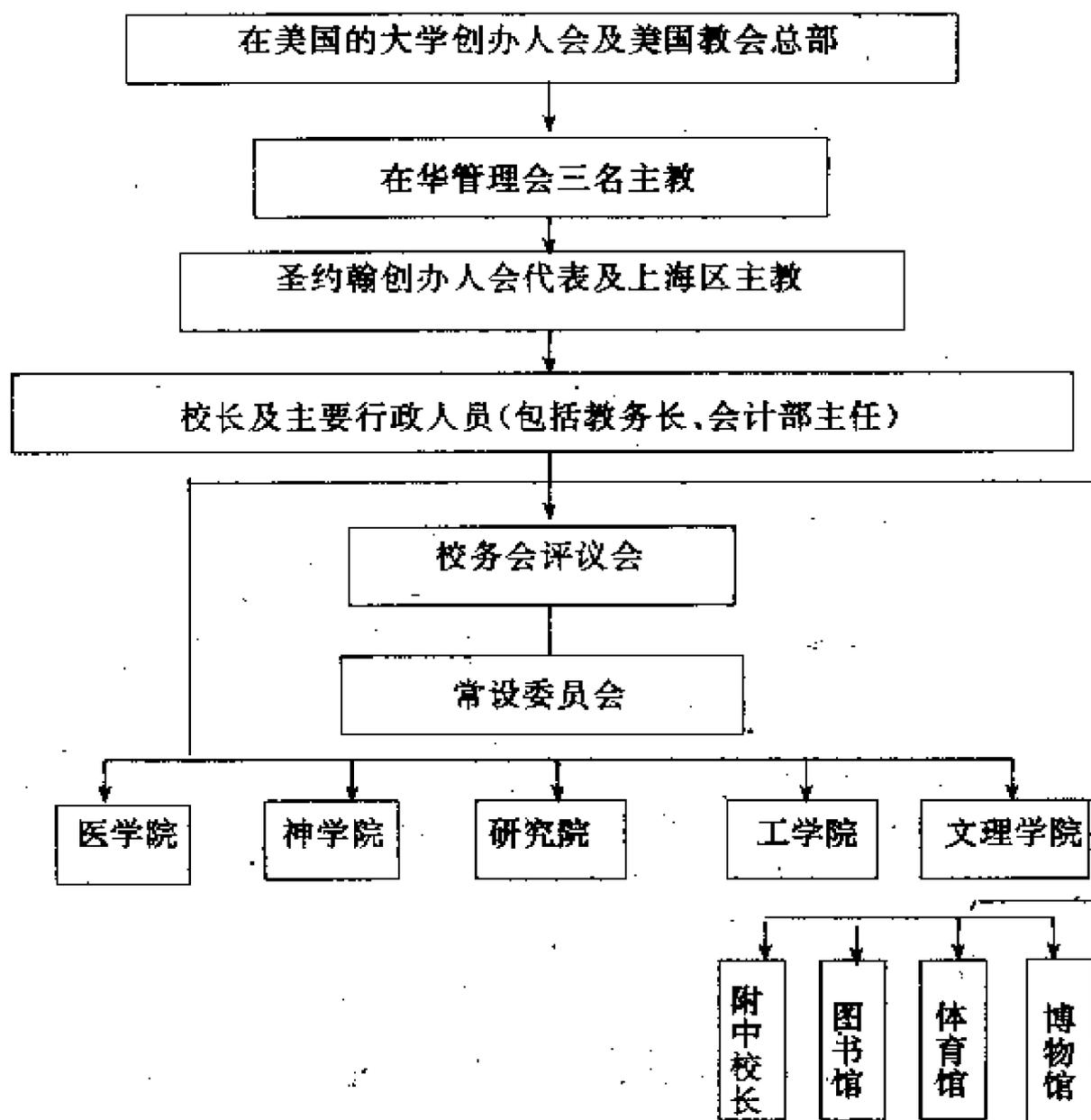
二、组织机构

各教会大学在最初创办时规模小、机构简单，校长上对差会负责，在校内可以专断一切，享有绝对的权威。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事务增多，机构也随之扩大。差会对学校大政方针具有决定权，外籍校长和司库（会计主任）是教会大学中最高权威。创办人会掌握着绝大部分行政权力，一切重要的决策都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在差会组织的协助下，创办人会正式任命校长、副校长及外籍教职员。用于雇请中国教职员的西方资金都需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创办人会控制着一切财产的处理权。校长每年必须向本国的创办人会 and 教会总部汇报工作：圣约翰大学由在华的主教转送到美国，沪江大学由校长直接送去或交由驻校的创办人会代表转送。平时校长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也应经常向他们请示汇报。沪江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后，仍然照此办理。这里以圣约翰大学在校董会成立以前的组织系统为例，来看看教会是怎样遥控教会大学的：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西人校长和主要行政人员也得秉承创办人代表及上海区主教的旨意，这反映了传教士独揽校

^① 参见《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② 司姆尔：《北美差会部第九届会议》，1902年，第88页。



政的实况。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的冲击下，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校董会中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1930年初，齐鲁大学校董会几经酝酿终于形成，它包括^①：

传教士代表：8名外国人 2名中国人

^① 转引自《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29页

女校友代表：5 名中国人

指定代表： 10 名中国人

(名誉代表)：(2 名外国人 4 名中国人)

总 数：8(10)名外国人

17(21)名中国人

金陵大学校董会章程规定，校董会由下列各方面人员组成：

(1)从中国的宗教团体中选出：

浙江—上海浸礼会分会选派 2 名；

美以美会华中分会选派 3 名；

中华基督教会华东分会选派了 3 名；

中华基督教会 3 名(和中华基督教布道团有联系)。

(2)金陵大学校友会选派 4 名。

(3)从有合作关系的布道使团中选出：

卫理公会、圣公会华中布道团 2 名；

美国长老会江岸布道团 2 名；

中华基督教布道团 2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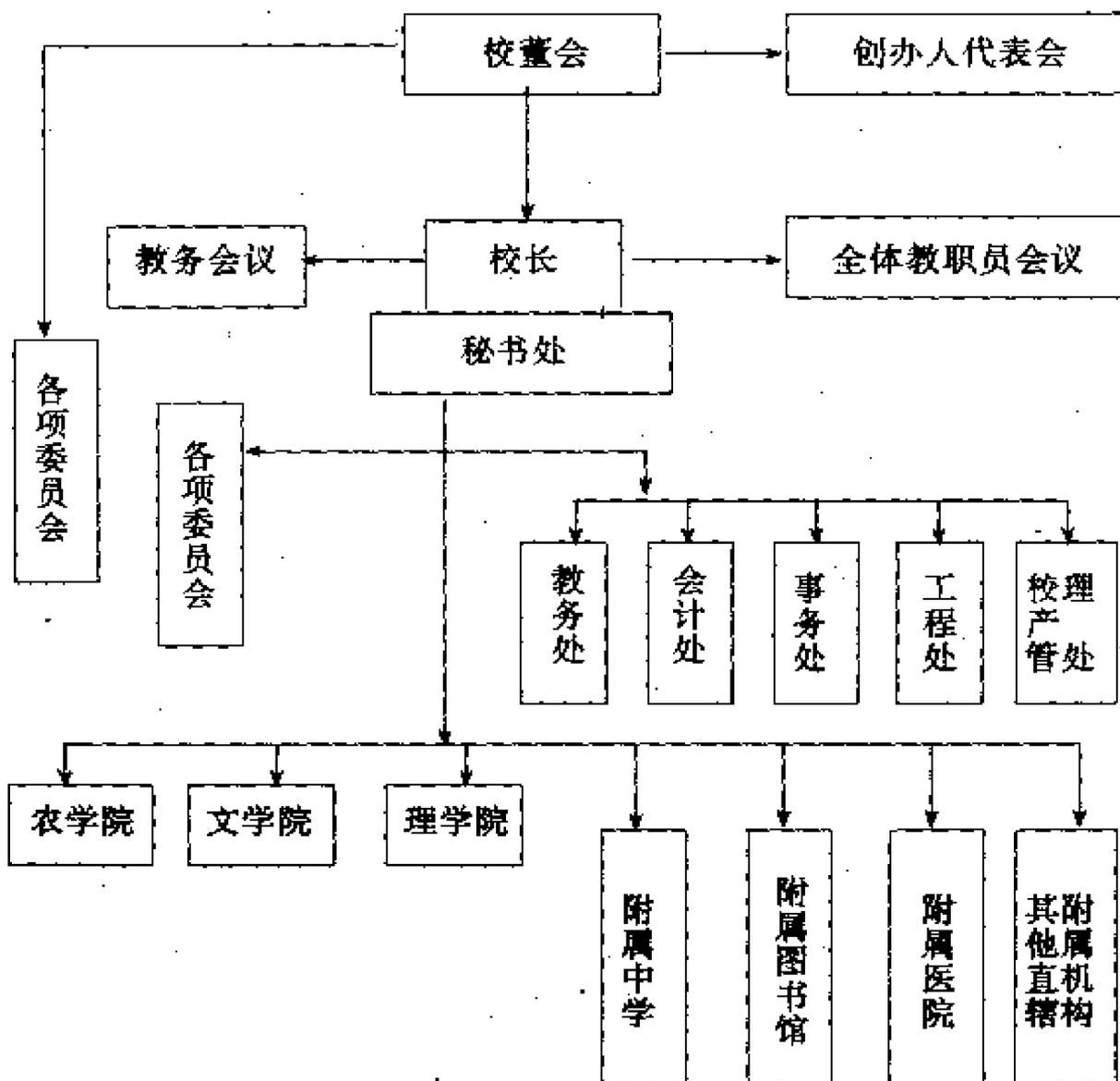
美国浸礼会国外布道团华东教区 2 名。

此外还由校董会增选 5 名董事，校长为当然董事。

向中国政府立案后的金陵大学组织系统表如下^①(见次面)

根据章程，校董会的职责为“有权批准建立新的系科；批准学校开设的课程；选举任命校长和司库；任命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等。但校董会与创建者委员会协议书又明文标示：“由创建者委员会将学校的地产、建筑和设备租给校董会”，名义租金为一美元的中国货币。这一租借受到下列一些条件约束：校董会

① 参见 1934 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金陵大学第二部分·组织及编制》。



不再成为金陵大学的管理者，创建者委员会有权立即重新占有这些财产；如果创建者认为租借的财产或任何重要的部分没有用于金陵大学制定的目标，创建者委员会有权取消这一租借。

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作为创办人，是燕京的最重要的领导人。燕京大学的行政组织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是教职员全体会议，通称期前（学期前）会议，由全体教职员参加；凡学年的计划，重大的方针政策，包括学期的进程日历等，都要经过这个会议讨论通过。全会每年照例举行两次，都在学期开学前召集，故名期前会议。其上，则为教职员行政委员会或校务会议，由各院

院长、系主任、总务长、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图书馆馆长等组成，另加若干名由期前会议选出的委员；凡课务、庶务（后勤）、财务、生活和一些特殊问题，都在讨论之列。再上，就是行政委员会，由校长、校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参加，处理日常事务。此外，还有若干常设或特设的委员会，如体育、文娱等；其中较重要的要数薪级委员会，由资历较深、学术上著有成效的教师担任委员，其职责专司教职员的晋级及增薪问题。

3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大都改由中国人充任校长，“校长由校董会提名由学校基金托管会任命”，在名义上“他是学校的最高行政人员，在学校的各种事务中代表校方，对学校 and 事务行使一定的监督权，对学校的正常工作向基金托管会负责”，而不是向中国教育主管机关负责。这时教会大学内部行政管理机构表现出从传统的西方体制向中国化转化的趋势。但实权仍掌握在西方教会手里，教会派出的代表往往以“顾问”、“校务长”等种种名义，以“太上皇”的姿态操纵学校的校政和经济大权。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后，学校改由中国人刘湛恩任校长，但前任校长魏馥兰仍留在学校，干预校政。而且还有创办人代表海波士驻校监督，指挥一切，直到1949年9月才被迫返回美国。国内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第一位中国人、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深有感触地回忆说，“名义上中国人当了校长，实权，尤其是经济大权，依然掌握在美国教会手中”，^①中国校长几乎很少过问。

在教会大学里，教师以西人为主，他们不是由学校聘请，而是由国外教会直接派遣的。在1925—1926年间，教会大学有教师465人，其中中国人只有181人。华西、福建协和、雅礼等校的

^① 《回忆金陵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中国教师不到 1/3,其它学校的中国教师约占 33—45%。^① 中国籍教师和工作人员,由西人校长任用,用人标准,主要是以基督徒为主,其次是本校毕业生,再次是留美学生。因中国的基督徒很少能够担任高级课程的教学,特别是中国经典的教学,因此传教士不得不聘请旧式的中国塾师。中国教师一般不参与学校管理活动,教师会议通常只有外籍教师参加,中国教师不参加学校决策。后来,在“中国化”的目标下,中国教师的比例大大超过了最初时期的水平。1927—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15 名教授中,中国籍有 11 名,占 73%;外籍教授 4 名,占 27%。到 1936—1937 年,燕京大学的 169 名教师中,外籍教师 41 人,占总数的 24.2%;中国教师 128 人,占总数 75.8%。数量虽有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外籍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

在教会大学里,中西教职员在物质上待遇有很大差别。沪江大学中美教职工待遇一向相差悬殊,中国教职员工的待遇只有同级美籍教员的 1/4 或更少一些。^② 圣约翰大学的美国传教士教师,已婚者一律年薪 4000 美元,未婚者一律 2000 美元。中国教师以 1911—1915 年为例,一般教师月薪 130 元者 1 人,110 元者 1 人,80 元者 2 人,70 元者 2 人,60 元者 1 人。国文教师月支 60 元者 2 人,40 元者 4 人,30 元者 7 人,20 元者 1 人。一般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为 86 元,而国文教师月平均工资为 36 元。此外,在住房分配上,中国教职员只能住低等的简陋房屋。^③ 金陵大学明文规定:“任何教职员只有在校长或系主任的允许下,才能做份外工作,但是,由创建人会委派的,仅对创建人会负责的

① 转引自杰西·格·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 181 页。

② 《沪江大学始末简记》,《文史资料选辑》第 31 辑,第 122 页。

③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第 53 页。

教员例外。”^①

早在1909年中华教育会的第六届年会上，首次出现了中国籍会员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当时在教会学校供职的部分中国籍教师曾联名向该会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中国教师有参与决定教育政策的权利，应增加中华教育会中国籍会员的人数（因过去中国籍的一般不超过2%，并且无发言权）；二是要求把中华教育会的名称改为基督教教育联合会；三是成立一个由全体会员参加投票的执行委员会。这些要求是中国民族运动觉醒在教会学校内部的反映。此后，伴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和抗日战争的冲击，中国教职员掌握了教会大学一定的行政、经济权，但西方教会一直千方百计设法插手教会大学的校政与管理，力图控制教会大学发展的进程与方向，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三、经济状况

教会大学的确培养了一批人才，“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②这也正是美国自吹自擂对中国极大的“贡献”。表面上看，好似他们出钱，为中国培养了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教会大学的经费，并不像传教士所吹嘘的，主要来自差会津贴和差会所属国的捐款。

一般说来，教会大学经费来源有各差会拨付的固定教育款，而一般差会的经费有以下几种来源：（1）教徒和富商的捐助，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大资本家为了逃避累进税而给教会“慷慨解囊”；（2）传教募捐；（3）教会在华拥有大量房产、地产及其他教产，其中不少财产是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强行霸占中国人民的

^①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02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5页。

财产；(4)1901年前，将勒索中国的大量赔款中的一小部分，作为教会大学的经费；(5)教会附属事业、企业收入，如医院、工厂、农场等。这几项教会收入中，80%是在中国取得的。

教会大学的经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来源和支付方式。大致有以下几个不同的阶段。(1)19世纪末期，经费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差会津贴；二是教案赔款；三是学生缴纳的学费。最早收学费的是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学费，包括书簿费每年收银五十两”。(2)1901年到1937年，经费来源主要有：一是中外各界教徒、校友的捐赠，各财团、基金会的补助；二是教会财产收入和校产收入；三是学杂费；四是中国政府的补助。各项收入所占比重是：募捐为首，学费次之，校产、津贴再次，中国政府补贴最少。(3)抗日战争时期，一类学校由总会从美国拨款，学校内迁；另一类没有内迁，差会津贴断绝。(4)1945年至1952年，差会恢复对教会大学的津贴，其比例为：学杂费第一，募捐第二，杂项收入(校产、教产、学校附属工厂、企业收入)第三，差会津贴第四，政府补助第五。教会大学在发展的早期，经费主要是由传教士从他们国内取得教会津贴和募捐所得充用。1903—1904年，美国南、北浸礼会传教士万应远、柏高德先后在美筹款，共募得60000美金，作为购地建校舍之用，分别创办浸会大学和道学院，后来两校于1912年合并为沪江大学。以后美国浸礼会每年平均资助经费若干。圣约翰大学在1879年创校时，美国圣公会施若瑟主教在美募集资金26000美元，此外美国监理会董事部在三年内捐助美金6000元。岭南大学在创设之初，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哈巴牧师募集捐助25000美元。金陵大学由美以美会创设的汇文书院、基督会设的基督书院、北长老会设的益智书院合并而成。起初，这三个教会提供价值40000美金的财产或资金，提供3名教师的薪水，每年捐助费2400美金。以后，教师增为4

名,每年捐助费为 3000 美金。1920 年,教师数增为 5 名,1922 年,年捐款增为 4000 美金。美国浸礼会国外传教协会也提供现金拨款,到 1926 年为止总计 500 美金。

教会大学初创之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固定基金。因此学校依靠宣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款。此外,还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收入,如地租等。后来因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教会津贴所占比例逐步减少。圣约翰大学常年经费约为 70 万美元,其中学生缴纳的学费收入约 10 万美元,占 15% 左右,学校的支出除图书仪器外,主要用于付给外籍教师薪金,占相当大的比例。平均每个学生要缴纳 200 元学杂费,这对于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无能为力的。30 年代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 20 元,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 200 元的学费,所以进“圣约翰”的大都是富家子弟。但“圣约翰”也为家境贫寒的学生和优等生设置了奖学金和免费制度,每年约有 30 名的名额。湘雅医学院 1935 年规定学生每学期应缴纳:学费 10 元,膳费 26 元,宿费 6 元,实习费 12 元,赔偿费 6 元,制服费 6 元,学生自治会金 5 角,体育费 1 元,洗衣费 2 元,书籍等用品需自备约 60 元,总计达 130 元上下。^①

据 1928 年估计,圣约翰大学的校产总值计约有 78.7 万两银子,其中地产 18 万两,房产约 67.7 万两。这笔财产中有 30 万两银子是在中国募集的,有 13 万两是由学校的收入(包括学费)和在华差会填补的,其余的 35 万两是从国外募集的。因此,中国方面的投资要占 60% 以上。我们以圣约翰大学几个代表性年度为例来看看:^② (见次面)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教会津贴从 1894—1925 年的 31 年中

① 《征费规程》,见《私立湘雅医学院章程》。

②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第 54 页。

仅增加了一倍；捐款增加 66 倍；学杂费增加 36 倍；杂项收入增加 97 倍。教会津贴在 1924—1925 年时仅占 1/5，已微不足道。

(注：以中国货币元为单位)

年别	教会津贴	捐款	学杂费	杂项收入	总额
1894—1895	7115	178	4338	626	12257
1899—1900	7503	98	12780	1340	216721
1909—1910	8463	199	48774	11768	69204
1919—1920	8739	10079	97025	13807	129650
1924—1925	15606	11877	156066	60964	244513

圣约翰大学经费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开办时美国教会提供的开办费及每年提供的常经费。②中外各界募捐的款项。③学生交纳的学杂费。④美国洛克非勒基金会赠款。⑤校友或教徒的捐赠。到新中国成立前，该校校友共募集和捐赠了 304000 两白银、5000 银元、4700 美元。①

圣约翰大学购地建房资金来源中，由美国募得的钱 157000 美元，6500 两白银；由中国募得的钱有 54000 两白银，10000 美元；校友和学生捐款 4700 美元，304000 两白银，5000 银元；学校自备款 20000 美元，140000 两白银。总计，中国方面的钱共 47000 美元，30400 两白银，5000 银元。若按当时一两白银折合 1.5 银元计算，一美元等于 3 银元，则来自美国方面的钱共 480750 银元，来自中国方面的为 60200 银元。②

1921 年以前，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考察金陵大学的报告中指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 91 辑，第 83 页。

② 同上书，第 82 页。

出,金陵大学总经费 19.55825 万元中,出于各教会捐助的约 40%,出于私人及团体捐助者约 8%,出于基本金者占 6%,出于学费者约 40%,出于农场者约 6%。^①

燕京大学经费来源于六个方面:①募捐;②在美国的永久基金和各基金会的长期援助;③美国差会支付在华美国人的薪金;④中国政府补助;⑤学费;⑥退还的庚子赔款每年拨付 15000 元。现将 1932 年燕京大学预算列下:

学费 111920 元;杂项收入 235129 元;美国托事部 553091 元;燕京哈佛学社补助 125520 元;共计 1025660 元。

从表面来看,美国方面款项为 67 万多元,但实际上在中国的收入没有计算在内。

由于教会大学办学目标的调整,尤其是 1924 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许多教会大学在中国立案,以中国大学的面目出现,中国政府便将它们列入私立大学给予资助。如 1934—1935 年度国民政府给私立大学经费的近一半给了教会大学。^② 1934 年国民政府捐赠金陵大学建筑图书馆的经费 30 万元。1935 年教育部又补助 3 万元,作充实设备、添置讲席的经费。1946 年度金陵大学预算如下:学费收入国币 1000 万元,教育部津贴 6200 万元,援华会津贴 81000 万元,基金利息 20670 万元,其他捐款 20380 万元,主要支出用于教职员薪津、修缮及办公费等。^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37 年的预算情况是:

教育部讲座费	12000 元
基金利息	15346 元
他种捐款及临时捐款	23443 元

①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21 页。

② 《中国教会大学史》,第 287 页。

③ 《金陵大学要览》,1947 年。

学生缴费(学费、实验费、膳费、杂费等)	58600 元
美各教会及斯密士女子大学捐款	63190 元 ^①

可见,来自国内部分的经费要占很大一部分。

教会大学还积极争取国外世俗机构的资助。密苏里大学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提供援助;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赞助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业科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疗培训;庚子赔款基金会资助华中大学建立起图书馆学培训的专业;史密森学院校友会帮助金陵大学加强音乐、物理的教学活动;哈佛—燕京基金会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编目工作提供了帮助;耶鲁大学校友会援助自然科学、医学和幼儿教育。教会大学预算的不断增长也来自中国内部,包括政府和私人的捐助。1944年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在给校董会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该院得到的拨款和馈赠情况:教育部拨给电力工程专业每年1440万元,拨给汽车专业每年900万元,拨给无线电和影音专业每年9000万元;洛克菲勒基金会1942—1943年捐款50万元;教育部拨给电化教育100万元,拨给影音月刊200万元;重庆市10团体1944年赞助电化教育计划2000万元;中国救灾联合会为修复重庆中学校舍,捐款3500万元。^②既然传教士的威信部分来自他们获得资金的能力,那么,这种资金的削减也使学校董事会中出现了更多的平等。学校经费世俗来源的增多为教会大学的角色变化提供了经济上的保证。

① 吴贻芳,《金女大十四年》

②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80页。

四、治校方法

教会大学从自己的办学方针出发,对学生的管理采取软硬两手。早期的教会大学,根在外国,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办学的基本任务在于宣传宗教。其管理手段往往是重在加强对学生进行宗教宣传和宗教教育。1928年圣约翰大学就提出“要利用功课及有益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忙而无暇,并于学生中扩大宗教活动。”^①这个大学自开办之时起,到1952年止,在这个长时期内,强迫实行宗教教育。学校规定,学生圣经课不及格,就得留级或不得毕业。不论读哪一院系,每一学期都必修一学分的宗教和伦理学,这门课程偏重于基督教教理。^②

教会大学还对学生参加各项宗教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圣约翰大学每天清早的“晨更”,每周两次“晚祷”,学生都必须参加。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师生都要“做礼拜”。参加圣经课,由学监点名,缺席次数多的学生,由校长训话。金陵大学在1925年曾规定:星期一至星期五通常不赴朝会者,每学期扣3学点;星期六不赴朝会者,每学期扣2学点;星期日通常不赴宗教礼拜者,每学期扣2学点。^③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后,不得不取消一些强制性措施,更注意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采取自愿的原则。学校当局希望通过课内外师生的接触、团契活动、奋兴布道大会、基督教节日、学校环境布置等等方式造成浓厚的宗教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即使没有受洗入教,也会对教会有好评。在这样富有宗教气息的校园里,的确有一部分学生皈依基督教。据统计,1930年至1935年的6年间,金陵大学受洗的

① 见圣约翰大学档案。

② 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第102页。

③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142页。

基督徒学生由 101 名至 143 名不等,与表示信教而未受洗的合计,基督徒学生在 140 人至 170 人之间,约为全体学生的 1/3;在 1938 年至 1948 年间,选读宗教课的学生人数占总数的 1/6—1/5 左右。^① 传教士对此是很满意的,他们声称:“很多学生受了感化,变为我们最得力和最有智慧的基督教传教士。”^②

在有些学校,许多对宗教不感兴趣的学生也被诱劝参加为数众多的半交谊半宗教性质的“基督教团契”组织,而学校对信教的学生则格外优待,以此来拉拢,吸引青年学生。此外,校方还采取供给费用、资送出洋、缓缴或免缴学费等方法争取学生受洗入教。

教会大学长时期内,不仅校长、院长、系主任及教员都是西籍传教士,而且教材、仪器设备、图书杂志,甚至连生活设施都从国外运来。圣约翰大学不仅编印英文《约翰声》、《约翰年刊》,而且将所有教科书、参考书(包括中国历史、地理等)用英文编印,以使教学实验符合美国标准,甚至有些试卷也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直接搬来的。

东吴大学法学院 1927 年以前所开设的课程完全是照搬英美的法律课程,没有一门中国法律课程,研究内容也是英美两国的例案。为了笼络人心,美国有关大学都对该校毕业生开门,凡该校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大学,不到一年即可获得法学博士的学位。1927 年后,课程虽按国民政府司法院规定的课程安排,但其中中国法律的学分比一般大学学院的课程要少 1/3 到 1/2,而增加了英美法律内容的学分。“型式法庭”是实习英美法庭开审民刑案件的手续;图书馆大部分是英美的法律图书;学生学

①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256—257 页。

②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 年》。

的大都是英美法律。由此可见,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

早期教会大学以西籍教员为主,他们把大力推广英语作为向学生宣扬西方文化、灌输洋化思想的情形也是客观存在的。有的传教士认为英语能使学生成为千百万不谙西学的同胞中的一员领袖。圣约翰大学的一切布告、来往公函、会议发言、记录等一切文书档案全都用英文。以至当时就有人惊呼:“世界各国除附属国和殖民地外,有哪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用外国语(英语)来教各种学科的?有哪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用原版西书来作为课本、教材?大学教授与大学生都有‘卑劣情绪’,以为非用原版西书不可。”^①美国学者杜威也毫不掩饰地说:“美国教会大学的课程及训育观念移植到中国来,造就的毕业生不是做发展民族工业的人才,而是由于他们的英文训练,做外国公司的职员。”^②虽然如此,还是应该看到,尽管传教士为学生设计了未来的人生座标,但绝大多数学生并未按照传教士设计的轨道走下去,他们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专长,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教会大学还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约束学生,名目繁多的所谓“校规”,对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进行种种限制、束缚。例如沪江大学《学校惩戒规则》第二条第八项规定:“在校内外参加未经学校及政府许可之组织与活动,或其他违反学校及国家禁令之行动者应予严惩。”各校都制订了严格的学生考核制度,实行学分制。燕京大学每届新生入学要过几道关口,期中考试要淘汰一批,期末考试再淘汰一批,第一学年考试仍要淘汰。燕大实行10分制,5分为及格,但四年平均必须在5.3分以上,否则不能

^① 林汉达:《中国大学(教会大学)英文的畸形现象》,《教育季刊》第17卷,第2期,第3页,1941年6月。

^② 转引自王春遗著:《美国侵华史话》,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毕业。据湘雅医学院第 18 班周衍椒校友回忆,他所在的班入学时有 28 名,由于淘汰率太高,到三年级已退学、留级的达 1/3。由于学习负担重,到三年级时班上 1/4 的同学患肺结核。^①尽管教会大学当局想方设法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摧毁了传教士筑起的樊篱,他们无法驾驭青年学子的爱国激情。教会大学的铁门无法关住向往祖国独立、富强的热血青年,他们纷纷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激流。曾经参加天主教教会学校爱国学生运动的杨士达被中法学堂开除后写下了以下几句诗:“五四运动受校黜,身虽遭击志犹雄。反帝爱国乃天职,国耻不雪不罢休。”这种精神乃是教会大学学生中的主流,表达了爱国学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第三节 对几所教会大学的个案考察

一、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形成,正体现了 20 世纪初期教会大学进一步走向联合的趋势。为了吸引中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入学,以期通过对他们的教育来促进中国的基督教化事业,北方几个教会经过 15 年之久的酝酿之后,1916 年,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兴办的通州协和大学和基督教美以美会兴办的汇文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燕京大学。1920 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也合并了进来。1919 年 1 月,司徒雷登应聘来北京任校长。

迎接他的是个不尽人意的烂摊子:经费支绌、校舍简陋、学

^① 周衍椒:《湘雅医学院在抗战期间西迁贵阳的回忆》,载《湖南医学院院史资料》第一集,第 148 页。

生不足 100 人。“教职员连‘打字姑娘’都算在内只 33 人。”^① 只有两位合格的中国教员，外籍教员大都不具备教学资格。司徒雷登不禁感叹：“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司徒雷登决定筹措资金，延揽师资，改变面貌。从 1922 年始，到 1936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司徒雷登 10 次赴美募捐。

据统计，燕京大学开办时经费主要由教会供给，1917—1918 年的预算 35000 美元，87% 来自教会；到 1936—1937 年的预算达 215000 美元，较前增长了 6 倍，其中只有 14% 来自教会，55% 来自美国的私人捐款，特别是来自美国铝业大王卡洛斯·赫尔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赠。与此同时，司徒雷登等还展开在中国境内的募捐活动，有一段时期，所得款项能达到年预算的 10%。国民政府从 1934 年到 1937 年每年补助该校 60000 元，从庚子退款中每年拨给 15000 元。1936 年，司徒雷登第 10 次赴美捐款归来，为燕大筹款达 2000 万元。

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燕大有条件聘请一批著名学者到校任教，组成了阵容强大的教学师资队伍。他们中既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洋博士和洋硕士，如刘廷芳、赵紫宸、徐宝谦、冯友兰、萧公权、许地山、熊佛西、马铨、陆志韦等；又有在国内享有盛名的中国学者，如陈垣、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容庚、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谢冰心、邓之诚等。在学科设置方面，1929 年设文、理、法三院，共 20 个学系。1921 年开始设立研究生课程，1934 年正式设立研究生院，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学系达 12 个。据统计，1919 年至 1931 年，燕京大学共培养出毕业生

^① 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所得的印象》，见《真理与生命》第 10 卷，第 8 期。

1071人,其中本科和研究院777人,速成科197人,宗教学院97人。^①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学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只有燕京大学与金陵大学被列为甲级,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到30年代,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

燕大的办学方针,正如司徒雷登自己所说:“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为的是给教徒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甚至更多地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的功能是它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校的唯一理由,也是获得财政支援的唯一指望。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②这个方针正符合了教会大学“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目标。因此,司徒雷登认为学校“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而是要制造一种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基于这种策略,司徒雷登采取措施,积极向“中国化”的目标过渡。

早在接掌燕京大学之初司徒雷登就认识到:“这所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他曾提出要“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是一所中国大学”。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燕京大学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获得批准。1929年,选任吴雷川为校长,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北京校董会的组成中,有21位中国人和13位外国人;1929年,司徒雷登主持制订了《燕京

① 燕京大学编:《燕大年刊》,194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66页。

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与外籍教授享有同等待遇。^①在这一政策吸引下，燕京大学的教师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创时，中国教员只占教员总数的1/3，而到1927年则达到了2/3。1936—1937年的169名教师中，外籍教师41人，占总数的24.2%；中国教师128人，占总数的75.8%，占到3/4强。

1922年，燕京大学即宣布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旧式，进而又将宗教课与一般大学课程分离，另设神学院。神学院在两次向政府注册时都未将其包括在内。燕京大学还加强了国学方面的课程，作为“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文学系首任系主任是前清翰林、基督教徒吴雷川。燕京大学还规定学生必须在要求的60个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课程，8个中国文学，4个中国历史，以提高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水平。

燕京大学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司徒雷登1935年9月24日“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燕京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燕大有的专业和机构的建立，正反映了这个目的。新闻系是1924年，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毕业生聂士芬的帮助下成立的，与密大新闻学院挂钩，开展了互换研究员的工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马丁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都曾到燕京大学任教。由于毕业生质量高，受到国内各大新闻单位的青睐。司徒雷登夸耀地说：“有一段时间，中国新闻机构派往世界各大国首都的代表几乎全是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报纸编辑人员中的地位也同样突出。”^②

① 《教育季刊》，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编，第5卷，第1期。

②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 70

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教材都是照搬外国的，开了十几门有关宗教服务、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的课程。在教学上偏重于为教会服务和实用方面，不注重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美国人布济时为系主任，教师全是美国人。1924年聘请中国教师执教，专任教师许仕廉，兼任教师有北京大学教授、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司法部次长、监狱司司长王文豹以及朱积汉、朱友渔等人也兼职任教。1925年社会学系增设了社会服务短修科，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课程从10余门增至31门。

为了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社会学系扩大了教学组织，1927年分为8科1校，即社会学本科、社会学研究科、社会服务本科、社会服务研究科，社会服务专修科、宗教社会服务研究科、宗教服务速成科、社会服务函授科及暑假学校。1929年社会学本科又进一步分为社会立法、社会行政，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以及社会研究和统计四个组。由于提高了教学质量，全系学生人数亦逐年增加。1927年有学生48人，1930年增至76人，增长了58%，其他各系选修社会学系课程的人数，1927年为323人，1930年增至753人，增长了133%。^①

1928年，在美国洛氏基金会的资助下，社会学系在学校附近的清河镇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较大规模的调查，于1930年正式成立清河试验区。它的建立，是社会学系的一个创举，受到中外社会学界的重视。其最大特点是以认识和建设本国农村为目的，突破了为教会服务的局限。试验区下设经济、卫生、服务、研究四个股，主要开展了以下各项工作：组织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和经济作物管理，开办工厂

^① 傅葆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43页。

和医院,开民妇幼保健、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娱乐、体育锻炼等活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人才。

社会学系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联系,并得到该校的基金补助。它的建立,为我国打开了一条传播西方社会学的通道,在我普及和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①

在哈佛—燕京学社交换项目内,燕京大学为哈佛大学培养、输送了中国学的人才。1930年在北平成立“引得编纂处”,到1941年,对中国古籍以及175种日本期刊中的东方学论文篇目进行了分类整理,编出“引得”39种,特刊19种。^②

鲜明特色的系科和教学风格,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中国学子。从20年代初开始,燕京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不断上升:1920年为259人,1922年为461人;1924年为550人;1926年为619人;1928年为716人;1930年高达808人。^③学校也发展成为有文、法、理3院的享有盛名的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学生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无法摆脱中国现实政治对它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历次民主运动中,燕京大学师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燕京大学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并有人被捕。6月8日,在司徒雷登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上,竟发生了学生因去欢迎被捕释放的同学而无人与会的现象。1925年的“五卅”运动,燕京大学学生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与北京大学学生共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派出代表前往上海,支持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燕京大学

① 傅懋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

② 周建平:《哈佛燕京学社燕京部分的工作》,见《燕大年刊》,194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 《燕大年刊》,1930年;《燕京新闻》,1934年12月。

师生还发表公开宣言,抗议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对爱国学生的镇压。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蒙难,徐英受伤。在1928年“五·三”惨案的抗议活动中,燕京大学师生也走在前列。

二、岭南大学

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派来广州的传教士香便文(Rev. B. C. Henry)认为广州地点重要,向纽约长老会万国传道总会倡议办一所基督教高等学府,得到总会原则上的首肯。第二年,长老会哈巴牧师(Rev. Dr. Andrew P. Happer)亦提出同样建议。1886年在纽约设立董事局,至1887年已募得基金82000美元,遂于1888年在广州开办“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这是岭南大学的前身。由哈巴任管教。

岭南大学开创之初,虽然确定了学校与教会的关系,即学校不代表或不属于任何教会,董事局作为私人团体,不受教会直接支配。但学校宗教课和宗教活动依然存在,而且传教士在岭南大学活动的历史也表明,教会总是千方百计插手岭南大学的校政和教务,把持学校的一切。岭南大学虽不直接隶属任何宗派教会,但以基督精神为教育宗旨,却贯穿了学校的历史。学校开办时就标榜“本诸基督精神实施最高标准的教育”。学校计划书言:“通过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的教育培养一批有教养的基督教牧师、教师和医生等人才。”^①钟荣光1927年在就任校长的典礼上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又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

^① 《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6页。

督化。”^①这些话正表明教会大学以科学为媒,传播基督教义,培养基督精神的最初宗旨。

基督教的影响在岭南大学是一个主流。宗教活动无处不有,渗透到各个方面。1918年钟荣光曾著文说:“本校大、中、小学校,皆设圣经一科,礼拜日必由校内教员,或由本省城牧师教友中预定一人说教。主日学馆,则由各教职员分任教授圣经。”“1917年至1918年,学生受洗者106人,占学生总数十分之七。”^②校内各种宗教组织也经常开展各种宗教内容的活动。由于受本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觉醒运动的影响,各校对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在形式上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岭南校长钟荣光1936年甚至公开提出“信仰自由”原则。他为人书联道:“孔佛耶回,有教无类。亚欧非美,天下一家。”^③学校教职员的聘任及学生的招收,没有以信教为条件,也没有宗教教派的界线。外国教职员来自不同的宗派教会,如美国长老会、圣公会,英国卫理会、伦敦传道会,加拿大联合教会、纽西兰长老会、公理会,瑞典传道会,美国玛利诺会,法国天主教会等。据报道:“校内华籍教职员与学生非教徒实居多数;西籍教员亦来自英、美各不同的宗派。”^④有人称该校教徒与非教徒学生“相处相得,情谊亲切,校方毫无偏视的待遇”。^⑤

学校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学杂费收入。来自美国的捐款,1928年至1929年仅占总收入的0.28%;1929年至1930年度占3.88%;1931年至1932年度占2.25%。英圣公会、美长老会及天主教会仅提供教员,未给经济补助。在向中国政府立案前,

①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46页。

② 钟荣光:《岭南大学》,《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8年第5期。

③ 《岭南校友》,第13期,第18—19页。

④⑤ 简又文:《岭南我岭南》,《岭南通讯》第19期,第18页。

岭南大学一直由美国人控制。从学院监督、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的院长到图书馆长等,无不由美国人充任,行政及教员中西人占多数。例如,1920—1921年该校西方人在领导职位及教员中占了很大优势。^①

级 别	西 人	华 人	总 数
行政人员	7	2	9
教 授	10	1	11
副 教 授	3	1	4
讲 师	7	3	10
	27	7	34
重复计算	3	0	3
总 数	24	7	31

学校早在1885年就订定了由中国人自办的目标,宣称“一俟中国人得有办学之经验及能力,便将学校主权归还”。1900年钟荣光受聘之时,定有进行自办的计划:“第一期,国人应参与校务,供给意见,相助为理;第二期,国人应有实际之担负,筹措一部分经费;第三期,应勉力自立,使主权属诸国人。”^②及至1927年1月,校董会才正式委任钟荣光为校长,设在纽约的董事局改称美国基金委员会,派有代表驻校。岭南大学的房地产为基金会所有,由校董会向美国基金会以每年一元的租金租用。租约规定,如不能继续办学时,所有校产归美基金会收回。

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并驾齐驱,在国内较有

① 转引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81页。

②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1928年5月。

影响。早在1916年9月,岭南大学便成立了农学部,有农田150亩。在蔬菜方面,除种植华南著名品种外,还引进美国甜糯米粟、甘笋、秘鲁绵豆等,均属优良品种;在树木方面,由澳洲输入桉树和良桦种子,试种成绩良好;在农具方面,除使用中国传统的犁、铲等外,尚有美制割草机、手扶播种机、手扶除草机、手扶中耕机和手扶单铧犁等;在园艺方面,进行荔枝、番瓜,柑桔等水果的繁殖试验,获得成果;还进一步改良了从夏威夷和东南亚进口的许多新品种果树,对广东省新兴农业计划帮助很大。

1917年秋季,纽约董事局派生物学教授考活(C. W. Howard)到岭南大学充任生物系主任。1918年,农学部由考活接手教授动物学。考活专研蚕桑。高鲁甫掌教务,授园艺课,兼主持采集植物标本,设植物标本室。美国人罗云飞(Carl. O. Levine)主管乳牛业务并授畜牧学课,设牛乳试验室。1921年,在广东省政府、广东基督教教育会和一些中国商人的支持下,岭南大学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丝业突起,我国生丝出口遂大受打击。广东蚕种不良,蚕病丛生,蔓延极广,岭南大学便培育出无病毒的蚕种。1918年春,美国丝业会捐助13000美元为岭南大学建筑蚕桑学院之用,并从此受纽约万国丝业研究会的委托,试验改良蚕丝;学校遂设蚕桑科。1918年冬,美国丝业会会员芬铎来中国游历,到岭南参观,复又捐赠8000美元为种桑及筹办蚕桑传习所经费。^①1923年7月,广东省长廖仲恺又拨款5000元港币给蚕桑科做研究经费。1923年8月至11月,考活等历时4月,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遍及广东、广西32县,并发表中英文本《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1923年11月,广东

^① 谭锡鸿:《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广州文史资料》第13辑。

省政府委托岭南大学设广东省蚕丝改良局,调查、改进广东蚕丝生产,由考活任局长。1924年胡汉民又拨款1500银元,为调查日本蚕丝业之用,7月,考活赴日考察。^①1927年蚕桑科改为蚕丝学院。

岭南大学标榜要“施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到30年代,岭南大学继承过去的“办学经验”,把学校建设成为一个多学院的综合大学,有医、农、工、商、文理等6个学院共约30个系,所开科目逾400种。而文理学院设立了中文、外文、政治、历史、社会、教育、心理、生理、化学、物理、数学等11个系。其中社会系开设有概论、原理、病理、人类学、家庭、心理、言语、宗教、贫困、救济、文化演进、乡村城市社会学、组织秩序、犯罪、行政、调查、普测等近20门课程。岭南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五个系。工学院成立于1929年。钟荣光曾应邀与国民政府铁道部商议合办工科学院,目的是为国家培训铁路及公路方面专门技术人才。成立之初,得粤汉铁路拨助60000元,支持学院之常经费;毕业生亦多分别为珠江水利局、粤建设厂、公路处、市工务局征用。这些“皆适合时代,足应要求”的世俗教育的实施,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化培养了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人才。

三、湘雅医学院

1902年,美国耶鲁大学部分毕业校友发起的耶鲁国外传道会(即后来的雅礼会)正式成立,决定来中国传教、办医院、办学校。1903年,在湖南的10个基督教传教会一起议决,正式邀请美国耶鲁大学传教会将长沙作为教育事业中心。1905年正在孟

^① 李威士:《岭南大学改良广东丝业的忆述》,《广东文史资料》第13辑。

买开业行医的美国医师胡美(E. H. Hume)接受雅礼会之聘,离印赴长,于1906年在长沙创办雅礼医院。

1911年11月,胡美在妮娜·盖仪贞(Nina. D. Gage)女士的支持下,在雅礼医院创办了雅礼护病学校,专门培养训练男女职业护士。1910年,受过耶鲁大学医学教育的中国医师颜福庆博士接受了美国雅礼会聘请,回国来长沙雅礼医院与胡美合作共事,着手筹划办学事宜。当时任湖南省政府兼督军的谭延闿也在兴办学校,想创设医科学校,80多位湖南绅士也积极倡议兴办医学。胡美、颜福庆创办医科大学的设想得到了谭延闿等人的支持。

1913年7月,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共同签署了合作兴办医学教育的协议书。当合约送北京政府审批时,国务院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为由驳回。1914年春,湖南西医代表上京陈词力争,得到北京政界30多名湘籍人士支持,随即由35人发起组成湖南育群学会,推举当时总统府顾问章逸骏为会长。此后,以民间团体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出面与美国雅礼会合作,依照前约于1914年7月21日正式签订了合作办学协定,联合创办一所西式医科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具体目标是:①设立一现代化医学院;②兴办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③在医院办一所护士学校,培养护士和助产士;④筹设研究病因和医学科学的实验室。协定还明确:由育群学会和雅礼会各举10名董事,组成湘雅医学会董事部。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长沙潮宗街举行了成立大会及开学典礼,由颜福庆任第一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兼湘雅医院院长。

医学院开办之初,经费主要来自湖南省政府的津贴、国内及美国雅礼会的捐款。协定签订后,中美双方都承担了协定中的实际义务,育群学会只是作为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之间唯一

技术上的桥梁。协定中的一切经费责任,实际上仍由省政府承担。省政府拨交潮宗街公房一所作院校之用,首次付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开办费 10000 银元及 50000 银元的建筑费,并为医学校和护士学校建造校舍,包括 15.6 万银元的建筑费和价值 50000 银元的 9 英亩土地,还提供每年维持学校与医院的经常费 50000 银元。雅礼会则负责建造医院,承担医院设备费 15 万美元,并提供 15 名教师、医师和护士等人的薪金及其它费用。高年资教师、临床住院医师和护士督导等人员,均由雅礼会董事会负责选拔。1915 年,医学校得美国罗氏基金会的常年补助。

1924 年,第一次合约期满。几经商榷,达成一个续约 10 年的折衷方案:医学校完全由中国人自办,雅礼会撤销对医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权,由育群学会单独组织校董会;医院仍由中美合办,始设中美双方联合组成的医院董事会。1927 年,受大革命洪流的冲击,医学院美籍教师纷纷离长,学校暂时停办,雅礼会亦不能负医院经济之责,由湖南省政府临时津贴 10000 元,恢复医院工作。1928 年以后,雅礼会代表又来到湘雅,并陆续派来了教授、医师、护士等参与湘雅的教学、医疗工作。医学校于 1929 年复办后,省政府每年津贴增至 85000 元。1931 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医学校立案,并更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1934 年续约期满,医学院经费全恃省政府、教育部补助费以及中英庚款补助费维持。抗日战争时期,医学院迁到贵阳后立即遇到经济危机,在 1939 年至 1940 学年度几乎濒于停顿。为此医学院不得不进行所谓国立运动,申请把湘雅由私立改为公立,经费由教育部拨给,以解脱学院的困境。1940 年秋正式更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在国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享誉中外。当时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这要得力于湘雅一贯奉行的“高标准,严要求”。医学院最初创办之际,校董会制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要

在湖南兴办一所第一流的医学院校。胡美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深受该院医学教育改良派的熏陶，来华后立志兴办高标准高质量的医学院，使之能和美国第一流的医学院媲美，力争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以及完全用英语教学等。因此，学校“本科所习，各科课程之支配，悉依照美国医学校联合会所订课程”。^① 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前期、后期的设备都与美国同类院校差不多。从预科一年级起，除国文、伦理、图画外，教科书一律要求习用英文。

医学院有严格的升级制度，随时淘汰。学生因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比例相当大，主要原因是功课繁重，要求严格，而且英语授课也是一道难关，故卒业者不及入学的 1/4。至 1927 年仅毕业学生 7 班，49 人。解放前该校的毕业生总计 358 名。^② 凡在本科毕业生，美国康州政府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以示与美国医科大学程度相当。

学校开办之初，颜福庆校长就号召学生努力钻研业务，学好本领，争取成为第一流的医学人才。学校对学生在学业上要求甚严。大多数教师事先不通知学生，不定期的举行测验。如果跟不上班，就得降到下一班学习，甚至被勒令退学。^③ 某实习医员给学生开阿托品，因记忆不准，将剂量多开了 1000 倍，幸药房把关，才免除一次医疗事故，颜院长得知此事后，即召开教务会议，决定延长该员实习期六个月，并通报全院。^④

注重社会服务工作，是湘雅医学院的教学特色之一。学院曾

①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概况》，《新教育》第一卷第五期，1918 年 8 月，第 187 页。

② 张孝騫，《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第 5 页。

③ 黄友岐，《我忆“湘雅精神”》，《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第 47 页。

④ 凌敏猷，《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第 14 页。

详细拟定《公共卫生科计划书》，扩充公共卫生科，注重化验技术人员，公安局卫生人员等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培养，以及民众卫生教育、城市卫生、流行病的防治；还设有研究所，研究各种地方卫生问题，诸如肠热病、痢疾及霍乱等的预防。自1922年以来，该院鼓励学生利用暑假进行调查，每一学生调查一县或一地理区域的卫生状况。1932年8月，学院与国际联盟卫生委员会代表Dr. J. B. Grant 商洽，拟聘请专家教授公共卫生科。1934年暑假举办了附设技术讲习所第一班，录取技术生16名，学制三年，除了学习理论课外，主要分配到各科实验室、药房、化验室训练实际操作技能。从1935年起，每年毕业一班学生，也参加一些公共卫生和防疫救灾活动。在喜峰口战役中还派了师生联合组成的医疗队去支援浴血抗战的部队。1935年春，学院协助湖南省卫生实验处开办了长沙县卫生院、湖南产院和传染病院等。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继续南犯长城各口，战事不断发生，湘雅师生群情激愤，自发组织了支援抗日医疗救护队，王子珩院长、肖元定教授等率领医疗队亲赴前线支援抗日达半年之久。9月，在院本部又组织了战时服务团，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准备。

湘雅医学院是由美国民间团体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开办的，它不隶属任何宗派差会，虽然曾接受过教会的捐款，但既不是经常性的，也非主流。由于雅礼会派来的合作人员大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宗教的影响也如同其它教会大学一样存在。张孝骞院长在194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学生一半以上为基督教徒”。学生组织包括学生基督教青年会等。“湘雅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有99名成员，大都为基督教徒，它与贵阳市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密切联系，开办查经班和支持

星期天礼拜。”^①湘雅学生的积极分子纷纷投身到民族觉醒的爱国运动之中。“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主办《湘江评论》，受到当局的压制，无法印刷发行。以龙伯坚为首的一批湘雅学生如张维、李振翩等在院内代为秘密刊印发行。长沙市组织学生联合会，湘雅学生张维被推举出任主席。1923年在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中，湘雅学生也积极参加，张维、李振翩、高镜朗等和其它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率领下同上北京控诉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在大革命洪流中，湘雅学生先后加入了北伐军充当军医或担任政治宣传工作。陈文贵、王肇勋、张毅、凌敏猷、肖卓、徐克钦等湘雅学生还奔向叶挺和贺龙所领导的部队，光荣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湘雅医学院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解放前的30多年中，毕业人数虽不多，但绝大多数投身在教学和公共医疗卫生岗位上，极少数从事私人开业的，即使在抗日战争和艰苦岁月中，也多能坚持不懈。湘雅培养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医学专家，如内科学教授张孝骞，微生物专家谢少文、汤飞凡，放射学家谢志光，外科学专家董秉奇，细菌学家和病毒学家李振翩等等，使湘雅名声传遍南北，享誉中外。

西医最初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医院传入中国的。利用医学来达到传教的目的，也是一部分传教士的意图。他们认为“医生的工作和目的，……既不是为着介绍西学，……也不是为慈善而慈善，……他们无非是用治病作为传教的手段而已”。^②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嘉惠霖《在牛痘刀尖上》一书里说：“外国人用大炮、飞机都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帕克牧师用

① 张孝骞：《国立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的情况》，《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31页。

②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

一把牛痘刀就把它打开了。”并以轻蔑的口吻说：“在中国的愚蠢人民中，只有用医学才能打开它的大门。”诚然，并不是所有来华的外国医学人员都是抱传教目的而来。教会医学校在客观上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了中国，起到了引进和推广的作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医学教育，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卓有成效的医学人材。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日益觉醒,提出了外国人在华办教育的利弊存废问题,教会学校成了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1924年开始的历时四年之久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焦点。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教会学校不得不以退为进,“遵规定立案”,形式上成为国民党南京政府“青天白日下的私立学校”。

第一节 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基督教会势力及教会学校得到迅猛发展。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占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的旗帜。”^①20年代初,基督教(包括新、旧教)在中国的信徒总数达到200多万。同时,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也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为16836人,1920年则达到245049人,30年中学生增加了15倍。到1924年,教会学校学生在基督教学校中约30万,天主教学校中约26万,总数达56万人。^②1919年14所教会大学组成了“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14校的学生共2017人,常年经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集,第526页。

^② 转引自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费共 122.2 万银元,经济实力堪与当时五所国立大学相匹敌。^①

教会教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向我们民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因为“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稣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而“基督教教育对于中国教会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② 他们的主观愿望,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在 中国建立一种殖民地化的社会制度。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基督教及教会教育,揭露隐藏于基督教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质,就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使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界就出现过反宗教思潮。蔡元培、胡适、朱执信等人先后著文批判宗教迷信,反对宗教教育。1920 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除集中精力从事马克思学说的研究翻译外,曾酝酿过组织“非宗教同盟”事宜。^③ 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西方宗教的了解和介绍。在法国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曾给巴黎大学的教授们寄去一封传阅信件,询问宗教与现代化是否匹配及中国是否需要宗教等问题。他们收到了巴黎大学中国史教授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和巴黎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哲学教授宝角的答复,他们对此都作了否定的回答。法国的学者们说宗教对于原始人来说也许是需要,但对现代人已不再需要了;科学也许已使宗教名誉扫地。^④

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连续出版了三期宗教

① 当时国立 5 所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山西大学常年经费为 1492223 银元。参见《中华教育界》第 14 卷,第 8 期,第 8 页。

②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 80 页。

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 90 页。

④ 《中国教会大学史》,第 205 页。

问题专刊,发表了恽代英、田汉、周太玄、陆志韦、沈雁冰、陈启天、余家菊等人的文章和译文,发起了对宗教的批判。

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抨击,为非基督教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但传教士对此却感到恐惧,认为中国已成为反基督教运动的地区了。在美国人的主使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便决定在北京举行第11届大会,这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成为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1895年由穆德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国际性团体,以各国在校基督教大学生为主要活动对象。它的主要目标是：“(1)联合全世界的学生运动；(2)搜集世界各国关于学生宗教情况的情报；(3)推行下列各项活动：领导学生承认耶稣基督为唯一教主，成为他的信徒；加深学生的精神生活；征募学生往全世界推广天国的工作。”^①其口号是“合而为一”，即把世界各国的基督教大学生统一在“同盟”的旗号之下，标榜“维持非政治的性质”。穆德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以后，曾遍游世界各国，鼓吹成立各国的“基督教学生运动”，穆德选中在中国举行第11届大会，是因为他“认清那时中国是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地点”。^②传教士认为，“把这次国际性会议放在中国举行，我们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对未来无数年月中将给中国带来果实”。^③表明传教士企图以此次大会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抵消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青年的影响，这是对中国的公然的挑战。

为了配合大会的召开，还决定其刊物《学生周刊》一月专门发表关于中国教会、中国的基督教育等方面的文章。中华基督教

^{①②} 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51页。

^③ Ruth Rouse, *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s*. 转引自《北京青运史论集》，第48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青年会的刊物《青年进步》也于2月出版特刊,以准备会议召开。

1922年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借清华大学为会所召开第11届大会。由穆德亲自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另有中国代表550余名,再加上其他列席代表,与会者共700多人。北洋政府特派步兵统领亲率大批军警到会场保护。在4月7日那天,总统还接见了全体代表。大会的格言是“天下一家”。大会的主题是“基督在世界重建中”。共分六个专题:国际与种族问题;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传基督教;学校生活之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和如何使女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世界中成为更强有力团体之一。^①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集会。

针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直接向中国的挑战,在大会还未举行的前一个月,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议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着手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1922年3月9日公开发表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指出:

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

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

^①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52页。

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①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也这样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智日开,宗教日促;是以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之说,日渐弥漫于欧洲。彼昏不悟,仍欲移其余孽于域外,以延长其寄生生活;政府巨商,以利其为殖民之先导;于是四福音书遂挟金铁之威,以临东土。金铁奴我以物质,福音奴我以精神。东南文盛之区,悉变而为耶教化资本化,无复清宁之气,岂不可悲哉!华府会议,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无端集合于我弱国之首都。我爱国青年之血泪未干,焉能强颜以颂上帝。”②

3月20日,北京学界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当天《晨报》发表了通电和宣言。宣称同盟的宗旨是“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精华”,立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③ 4月4日,即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当天,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上又发表“非宗教者宣言”。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召开了有2000余人参加的讲演大会,宣读了蔡元培的演说辞,他强调教育应同宗教分离,并反对基督教会利用清华大学开会。此后,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地,都设立了分会。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青年学生,纷纷发出通电、通函,在全国展开了一个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其中以广东反应最为热烈。其时汪精卫为广东教育会长,他一方面电复北京的李石曾,表示坚决支持非基督教运动,一方面又撰文称:“耶教是进化学的仇敌,是一切科学的仇敌”。④

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帝国主义分子日益惊恐。他们知

①② 见《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3月21日。

④ 《批判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转引自刘心勇,《非基督教运动述评》,《复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道这场运动将唤起更多的中国人的觉醒,必然危及到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时上海各英美报社纷纷登载非基督教运动的消息,发觉中国的“知识阶级……遂无老无少,群起而反对。宣言通电,雪片纷飞……起于北京,遍于各省”。“莘莘学子,益争先恐后,唯攻教之事务”。^①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在社论中威胁说:“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在迅猛发展着。……如果他们不约束他们的热情,他们将会有一天要懊悔,发现这个运动已无法控制,并给这个国家带来说不尽的灾难”;“中国政府应很好地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否则非基督教运动将成为装满弹药的火药库。”^②

这次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固然得到各大中学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但是从1922年下半年起,示威行动和罢课活动开始减少,它还没有提出明确的纲领和直接的目标,学生组织虽多,而其中不少组织的结构还比较松散,当暑假到来后学生各自回家,一些活动慢慢停止下来。

然而,非基督教运动在中国教会大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进一步唤醒了人们对西方列强在华从事教会教育的认识,为稍后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打下了基础。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始回落,正是一步一步酝酿着更大的和更高水平的斗争高潮的到来。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非基督教运动再次高涨。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下,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首先重建。其宗旨是:“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

^① 《批判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转引自刘心勇:《非基督教运动讲述》,《复旦学报》(文科版)1989年2期。

^② 转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56页。

及其所办一切事业。”^①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指导，在组织上成立了有共产党员唐公宪、张秋人、柯柏年等参加的五人委员会，并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从8月19日起，出版了25期“非基督教特刊”，不断报道各地非基督教运动的发展情况，刊登大量文章，从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抨击在华的基督教势力。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绍兴、九江、长沙、广州、青岛、西安、太原、重庆及河北、河南等地都成立了非基督教同盟。

1924年12月16日，上海的《非基督教特刊》发表社评，建议12月22日至27日圣诞节前后一星期为“非基督教周”，号召各地青年发动大规模的反教活动。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与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合编出版了《反对基督教运动》一书。在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革命政府支持了反教活动。12月25日，廖仲恺、周恩来等人应广州非基督教大同盟的邀请，到广东大学礼堂演讲，支持青年学生反基督教的正义行动。^②

“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巨大反响。以后连续两年，每到圣诞节，全国各地青年都积极开展“非基督教周”活动。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决定将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传播到青年工人中去。在北伐战争中，非基督教运动又成为北伐舆论工作的一部分。这时的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互相配合。

① 《非基督教同盟简章》，载《觉悟》，1924年8月19日。

② 转引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第105页。

第二节 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一、收回教育权斗争的爆发

非基督教运动中对基督教利用教育为宗教服务的批判和抨击,在当时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教会学校宗教奴化教育的基础上,与非基督教运动相结合而展开了。

非基运动揭露了教会学校的阴暗面。杨贤江在《反对基督教运动》一文中称教会学校：“(1)专制。不许学生自由行动、自由思想。(2)恐吓。骗小学生说：‘不信上帝，有魔鬼来袭’。(3)强迫。不信教的也要做礼拜，也要查经。(4)虐待。不做礼拜，不准请假，还要挨饿。(5)守旧。课本、教法、行政都陈旧不堪。(6)禁止爱国。平时辱骂中国，不许参加爱国运动。”^①因此，当时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了教会学校的宗教奴化教育。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收回教育权的舆论便在此“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中酝酿了。1917年，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家校长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作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讲演，抨击了宗教教育，揭示了宗教奴化教育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五四爱国运动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思想解放的进程，一些教育界人士“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就收回教育权问题“一致同倡”，广造舆论。

1921年，教育部长范源濂在“直隶山西基督教教育会”讲话时说：“教会学校强迫做礼拜和读圣经违背中国宪法，因为中国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521—522页。

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①

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年会,通过了胡适、陶孟和、丁文江三人提议案,反对在初等教育中有任何宗教教育的内容。

同年,蔡元培在“非宗教同盟大会”上着重强调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此后又在《教育独立议》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②并且提出了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具体办法:“(一)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二)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三)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③

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对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九点方案,“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文化侵略政策”,^④并提出教育主权问题。同月,还印发了《民族主义教育》小册子。学会领导人余家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纷纷发表文章,就教会教育问题提出意见和主张,并揭露了教会学校对青年学生的毒害。所有这些,都为收回教育权斗争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1924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毫不隐讳地声言:“以后一

① 《教育季刊》第13卷,第131页。

②③ 《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145、146页。

④ 《中国青年》第29期。

切对华侵略,皆将以教育的形式出之。”^① 传教士控制下的教会学校当局也不断表现出保守、反动的一面。他们公然向学生扬言:“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② “教会学校,只可宣传宗教,不许谈论国事。”^③ “我不爱中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爱我们的美国。”^④ 这种奴化教育使教会学校的爱国热血青年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广州基督教圣三一学校的学生首先吹响了收回教育权斗争的号角。

1924年4月初,圣三一学校的部分学生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准备筹组学生会,这一正当要求遭到学校当局的无理拒绝。英籍校长训斥学生:“没得我的同意,何敢擅自发起组织学生会!”“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有英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徇你们的情,任从你们中国人的自由。”圣公会的英籍会吏长也威胁学生说:“学生会是有政治意味的,不准组织。”^⑤ 为了阻止学生会的成立,学校宣布放假,开除领头的学生,禁止学生集会,不准住校。圣三一学校学生不为其高压所屈服,两次发表宣言,揭露教会教育的黑暗,指出:“我们受那‘奴隶式’教育的学生,总是受过不少麻醉毒害,很少或者没有说过得罪洋大人的话,……我们国人向来都不在洋大人眼里,从此可以推测到我们同学所受的污辱与痛苦。我们自入校以来,从没尝过‘独立’国人民的待遇滋味。”“我们很知道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办教育的用意,而受过那种教育的更是明了。国外强盗只顾劫掠中国,并不是厚爱中国而来教育

① 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84页。

② 上海三育大学美国传教士对学生的话。

③ 岭南大学美国传教士对学生的话。

④ 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美国传教士对学生的话。

⑤ 《向导周报》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我们。……他们所需要的，是制造几个洋奴，好替他们做买卖，替他们宣传，侵略中国，这是从他们平时灌输给我们——宣传与学科，可以知道的：他们是想引我们背着进化的道路后退，制造成头脑简单奴隶性成的民族，任从他们宰割。”“活泼泼的中国青年，活活的装入那种‘车床’，变成了机器。”宣言提出了“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明确主张。^①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广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侵略，是中华民族的存在所关，并不是一件等闲之事”。5月20日，圣三一学校学生发出《广州圣三一学生退学宣言》，表示“在教育权没收回，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我们誓死不愿多受一日的奴隶教育”，^② 纷纷要求退学。

继圣三一学校学生的罢课退学风潮而起的是天主教主办的广州圣心学校学生的罢课斗争。5月7日，为日本强迫我国承认亡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圣心学校800多学生在校内举行国耻演讲会，竟遭法国人校长厉声呵斥：“中国的命运早已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③ 学校当局还驱逐赞成组织学生会的学生出校门，激起学生们无比的愤怒，遂以罢课退学之行动反对学校的专制，并两次发表宣言，揭露学校当局压迫学生，呼吁“全国青年联合起来，实行收回教育权，反抗文化侵略，打倒外国帝国主义”。^④

圣三一学校和圣心学校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国民革命政

① 《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向导周报》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② 《中国青年》第36期，1924年6月21日。

③ 《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向导周报》第72期，1924年7月2日。

④ 《圣心学生第二次宣言》，载《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

府中左派的支持。“圣三一”风潮发生伊始，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长廖仲恺、组织部长谭平山即召见罢课学生。之后，又召集全体罢课学生，表示坚决支持教会学校罢课学生的爱国行动。廖仲恺对学生们讲：“帝国主义好比是强盗，不平等条约好比是绳索，强盗抢了我们的东西，又用绳索把我们的四肢缚住，使我们动弹不得。……我们想得到自由，就要把象绳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尤其是要把帝国主义强盗打倒，打倒帝国主义，然后祸根乃除。你们所做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你们要坚持下去，一定得到胜利。”^① 孙中山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亦表示同情和支持。4月12日，圣三一学校学生派代表前往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得到孙中山的亲笔批示，认为罢课学生“惟已有此觉悟，亦属可嘉，可与邹海滨商量转学”。^②

“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先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中国”，^③ 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青年学生特别是教会学校学生为主要力量的、反对教会学校宗教奴化教育的爱国运动。

二、全国各地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924年6月18日，《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发表，这是当时爱国进步青年抗议教会学校奴化教育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件。《宣言》指出，“无形的文化侵略手段”，是“帝国主义者侵略弱小民族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最高明最狠毒的形

① 梁福文：《记大革命时期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反帝怒潮》，《广州文史资料》第16辑。

② 陈家文等：《大革命时期广州学生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广东文史资料》第48辑。

③ 陈独秀：《收回教育权》，《向导周报》第74期，1924年7月16日。

式”，是“想使中国人无一不在他们的教育支配之下，实施其亡国奴或殖民地的教育政策”。《宣言》明确提出了收回教育权：

我们最爱的学生、工人、农人、商人、同志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政策，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了，它的黑幕已由最近数间外人创办之学校的学生揭破出来了，我们应该一齐联合起来一致力争，“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这是民族关系，我们不可忽视，我们现在提出最低限度的办法：

（一）所有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与核准；

（二）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之支配及取缔；

（三）凡外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上正式编入、正式教授及宣传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念圣经；

（四）不许压迫学生，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①

这个《宣言》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震动，一时各地教会学校风潮不绝如缕。5月起，徐州培心、南京明德、福州协和等教会学校相继发生反教会奴化教育的风潮。1924年全年，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特别是广州、长沙和上海等地的教会大学和教会中学，以及河南、四川等省的教会中学，都曾掀起示威、罢课、退学等斗争。

1924年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即后来的中山

^① 《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向导周报》第72期，1924年7月2日。

大学)集会,听取校长邹鲁和孙中山政府的劳工负责人廖仲恺的演说,并谴责了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他们认为一切宗教都成了时代的错误,因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特别有害。中国绝不容许有宣传基督教的学校存在的余地。同时,非基督教同盟的成员分别走访了教会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到处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充分揭露教会教育侵犯我国教育权的实质。在可能情况下,还想强行扰乱教堂的礼拜仪式。在这些反基督教的活动中,有许多人是黄浦军校的学生。

同年11月和12月间,在湖南发生的五校反奴化教育的斗争“更有活气”。湘潭益智中学200多学生,举行“反对文化侵略,实行退学抵制”。长沙雅礼大学和雅各学校,益阳信义中学,以及醴陵遵道会学校等,斗争爆发时对学校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求学校立案”。各校退学而转学他校的学生,包括益智中学在内,将近千人。由于学联、教育主权维持会和国内各校学生会的宣传影响,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湖南教会学校没有立案,毕业后不能升学”的原始反对状态,转变成“根本取消教会学校,以退学反对立案为抵制”的斗争。教会学校学生在“退学会”签名时,订下盟约:(一)永久与教会学校脱离关系;(二)无论家庭如何压迫决不返校。其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

此外,同年11月,开封济济中学和重庆广益中学学生,由于学校当局特别重视圣经,忽视国文和其他学科,也都展开了斗争。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南京年会,根据余家菊、孙恩元、吴士崇等17人分别提议的《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对于中华民国人民施行国民教育案》、《请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案》三个提议案,经该社教育行政组审查委员陈宝泉等五委员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的审查会议修正,最后通过了《关于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主张:请求政府制定严密之学校注册条例,凡外人籍学校实行侵略经调查确实者,应由政府勒令停办;凡未经注册的学校及其学生不得享受已注册学校之一切权利。^①其核心内容是“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注册”。

同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开封举行第10届会议,通过了《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两个提案。提案指出:“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流弊甚多,隐患甚大。综其著者,约有四端:教育为一国最要之内政,外人自由设学,既不呈报我国政府注册,复不受我国政府之考核,此侵犯我国教育主权者其一;各国教育各有其应具之本义,外人之民族性质及国家情势,与我国不同,办理我国教育,自必扞格难合,此违反我国教育本义者其二;况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情同市侩,迹近殖民,潜移默化,将至受甲国之教育者爱甲,受乙国之教育者爱乙,于丙于丁亦然。独立精神,全被渐灭。此危害我国学生之国家思想者其三;试更就外人在国内所设教育事业之内容考之,主办人员,非多为宗教之宣传,即系有意于政治上之侵略。教育事业,其附属品耳。即如学样编制,大抵任意配置,学科课程,未能切符我国应具之标准。此忽视我国学生应有之学科者其四。”^②并提出具体办法11条,主要有:外人所设学校之设立事项,须合于我国颁行各项学校规程及各省现行教育法令之规定者,始准注册;外人所设学校及他项教育事业,须一律受地方教育官厅之监督与指挥;外人不得利用学校及其他教育事业传布宗教;学校内对教师学生,无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待遇。^③

① 《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1925年2月。

② 《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3月。

③ 《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3月。

1925年初,《中华教育界》杂志社为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出版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首页刊登“开收回教育权先声”的蔡元培先生肖像。并在扉页上用红字重印他的《关于教会教育的意见》和胡适先生《关于宗教教育的提案》以及上述教育团体通过和发表的所有关于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专号“通论”、“专著”等栏目还发表了陈启天、余家菊等8位教育团体负责人和教育界知名人士论述“收回教会大、中学教育权”的专论。其末尾“史例”栏转载《法国教育与宗教分离之经过》一文,介绍法国教育与宗教的“用意和效果”,以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深入发展。

五卅惨案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革命形势影响下更加如火如荼,汇成一股有力的反帝浪潮。

第三节 五卅、北伐与教会大学

一、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的教会大学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课。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总会也发表宣言,指出:“不平等条约……所给予我们的是这样惨痛的结果,我们还能让不平等条约存在一天么?”^①并把收回教育权作为向即将召集的全国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提出的谋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七项条件之一。

5月30日,圣约翰大学校友聂广绪到校,向同学报告五卅惨案情形,被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现,驱逐出校,^②并宣布禁止学生集会。6月1日,全校学生决定罢课。卜舫济却对学生说:“圣

^① 《中国青年》第91—92期。

^② 《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第77页。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

约翰大学是工部局管辖之学校，学生无反抗工部局之权。”但学生们仍然坚持与全市学校一致行动。6月2日，当学生列队准备出校宣传时，“校长亲自把守校门，不准学生外出，并面斥学生，谓本校误养一般强盗。学生受斥大愤，立即召集全体会议以谋应付。”^①卜舫济不得不宣布放假七天，企图阻止学生的爱国行动。

6月3日，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召集全体会议，决定在校内悬挂半旗为五卅死难同胞志哀。卜舫济却乘同学开会之际，将已经升上去的国旗取下撕毁。当同学另取一面旗子准备升上旗杆时，又被卜舫济当场夺下。同学们悲愤填膺，当即决定：“全体永远脱离该校，永不再来。”在决议书上签名的学生达553名，一部分华籍教员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也签了名，孟宪承等17人总辞职。在社会各界的协助、支持下，他们另组织了光华大学，来解决自己的学习问题。

6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酷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战斗目标。不仅成为上海爱国进步的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反帝的三罢运动的伟大动力，也把各地教会学校学生反奴化教育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再一次推向高潮。在这年6月到9月间，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用退学的战斗行动，投入反帝大潮中去。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4月至1925年9月，全国有五六十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为收回教育权而举行罢课，有些学生自动退学。^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机关几为之破产”，^③教会教育“大有不攻自倒之势”。^④

① 《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转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76页。

② 《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第82页。

③ 仲叟，《一年之回顾》，1926年7月，转引自《中国青年运动史料》三。

④ 《中国青年》第105期。

“在五卅以后的日子里，没有几所教会大学可以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仅仅几天之内，几十个城市里数万名学生就罢了课，他们到处奔走，鼓动示威游行，抗议毒杀手无寸铁的学生。”^①燕京大学学生与北京大学学生共同组织了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并派代表赴上海，支持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帝爱国行动。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同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学生运动决议案，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学生的联合阵线，努力宣传“学生运动统一”的口号；只能提大多数学生能接受的口号和主张，以扩大学生的联合阵线，统一学生运动；既要与国民党左派学生密切合作，又要十分恳切地邀请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基督教派的学生合作，以暴露其领袖的反动和无能；只能攻击教会教育，不必攻击教会学校，更不能攻击教会学校学生等等。“统一战线开始赞同让教会学校学生加入行动，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西方人的傀儡加以排斥”。^②

在北伐期间，教会大学学潮的起伏与革命军的进展紧密相连，“学生在北伐战争中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宣传民族主义为国民党军队开辟道路。他们在工农中煽动爱国热情，他们打入军阀部队中鼓动士兵叛逃。他们组织反帝反军阀的示威游行”。^③

1926年，金陵大学的进步同学冲破右派学生的阻挠，同金陵女子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召开了五卅周年纪念会，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同年暑假，金陵大学秦元邦和熊士杰两同学作为国民党左派南京市党部的代表，专程赴广州，要求国民政府

① 杰西·格·卢茨：《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见《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美)林蔚：《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36页。

早日出师北伐。在北伐军光复南京前夕，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金陵大学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面对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教会大学的负责人一般都表现出对革命进程的恐惧。他们要求学生把心收回到学业上来，认为从事那种谈判是政府官员的事。学校里的许多西方教师都来自具有清教背景的国家，因而具有一种独立于世俗事务之外的观念。同具有“五四”传统、以民族大业为己任的中国学生相反，西方人试图把学校办成一个独立于民族事务之外的天地。在五卅以后的日子里，教会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没有禁止学生的抗议活动，但他们中许多人仍对学生施加压力，要他们在几天的政治活动后返回课堂。华中大学的学生在上午走上武昌街头参加示威游行，下午返回教室上课。学校负责人甚至还要求学生把示威活动限制在校园以内，他们对学校卷进政治活动感到十分担忧。^①

有些学校，如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东吴大学，在允许师生简单地表达对运动的支持以后，匆匆结束了学年工作。有的学校，如沪江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华中大学，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而提前结束了学年工作。^② 学校用遣散学生的办法，藉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学潮。

由于对中国革命抱有消极态度，教会大学的外籍教员都奉命撤离。1927年7月，在中国的近8000名基督教传教士仅有500名左右仍然留在内地。大部分学校关闭校门，撤走了教职员，以免学校卷入政治活动之中，试图以此达到阻止学生参加革命运动的目的。

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中国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遭

① 参见杰西·格·卢茨，《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教和教会大学》，载《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08—109页。

② 参见《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30页。

到破坏,收回教育权运动也迅速衰退下去,国民党南京政府压制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学生运动在总体上进入一个压抑的时期。直到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学生的爱国热情再次燃起。

二、五卅、北伐对教会大学的影响

教会大学学生在五卅和北伐掀起的风潮中,要求取消宗教仪式,驱逐敌视中国革命的西方势力,实行中国人领导,并以退学的方式反对奴化教育。种种斗争,迫使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校政管理等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对教会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革命浪潮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有所表示,被迫于1925年12月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六条:(一)凡外人捐资设立各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须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上应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过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为必修科。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9月间即召开收回教育权会议,着手从外国人手里接管教会学校。国民党“二大”通过的《青年运动报告决议案》也提出“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

1927年1月10日,湖北政务委员会、汉口市教育局颁布了《取缔外国人设立学校条例》,从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宗教活动、人员任免等方面对教会学校作了明文规定。^①

^① 《民国日报》,1927年11月10日,《湖北教育史资料》,1985年第1期。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保护私立学校案》、《宗教团体与办教育事业办法》等法令,规定了立案条件,主要有:(1)校董会要改组,中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不得以外国人为主席或董事长;(2)校长要换中国人充任,如有特殊情形的,得另聘外国人为顾问;(3)教学之组织、课程、教授时间及其他一切事项,须根据现行教育法令办理;(4)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也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

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期间,对教会学校的冲击不仅来自知识、文化界,也来自教会学校学生本身退学的压力,运动波及全国,致使教会学校门庭骤然冷落。

在这种形势下,教会大学不得不作政策的调整和教学方向的改变。1925年4月,一贯为外国传教士所控制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发表了一个宣言,虽然极力诡辩,坚持其原有立场,但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形式上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采用政府之标准,受政府之监督指导”。还通过了决议,“基督教学校,应采用‘新学制课程’,且在精神上、文字上两方面,均须力谋适合标准。对于总统明令颁布之教育目的,尤应努力,力求达标准纲要上之教育理想与原则。”^①

1925年,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决定“注意教授同学,……必须设置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及哲学”;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年会上通过“教会大学注重国文”等一系列决议;1927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定:“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管理。”同年,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也通过了“关于中西教职员平等待遇”等决定,并向中国政府作接受注册的表示。这都预示着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教会学校在中国推行的宗

^① 转引自:《中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教奴化教育政策的某些变化,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和学生反帝斗争的恐惧、以及害怕受不平等条约庇护的教会大学将被拔掉。

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期间,教会大学的外籍校长在离校之前,都匆忙地指定中国人为代理教务长、代理系主任或代理校长,并授予他们可以作出合乎紧急情况的决定的权力。管理委员会中的中国成员被授权承担委员会的全部责任,以及增选了自己认为需要的成员。事实上,传教士教员在1927年的撤离,使中国人取得了学校的一部分行政领导职位,多数教会大学开始采取行动,履行注册条件。1927年起,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14所教会学校被迫向中国政府登记立案,学校董事长、校长大都改为中国人担任。岭南大学于1927年由钟荣光任校长。金陵大学自1910年至1926年,一直由美国传教士包文(A. J. Bown)任校长;1927年包文迫于形势辞职,由中国教员组成校务委员会,在名义上开始由中国人领导;同年11月,推陈裕光掌校,主动呈请立案,于1928年获准,是当时国内最先立案的一所教会大学。东吴大学在1927年前,三任校长均为美国传教士,1927年改由华人、东吴大学毕业生杨永清担任校长,在15名校董中,华人占2/3。燕京大学在1929年选任吴雷川为校长,司徒雷登则改称教务长,校董会中中国人占21位,外国人13位。其它如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请王世静任院长,之江大学聘李培恩掌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请吴贻芳、沪江大学请刘湛恩、北京辅仁大学请陈垣、武昌华中大学请韦卓民、山东齐鲁大学请世清、福建协和大学请林景润,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请张凌高任校长。只有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例外,自1905年到1939年长达35年中,一直由美国人卜舛济掌校;1947年,由物理系主任涂羽卿担任校长时,始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

各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程度不等地作了变更。虽然仍然开设宗教课程,举行日常的礼拜仪式,但在大多数学校里,这些活动都取消了硬性规定,变成了自愿参加,并且所吸引的学生,也越来越少。汉语也在教员会议、备忘录以及其它交际活动中代替了英语。

“五卅”和“北伐”期间,教会大学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们并没有保留原来的样子,它们既没有被破坏也没有被完全改变”。^① 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下,1925年那种“教会大学的校长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除国文系外,各系的主持人几乎都是西方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变,至少在形式上,教会学校不再是外国人管理的宣传外国教义的学校了。一位美国学者指出:“中国政府的规则代替了美国的规则,成了学术标准的主要内容。”^② “教育成了学校的主要目的,传播福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③ 教会学校也被迫为中国的教育服务。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会大学的变化情形。此后,教会大学着重于提高教学质量,以此吸引中国学生,而且教育与宗教基本上趋向分离,逐渐转变为以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主。但是教会大学的经济大权操在教会差会之手,传教士在校政和学科设置等方面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传教士教员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其“为基督征服中国”的目的,他们更加注意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以前,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教会大学的性质,使教育主权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① 杰西·格·卢茨,《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教和教会大学》,见《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48页。

第四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第一节 在中国民族觉醒面前的新措施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

1919年“五四”运动的反帝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教会势力。广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教会大学的青年学生开始觉醒了，他们纷纷投入到运动中去，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搏斗。天津的天主教徒是最先的倡导者，是年6月，他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公教救国团”。接着天主教徒聂醒吾等又在《益世报》上发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指出近百年来列强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教案一起，非丧权即失地”，我国一部分领土“遂随保护之声长逝矣”。^①最后他们号召天主教徒应立即行动起来投身反帝爱国斗争。

面对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教会决定采取使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这个措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以适应中国的习俗；其二，尽快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用教皇本笃十五的话说，就是“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②

为了实现天主教教义儒学化的目的，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

^① 天津《益世报》，1919年6月11日。

^②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13页。

放弃他们狭隘的教义，收敛起胜利者的骄横气焰，力图表现出亲善的样子，在口头上附合儒家的教义，企图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思想拼合在一起，以便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

天主教创办的《教会新报》总述这样写道：“耶稣圣教与中国儒教各虽迥别，道本同源，皆存心养性之学，非诡僻怪异之言”，并认为“儒教法本其才，专与耶稣教异同”，“祭礼正宗论西学祭天”，“儒教言道不可离与耶稣教同”，“儒教中庸与耶稣教同”，“儒教不怨不尤与耶稣教同”，“儒教时习而说与耶人为己，同出一原”。^①《教会新报》的主要内容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调和两种思想矛盾。当时，从所有传教士的口头上也经常可以听到“上天无亲，中西万国，一视同仁”。更可笑的是，传教士还到《圣经》中找理论根据，据《圣经》耶稣之训曰：“天下一家也，众人兄弟也，所谓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也。”硬把两种格格不入的教义说成是“相同”，以此来转移视线，消除儒学士子的排斥和民间的反抗，以更利于他们深入内地的传教活动。

但传教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向儒学屈服，而是为了要以基督教思想为工具来麻痹中国人民，最终目的是取儒学而代之，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基础都未成熟因而暂时地与儒学妥协，以为缓兵之计。

为了实施尽快培养中国的神职人员的措施，教皇庇护十一先后于1922年和1932年两次派教皇钦差到中国活动。

对于罗马教廷来说，把中国籍神甫推到第一线是实现天主教中国化的关键。为此，教皇首先于1923年确定以湖北省的蒲圻为“国籍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神甫成和德为监牧。1924年4月，教皇又确定河北省的安国为“国籍第二宗座监牧区”，任命中国

^① 《中东战纪本末》卷6，第16页。

国神甫孙德桢为监牧。1926年10月,有6名中国神甫特地由各修会送到罗马去,在圣彼得大教堂由教皇亲自为他们“祝圣”,升为主教,其中河北省有2名,即安国的孙国桢、宣化的赵怀义;江苏1名,即海门的朱开敏;浙江1名,即台州的胡若山;山西1名,即汾阳的陈国砥;湖北1名,即蒲圻的成和德。这是在1926年2月间因教皇庇护十一发出的“谕旨”明确指出“不得阻碍中国司铎担任司铎区及大主教区之主教”后,中国各修会不得不遵命连忙推举这6个人上罗马“祝圣”。

到1933年6月,教皇庇护十一又在罗马为3名中国籍主教补充“祝圣”,他们是:河北省集宁的樊恒安、永年的崔守恂,四川省雅州的李容兆。

到1936年,中国籍主教已增加到23名。

增加中国籍神甫是天主教“中国化”过程中着意增加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又一重要措施。最初在18世纪时,中国籍神甫只有15人,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天主教中国籍神甫约增至130人,到1900年增至470人,而到1920年达到963人,几乎增加了一倍。经过有意识的培训提拔,到1930年中国籍神甫已达1500人,到1933年达到1600人,与此相应,增加的中国籍修女到1933年约达3600人。

应当指出,天主教的所谓“中国化”措施,不过是一个烟幕弹,其实质是把中国神甫推到第一线,外籍传教士在幕后操纵,它的目标是使天主教能在中国革命新形势下更有效地扩展其势力。他们的口号是:“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和精神征服。”^①过去主要是由传教士直接出面扩展教会势力,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军舰大炮的支持,如今时代不同了,中国革命

^① 戴利亚:《天主教会在中国》。

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人民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斗争的方式也与以前不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正在逐渐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阶段上来。在此情况下，要维护和发展教会势力，必须有新的对策，这也就是天主教继利玛窦之后再次进行所谓“中国化”实质所在。

二、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什么是“本色运动”呢？根据美国基督教新教差会负责人穆德在中国主持召开的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中称：

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①

据新当选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的解释，“本色教会”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它所倡导的所谓“三自”，即由中国人“自养”、“自治”、“自传”，也同天主教所鼓吹的“中

^① 《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1922年》。

化”一样是一个烟幕弹，利用一批中国籍神职人员，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为扩展教会势力效劳，而由外国传教士特别是由美国传教士进行幕后操纵。这个所谓“三自”，除了在30年代初经济大危机时期强令中国教徒多多捐输外，一直到1949年根本一条也没有实施过。

当时为什么特别提倡所谓“本色教会”呢？1922年3月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揭露了教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本质，它本来就是外国侵略者的一个工具，所以被称为“洋教”。为了摆脱这个不光彩的称号，有必要涂上一层“本色”，让中国人出面“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西洋的色彩”。西方教会组织纷纷把差会冠以“中华”二字，似乎这样一加，就换成中华牌了；与此同时，还鼓励一些中国传道人成立“中国自立会”、“中国基督教会”、“国内布道会”等名目繁多的所谓“三自”教会或传教团体，可是它们却没有一个不是接受外国津贴的。

第二节 农村实验区工作计划流产

一、“实验区”计划的实质

天主教的所谓“中国化”和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其重点是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由于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已由城市退却到农村，于是西方传教士很想配合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移向农村，以便和共产党争夺农民。这正是西方教会在中华民族觉醒面前所采取的新措施。

早在1923年，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专门设置了一个“乡村工作特别委员会”，首先对农村作进一步的调查。它要求：(1)调

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农村教会和以农村教会为生活中心的活动现状；(2)搜集和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和宗教改革实验的情报，为教会势力深入农村作好准备。

192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又与南京金陵大学联合召开了所谓“农村工作会议”，有15个省的16个基督教差会的270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要根据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对乡村活动的决议，在农村推广“本色教会”，并以农村教堂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情报调查和农村改良活动，以扩大农村教堂对周围乡村的影响，把农民吸引到教堂中去。但是不久由于活动经费短缺，此项活动没有全面展开。

1927年以后，中国处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第一次历史转折时期，特别到193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决定选择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进行农村实验试点区，由金陵神学院和金陵大学农科具体负责试行。主持人美国传教士毕范宇在1931年到1933年连续三年带了学生到淳化镇“实习”，并于1932年在该镇设立了“乡村训练中心”，占有了36亩土地，种植试验作物，设立乡村服务，办理乡村合作信贷，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党化教育”，宣传宗教，且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攻击和诬蔑。他们利用小恩小惠，实施一些改良主义措施，进行反共说教，企图把农民拉到教会周围的一个实验区。所谓“本色教会”已远远离开了原来自己下的定义。

1933年夏天，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到庐山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筹划对江西的红军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传教士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在中国只有基督教可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还认为，这次“围剿”在军事上是占绝对优势的，问题是红军撤走后如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传教士认为，只有推广基督教才

是唯一的出路。

1934年秋，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根据地，开始了闻名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是基督教方面与国民党政府多次磋商，由蒋介石拨出10个县给基督教搞实验区，并决定先选择红军闽赣边区所在地黎川县作为“实验区”，组成“江西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牧恩波为“实验区”的总干事。黎川实验区共分教育、妇女、卫生、农业、新运（新生活运动）五个部。教育部的活动首先是接办民众学校，以江西国民党政府编印的《平民千字课》为基本教材，配以各种幻灯演讲，向成年农民进行反共宣传和宗教灌输；在农业方面进行了一些农作物的改良试验，并把原来的地主、富农的土地发还给他们，要求农民忍受地主和富农的剥削，同时给农民提供一些农业贷款和贷给种子、农具等。实验区的一切活动以反共为中心，同时乘机扩大农村教会势力。

传教士在黎川整整搞了二年实验活动，据传教士自己供认：农民对实验区的“工作是怀疑的，畏惧的，不接受的”，国民党对基督教会搞的实验也不满意。因此，从1936年起，江西国民党当局决定把它归入“省府颁布之实施管教养卫计划”中去，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此项计划也随之告吹。

在30年代，基督教会搞乡村建设试点的地方还有河北的定县、潞河、保定，山西的太原、新德，江苏的唯亭、大场，山东的福山，湖南的汉寿，湖北的皂市，四川的成都、重庆、璧山、潼南，浙江的上虞，福建的福州以及上海等地。

基督教势力的发展速度从1922年起开始减慢，到1926年约有40万基督教教徒，比1918年净增约50000人，到1937年共有教徒约65万人，主要是从1932年往后的5年间发展速度比较快。传教士人数在1926年约有4000余名，美籍传教士的比

重超过了50%。1927年3月,由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事件,使2000余人伤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外国传教士吓得纷纷逃跑。可是,不久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行径采取了屈辱妥协的解决办法,传教士们又大批地涌入中国。到1937年,在华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共约6000名,其中美国传教士的比重上升到60%,到30年代后期,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已占绝对优势。

为了配合基督教的反共宣传和扩展教会势力,基督教会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连续出版了《公民常识小简》10种,积极地配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共和宗教宣传。

从1933年起,广学会又出版了大量《农民宗教课本》,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种,以配合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民进行宗教灌输和反共教育。

由上可见,天主教的“中国化”、基督教的“本色运动”,说到底就是针对共产主义的。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他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来向东方宣传基督的,必须以解释基督为任务;后来更加知道,以解释基督去对付共产主义,也是我的任务。”

“基督教已经临到重要的危机,也是一个决定生死关头的危机了。”

“中国的前途,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呢?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在中国有一个竞赛,而其影响之所及,约占全人类的1/4。……我们必须用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

“在世界的选择还没有决定以前,我们还可以有这个仓促的时间,整顿我们的内部,联合我们的势力,实

施我们的计划去对抗共产主义。”^①

二、“实验区”计划的破产

根据天主教会、基督教会拟定的“农村实验区”工作计划，大多数教会大学如燕京、齐鲁、金陵等校，都积极参与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在农村做了不少的工作，但由于计划的改良性和欺骗性，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同共产党争夺农民的目的，几年之后，实验区工作计划只得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付诸东流。

这里试以齐鲁大学等为例，作一简单介绍。

1927年，齐鲁大学神学院已开始济南东部一个叫做龙山的小镇进行农村实验工作；这时，大学决定在那里接管并扩展农村工作。有着460户人家的龙山小镇是方圆5英里内无数村庄的集市中心。考虑到改造中国农村经济必须同时改革农村生活的其它许多方面的必要性，齐鲁大学农村研究所成立了农业与经济系、教育系、保健系及家政系等。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创办了龙山实验区，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研究所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山东华洋义赈会农场合作，在实验区内推广改良品种，如金陵大学的小麦品种，美国的棉花品种等；向农民介绍防治黑穗病的新方法；鼓励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减少农民家庭就业不充分的情况，研究所还援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

（二）举办信贷合作所。许多经济学家坚持认为，贷款利息高是阻碍农民改革耕种技术的主要原因，因而研究所举办了信贷合作所，它是为农民购买良种或耕畜等生产性目的提供较低利息的贷款，而不是为了满足农民举行婚丧仪式等消费要求。信贷

^① 龚斯德：《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序言，第1、13—14、326、373、398页。

合作所的利润则用于学校、公路及其它福利事业，据记载，一个月只收 1.5% 利息的信贷合作所确实迫使当地的利息从一个月 4% 降低到 2%，因而受到人们特别的注意。

(三)关于农民教育。研究所注重农民教育，在实验区内建立了 10 所平民学校。3 个女子识字班，1 个农民补习班，教农民及其子弟识字、珠算、农家记帐法、农业技术等。研究所在龙山镇办有一个书报阅览室，还办了一个巡回书库，到各村巡回服务，每半月轮流一村，以便农民就近借书。研究所还进行农事巡回演讲，利用放电影，吸引邻近村庄农民，然后宣讲选种方法，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每次演讲听众都达 500 人以上。

(四)人体寄生虫的研究。齐鲁大学生物系的温菲尔德和燕京大学的威尔逊合作进行人体寄生虫的研究表明了教会大学力图使科研为中国农村服务的愿望。温菲尔德和威尔逊研究了几种常见的人体寄生虫的生活周期，并发现了农民得寄生虫病的主要原因在于粪便。由于化肥既昂贵又少，停止使用粪便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温菲尔德和威尔逊便探索一种既便宜又有效的堆肥技术来消灭疾病有机体和寄生虫卵，可这项研究工作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止。

(五)关于卫生工作。齐鲁大学医学院在实验区开设了诊疗所、接生站、婴儿诊所，并从事学校保健工作，宣传营养和环境卫生知识。家政系主任还试图为儿童配置一种既富有营养又经济可行的食谱。例如，在缺乏牛奶工业的情况下，便鼓励食用豆浆。

除齐鲁大学农村研究所发起的活动外，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平德胜门北 18 里的清河镇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了清河实验区，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于 1930 年 11 月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创办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

清河实验区于 1930 年成立，设立了调查研究、农村经济、农

村卫生及农村社会教育四股,开办家庭工艺厂、花生酱厂、毛织工厂、补习学校和医院。此外,还开展了儿童福利工作、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学习、公共娱乐及体育活动,并根据当地需要,组织信用合作所、消费合作所和小本贷款等。社会学系教师每年带领学生到实验区实习一个月,教师根据“实验区”调查材料写出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乌江实验区设总干事1人,由马鸣琴担任,下设生产、经济、社会、卫生、教育、总务各组,每组设干事1人。根据业务需要,各组下乡增聘助理及练习生若干人。

实验区组织农民成立了乌江农会,包括250个村庄,500多名会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棉花是乌江实验区的主要经济作物,金陵大学农学院从美国引进爱字棉花在实验区推广,亩产量平均提高79—100%,而且爱字棉纤维长,纱厂每担收购价比本地棉花高7元。实验区购置一台轧花机,供农民使用,与过去手工轧花相比,提高了效率,降低了费用。实验区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无锡纱厂合作,成立棉花运销合作所,实行棉花种植、轧花、收购、打包、运输、销售一条龙,减少了中间费用,使乌江实验区农民的收入大为提高,受到农民欢迎。乌江实验区的社会服务工作还包括开办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书报阅览室、农民医院、罐头厂、铁木工厂、农民咨询代笔处、暑期农民学校,介绍农民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江苏农民银行办理生产贷款。1935年秋季举行了农产品展览比赛等。

有些教会大学没有从事规模较大的计划,而只是鼓励师生开展小规模的社会服务项目,几乎每一所大学的社会活动都包括:成人识字班、幼儿园、社区娱乐活动,宣传卫生、营养、育婴的知识及领导卫生大扫除等。

3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帝国主义和地

主买办阶级压迫加剧,使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崩溃过程加快。农村实验区计划的实施,并不能使整个农村困顿凋蔽的面貌改观,教会大学的学生逐渐对乡村建设运动感到失望,他们中有些人开始认识到要使农民真正摆脱贫困,使农村复兴,单靠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化。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亡国的威胁迫在眼前的时候,全国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亡运动,爱国学生运动更象澎湃的波涛席卷全国。抗日问题成了学生注意的中心,于是农村实验区计划不再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最后只得宣告破产。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一二·九”运动

一、燕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

1935年,日寇继侵占东北、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加紧了对整个华北的政治军事侵略,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企图不损一兵一卒,占领华北。

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中央政府步步退让。蒋介石不仅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屈从日本政府提出的“华北政治特殊化”的要求,还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又委派宋哲元和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16人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寇“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幌子下,高叫“敦友睦邻”,奉行不抵抗主义,并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①

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对内用兵的反动政策下,北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86、154页。

平城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大学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现代座谈会等抗日团体相继被取缔，抗日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惨遭迫害。整个北平城人心惶惶，广大青年学生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他们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火如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一二·九运动区别于以往历次学生运动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大学学生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燕京大学的爱国师生更是站到运动的最前列。

早在1935年5月，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就为进步势力所掌握。他们发起组织了时事座谈会、东北问题研究会等，定期讨论华北形势和青年的任务等时事政治问题，参加者各有二、三十人。他们还出版不署名的壁报，提出反独裁、要民主，反卖国投降、要团结抗日的主张。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还主办了《燕大周刊》，这是一个为团结同学、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的校刊。它不仅倡导改变燕京大学的校风，还唤醒“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认清华北危机的真相。这个周刊从第六卷开始，每期都有几段关于抗日的时事短评，进步分子陈翰伯在第六卷三期上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动机与背景》，应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说明日本侵略者决不会允许中国有一个暂时偏安的局面。《周刊》还登载《傀儡统治下的冀东》、《太阳军旗下——丰台、通州两日游》，向平津人民说明华北危机的严重性。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申报》主编史量才之后，上海舆论界谈危色变敢怒不敢言。《燕大周刊》第六卷第九期却刊出《法西斯问题专号》，从理论和现状方面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法西斯主义。1935年9月以后，华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燕大周刊》预感到这一点，连续不断地评论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学生会在运动中的作用。六卷一期刊载的《学生会的两点特殊性》中说：“1927年

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出卖了民族革命,并开枪向民众扫射,从而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在1930年颁布了《全国各级学生自治会组织纲领》,这一时期学生运动遭受打击,抬不起头来。从1931年到现在,法西斯的压迫使中国学生表面上显得消沉,但是血液经过澄清,正在埋头苦干,蕴蓄着力量,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发动,客观条件决定了学生运动的动向。”这篇文章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到平静的水面上,在学生思想中激起波澜。1935年度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张兆璠在《周报》的六卷三期上,发表了《学生运动——燕大的使命》一文,他说:“蒋介石征服北京后,对于学生运动开始加以干涉,严加摧残,假借反动团体,屠杀领袖分子,不准开会……”,“燕大的硕果仅有的学生会,在民族自救,民族解放中应负起责任。”上述两篇文章发表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夜,进步爱国学生预感到新的革命风暴的来临,他们再也不能沉默了。1935年秋季开学以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几次召开全体大会,800多人聚集一堂,一次比一次热烈地讨论当前华北垂危的形势,愤怒批评蒋介石的丧权卖国行为。在10月22日的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有人提议:以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名义,打电报给南京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呼吁政府,请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这个议案提出之后,引起同学们的热烈反应,全体一致赞成通过,决议授权学生会拟好电文,散发全国,为壮大声势,还征集了平津9所学校署名。这一观点鲜明的宣言打破了黑暗沉闷的局面,为“一二·九”运动放出了第一颗信号弹。12月6日,燕京大学学生会发出第二次宣言,再次批判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指出:“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宣言最后强调:“(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二)请

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四)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①这个宣言邀集了清华大学等校 14 个学生会共同署名印发。这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到来的第二个信号弹。

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再次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到会的有 20 多所学校代表。会上作出具体布署，决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会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会后，代表们都怀着征战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将 9 日的计划，带回各自学校。

燕京大学代表黄华第二天返回学校后，即将学联的决定传达给学生会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摊开北平市地图，研究各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且组织了交通队和纠察队。为了不走漏消息，在 8 日晚 9 点才敲起大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当学联的决定宣布后，很快就得到全体学生的拥护。学生们情绪激昂，整装待发。

12月9日，朔风凛冽，滴水成冰。长期受尽压抑、沉默无声的北平古城怒吼起来了。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象火山一样喷出炽热的岩浆，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燕京大学这所约 800 人的学校，参加游行请愿的就有四、五百人之多。他们在学生自治会的统一指挥下，按预定计划出发，一路上挥舞着旗帜、标语，不停的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由于北平所有的城门被国民党军警封锁，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其它几所处于郊外学校的游行队伍便在西直门前冒着严寒风沙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并同军警展开搏斗，从黎明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12月16

^① 黄华，《在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会革命》，见《中国青年报》，1985年12月7日。

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粉墨登场的日子，北平市学联发动大中学生举行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燕京大学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有些平时穿高跟鞋、戴耳环上课的小姐们去了，满口洋文的‘高等华人’也去了，从香港、海外才回国的华侨也参加了，如陈芳芝等同学，甚至个别美国留学生如休伯特·特里安等也去了。”^①游行队伍在西直门又吃了闭门羹就绕到西便门，在那里撞开了紧闭的城门，终于冲进城去，与全市 6000 多名爱国学生汇合。反动军警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使不少同学被捕和受伤，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许多进步学生成长了，他们在“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即走向农村，发动群众。在运动后期，他们中许多人又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经过“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和成长，这里的进步力量迅速地增加。据统计，从 1935 年 9 月到 1937 年 7 月这一段时间，先后参加燕京大学中共支部的党员有 46 人，按 1935 年燕京大学注册课发表的学生总数（为历年高峰）880 人计算，这 46 名党员竟占全校学生的 5% 强。和别的大学相比，燕京大学共产党员的人数是比较多的。^②

总之，燕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象一位外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燕京大学是一所上层阶级的学府，该校学生一般说来政治上趋于保守，但是在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与日本入侵华北这双重事件临头，激进主义思想开始在燕大出现，到了 1935 年，燕京大学竟出人意料地成为学生抗议运动的发源地，这场运动激起了全国范围的青年革命

① 《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29 页。

② 见《燕大文史资料》第五辑，第 100 页。

运动。”^①

二、全国各地教会大学的响应

北平学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南京、长沙、杭州、西安、重庆、开封、徐州、太原等地学生先后游行集会。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行动起来。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工人群众，号召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于是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成立抗日救国会，出版抗日救亡刊物。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这次抗日救亡运动，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程度不同地被卷进去了。如齐鲁大学学生以积极的行动响应了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在1935年12月的济南学运中，齐鲁大学学生是首举义帜的先驱。到1936年1月7日，齐鲁大学的学生会又召集全校同学的特别会议，决定响应天津学生深入民间的工作，组织扩大宣传队徒步到各地去宣传抗日救亡。他们一部分北上，响应平津学生的行动，一部分南下参与清华大学的自行车宣传队共同工作。北上的从德州到北平，南下的从徐州到了南京。最后是和清华大学的自行车队一齐被押解回来。

上海很早就是日本注意的目标。爱国主义对教会大学学生们来说也有着切身的含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象许多中国教徒一样，从和平主义者转变为抵抗主义者。1935年10月，他带动了一批基督教领袖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号召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上海大学里的进步组织在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已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它仍然紧紧地团结了大量有爱国热情的同

^① 见《斯诺眼中的中国》，第60页。

学,积极酝酿组织行动,响应北平的“一二·九”运动。1935年12月12日,复旦大学全体学生声援北平爱国学生,分别致电北平各大中学学生会“谨表万分同情”,呼吁各界人士,“一致努力,誓为后盾。”接着同济、大夏、大同、交通、暨南、东吴、光华和美专等学校学生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同时,上海几十所中等学校学生,亦发表反对华北自治的联合宣言,并呼吁南京政府对爱国活动弛禁。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上海学联组织的示威活动,圣约翰大学还筹划组织抗日义勇军等活动。当时目睹上海学生运动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评论说:“北平的每一次示威活动都好象远程炮弹落到了这里。……北平学生是领袖,他们的一举一动为其它地方所仿效,虽然落后一些并且每一步都要受到蓝衣社的阻碍,……每次北平学生寄来了杂志或传单,我都尽可能把它们传到学生手里。一位圣约翰学生常常抓起这些东西,一溜烟地出了家门挨户宣传,组织活动,使落后分子感到惭愧。”^①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武昌华中大学学生为了支持北平的爱国运动,罢课游行,把韩德尔的《弥赛亚》演出时间从12月21日推迟到12月28日。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也发动罢课并组织巡回宣传,岭南大学学生虽未立即罢课,但亦表示同情和支持北平的学生运动。此外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以及四川其他大学学生都召开了群众大会,主张罢课以示支持。

所有教会大学学生和全国其他大学学生一起,在“一二·九”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到1936年1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镇压政策,爱国学生运动不能不暂时转入低潮。

^① 海伦·斯诺:《中国学生运动杂记》。

第五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的教会大学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一、在战火中内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我国发起全面进攻。从此,教会高等教育事业经受到自近代以来的空前劫难和磨练。

在抗日战争初期,华北华东等地相继沦陷,教会大学面临着存亡攸关的抉择,纷纷寻找继续存在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一些靠近租界的教会大学则迁入这些“外国保护地”。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是在公共租界而不是在市郊的原址开始教学工作,东吴大学是在它的潮州附中校址上课,之江大学在原址偏安一时,继续开办。可是,几个星期后,日军的进犯又迫使东吴、之江的师生员工离开学校。到11月,两校不得不放弃原有校舍,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并与圣约翰、沪江组成上海基督教协作大学。

1937年10月,日寇强占苏州,逼近南京。当形势岌岌可危之际,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积极作内迁的准备,经与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历经数月,倍受艰辛,

终于在 1938 年春季正式复校。

当日军侵入山东并向济南逼近时,齐鲁大学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方针,学校意见不一。行政当局认为迁校费用太大而拒绝迁校,只同意医学院三个高年级班和 14 名教师迁入华西协合大学,鼓励其余的学生到其它大学借读。除医院以外,齐鲁大学于 11 月中旬关闭。留在济南的教职员和学生,在英美势力的庇护下,神学院、农村研究所和护士学校于 1939 年秋季重新开学。

日军攻占南京后,即开始了攻占武汉的行动。日寇在占领区的残忍行径的严酷现实,使华中大学师生进一步坚定了西迁的决心。1938 年 8 月,华中大学第一次西迁桂林,在当地教会的热心相助下,加之随带了一部分设备和书籍,较快地恢复了教学秩序。可是,好景不长,是年初冬,桂林也遭敌机轰炸。为谋教学及学术研究之正常和安定,华中大学于 1939 年 3 月又迁至昆明附近的喜洲。

日军在武汉、南昌、广州的军事侵略,行见长沙将处于三面包围之中。1937 年 11 月 24 日,长沙首遭敌机轰炸。湖南湘雅医学院面临着抉择。当时日美关系尚未破裂,美国人相信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雅礼会坚决反对迁校。后经反复磋商,决定迁往贵阳,于 1938 年 9 月自长沙撤退,10 月复课。

1938 年春,日军的进一步侵略行动迫使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迁向内地。5 月,厦门沦落敌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决定迁至 120 英里外的闽江上游的南平。福建协和大学向福建内地迁移,到达邵武县,并在该地坚持办学到 1945 年。1938 年秋,日军发动对广州地区的进犯,岭南大学决定迁至香港。校长李应林与香港大学达成协议,下午和晚上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租了一套公寓充当科学实验室并逐渐购置设备,因而岭南大学的许多师生能继续上课。

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燕京大学的校门口还飘着美国国旗，司徒雷登取代孔祥熙的董事长和陆志韦的代理校长职务，学校以美国为后台继续在北平办学，可说是为华北的广大青年提供一片自由求学的净土。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燕京大学就被日军包围，中外教师、职员及学生30多人被拘押，学校被强迫解散，美丽的校园被用作日本军官疗养院。燕京大学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出后，于重庆召开了临时校董会，决议在后方复校。经过各方面筹备，1942年10月1日，燕京大学终于在成都复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据了整个齐鲁大学校园，将其变为军医院。留在华东的教会大学解散了。1942年，东吴法学院的师生在重庆成立了一所法律学校，直到战争结束。沪江大学除了在成都的生物班继续开办外，于1942年2月停止了其它班级的教学活动。后来在重庆与东吴法律夜校合作开设商业课程。1942年，岭南大学也不得不于香港沦陷后再迁至粤北，在曲江复课。1944年冬，日军对贵州省发动进攻，占领独山，威胁贵阳，湘雅医学院被迫再迁重庆。

在日占区的英、美籍教师都被关进了集中营，连司徒雷登也不能幸免。只有北平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在原地开办。到1942年，大批教会大学西迁到后方。在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迁入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所大学集中一地，学生达3000余人，显得十分融洽。一些教会大学相继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开学。当时在后方的教会大学学生总数达4000余人。

国难时期，这些“流亡大学”为了寻找各自的“最好落脚店”，迫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不得不举校内迁。尽管内迁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师生们极少抱怨，而是士气高涨。沿途日军凶狠，盗匪横行，充满危险，加以交通不便，千

里迢迢，跋涉辛劳，在路上有的人断了粮，有的人被抢，有的人体力不支，一到目的地就病倒了，甚至与世长辞。为免遭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万里负笈甚至埋骨异乡，真使人黯然神伤。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大多数教会大学内迁到中国的西南边陲，在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广大师生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因陋就简，积极认真办学。虽然历尽磨难艰辛，教会高等教育事业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教会大学内迁，对于西南边陲科学知识的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乃至思想观念的变革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正如当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指出的那样：“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是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它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现代化。”^①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教育上仍顽固坚持十年内战时期的反动政策。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规定学生要“信仰三民主义，信仰并服从领袖”，“使青年耳听心唯，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②教会大学也和其他私立大学一样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导师”训育制。国民党政府向各校派驻军训教官、训育主任。如1939年5月，教育部给金陵女大的训令督促该校设立训导处，要求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等组，明确规定“生活指导组”职掌“关于学生思想之训导，关于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等等。湘雅医学院《操行成绩考查规程》明文要求以

① 韦卓民：*Three Year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War Time*。

② 《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四川省教育厅印行，1941年，第7页。

“服从党国命令恪遵三民主义”等为原则。

1938年春,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即着手抓“再度整理”大学课程,要求全国大学各院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一律由部规定范围内”酌量增减,而把“党义”、“军训”列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同时又规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中国文学系的必修科目。

1941年,教育部通令将三民主义改为各学院共同必修科。1942年5月,教育部又奉蒋介石手令,把伦理学列为各系一年级的共同必修科,并要“注重阐述先哲嘉言懿行”。国民党还经常派员到校讲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还规定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每5人一册《中国之命运》,教职员每人一册,并要求撰写论文或研讨结果与批评意见呈报中央汇编。^①

总之,蒋介石要求在抗战时期“无论大中学校,绝对不许自由。他们应该把他的自由全部贡献国家,所以,他们对于国家要遵守法律,对于社会要守秩序”。^②这就加强了对教会大学的控制。

教育界一部分进步人士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提出了“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抗战需要”的合理要求。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迫于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其中关于教育的四项条款提出这样的内容:“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的分配,以应抗战之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

^① 教育部1943年5月24日给金女大的训令。

^② 《对四川省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主任训词》,《中等学校训育法令汇编》,四川省教育厅印行,1941年,第230页。

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教会大学在西部立足安家,就不得不想法兼顾教学与国家非常时期的任务和需要。中国缺乏自己的科技人员,政府鼓励学生主修专门学科和职业学科。教会大学改变了课程和专业,以便能更切近“中国化”的目标。

1931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教育设施趋向案》,提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对文法科“严行视察”。为落实强调科学技术课程的政策,教育部明确规定各个专业的招生人数,并为某些专门学科提供经济援助。还规定除非是科学或技术专业的学生,否则要出国留学几乎是不可能的。1934年,政府给私立大学的资助中4/5用于科学技术专业,用于人文学科的不到1/5。到1937年,就全国高校来说,选择人文学科、法学、商科和教育的学生虽仍大大超过半数,但选择工程、医学、农学和科学的学生比例则逐渐提高。具体情况见下表:

1937年中国大学生的专业情况(百分比)

专业名称	教会大学	全国大学(包括教会大学)
人文学科	32.7	19.0
法 学	10.3	26.4
教 育	0.2	9.7
商 学	5.8	7.3
总 计	51.3	62.4
工程学	0.2	14.16
医学和药学	6.5	6.31
农 学	6.8	4.39
自然科学	33.8	12.75
总 计	48.7	37.6

1939年1月,教育部颁布《特设各种专修科办法要点》,规定各种专修科除由部设立技艺专科外,并指定各公私立大学院校附设,定为春季始业,修业年限为二年。抗战时期,社会急需汽车工业方面的技术人才。由于中国西部几乎没有铁路,因此,卡车运输成为军事运输和民事运输的重要手段。在政府的支持下,金陵大学于1938年开设了4个月的技工课程和2个月的驾驶与维修车辆课程。教育部每年拨给900万元,1940年于金陵大学开办汽车工程专修科,至1946年,共招生78人。^①1937年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研究焊接理论和提高操作技术,先后得到拨款20000元,开设电焊技术生训练班和电气技术训练班,共培训121人。战时大后方物资奇缺,交通部电报局需用电池时虞匮乏,军队和地方急需蓄电池,理学院师生设计出一种隔层滤杯式蓄电池。交通部材料司提出与金陵大学合资办电池厂,制造了大量蓄电池。

1938年,金陵大学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专修科,把电影用于教育,为抗战服务。迁蓉期间,曾摄制16毫米科学、地理、农业、工业等教育影片,以资国内外流通,赴各省及边区放映教育影片,推行社会教育并唤起抗战精神。

华西协合大学把医科和牙科学院从1935年的33位教师和194名学生扩展到1943年的94位教师和500多名学生。实验室的工作包括短缺药物的制造,并从事着几项关于传统疗法的分析与临床试验的研究。因为西部缺乏皮革,华西协合大学还专门开设了一门制革课程,并为中国工业社设计了简单的制革机器。

^① 《私立金陵大学要览》,1947年。

之江大学在战争初期着重工程方面的发展,到1941年,成立了一所包括四个系(即建筑系、土木系、机械系和化工系)的工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得去工厂、医院或其它机构进行一个月的实验室工作,这些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制造鞋油、浆糊、肥皂,并为附近医学院制造纯酒精。

一些适合抗战需要的社会科学也分别增设。1940年秋,金陵大学增设哲学心理系,课程悉依教育部规定标准,特设军事心理,即应用心理、战争哲学及人生通论等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交往较前更为密切,英文人才更加需要,有相当的教会大学学生成了军队翻译。教育部还命令华西坝四大学合办英语专修科。

鉴于战时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金陵大学农学院乡村教育学系奉命于1939年改为农业教育学系,同年由教育部委托代办一个园艺师资组。还曾受四川省教育厅委托,担任四川省16个中等农校的辅导。1938年成都成立了有5个教会大学学生参加的战时服务团,组织和发动5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后又组织救护队,医科学生积极参加,救护因敌机轰炸而受伤的市民。

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及政治经济系经济组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自1940年办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政经系担任工业合作会计、工业合作审计及财务报告分析等课,社会学系担任工业合作原理、工合运动等课程。还办了两期工业合作高级人员训练班,共毕业24人。此外,成都市航空委员会经理人员训练班、成都市商业及成都直接税局,均与经济组合作,开课讲授。为搜集抗战事迹,表彰民族正气,金陵大学还特设中日战争史料纂辑委员会,由中国文学系和史学系师生组织史料之搜集与编纂事宜。纂辑自卢沟桥事变起,至战事结束止,各地抗敌始末,抗战人员之事

迹,死难烈士之忠义壮行等等。

燕京大学南迁成都时,为适应抗战时期社会服务及社会救济的需求,社会学系专设为训练社会救济人才及盲人福利事业人才的课程。这些课程有:社会行政、社会机关管理、农村社区、善后救济、个案工作、集团工作、精神健康工作、儿童福利问题、托儿所及特殊教育。

抗战时期,教会大学专业和课程的设置,适应了中国战时的需要,对西南边疆的开发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第二节 战后从呼吁和平、民主 到迎接全国解放

一、卷人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教会大学学生和全国人民一起,由于历经战争的艰辛,倍受祖国被侮辱被欺凌之苦,因而对抗战的胜利特别感到欢欣鼓舞,迫切向往能有一个和平建设和安定的环境,希望祖国独立强大,要求实现和平民主。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如劫收掠夺、贪污腐败、包庇汉奸等,加之物价飞涨,以及在华的美国兵胡作非为等等,学生们耳闻目睹,反应强烈,从失望、不满到寻找拯救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答案。从内地复员的学生,他们在后方对国民党政府剥削人民、大发“国难财”等丑行深恶痛绝;复员途中又目击、身受了许多触目惊心事实:国民党高官和日本战俘坐飞机、头等车厢、高级船舱,老百姓、大学生轧闷罐车、小木船,无数平民惨死于长江沉船,遍野哀鸿呼号于黄泛灾区。种种社会黑暗现象,激起了教会大学学生的愤懑和反感。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领导教会大学学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在教会大学建立了党组织。圣约翰大学有党员 60 余人(学生 2000 余人),建立了党的总支,是当时的堡垒学校之一。沪江大学党员近 30 人,东吴、之江大学各有党员 10 余人。

圣约翰大学首先开展了反汉奸斗争。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曾投靠敌伪,公开发表叛国演说,出任汪伪“市府咨议会”常务委员等伪职。1945 年 8 月 22 日,沈勾结国民党宪兵队,逮捕圣约翰大学“庆胜利、锄汉奸”集会上演说的学生,开除 18 名学生。后在全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沈嗣良终于被迫下台,最后还受到法办。

其他各教会大学也纷纷揭发隐藏在校内的民族败类,与社会各界反汉奸的斗争互相响应,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揭露蒋伪合流,推动群众起来争取人民民主都起了重要作用。

1946 年 5 月初,国民党进一步部署全国性内战,全面内战的危机迫在眉睫。6 月间,全国人民的反内战运动形成高潮。圣约翰、之江、沪江等大学成立了反内战团体,发表反内战宣言,上海市各界群众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圣约翰大学学生高举着“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巨大横幅为前导,与游行队伍一道浩浩荡荡行进。

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横蛮的围困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在惨案中,教会大学的学生同样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勾结美帝国主义,驻华美军取代了日本侵略军,成了中国领土上的新的占领者和太上皇。1946 年 12 月的沈崇事件,撕破了美国所谓“盟国”、“文明”的假面具,深深地刺伤了教会大学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他们愤怒地行动起来。沉默 10 年之久的北平城终于被青年们唤醒,发出

了惊天动地的怒吼。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大城市地下党组织发出了指示，要求各地响应北平学运，发动游行示威，“务使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化中国之途展开”。一场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

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获知沈崇事件的消息后，立即彻夜组织工作，迅速行动，制备了标语口号、宣传漫画、活报话剧、抗暴歌曲乃至游行横幅，一小时之内迅速集合，与辅仁、清华等校学生于12月30日举行了示威游行。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了《为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同学告全市同胞书》，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严惩凶犯，赔偿损失；（二）美军当局保证在美军撤退前不再有类似事件；（三）立即撤退美军。”^①在南京，金陵大学等六个专科以上学校组织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立即撤退美军委员会”，游行到国民政府门前，高呼“美国兵，滚出去”！并游行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司徒雷登的代表提交了抗议书。在上海，之江大学等17所学校学生代表于12月31日举行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确定自1947年1月6日至12日为“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撤退美军周”，继续开展宣传活动。

抗议美军暴行的怒火在全国蔓延，国民党当局措手不及，他们既怕得罪美国，又慑于众怒难犯，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于是竭力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破坏群众的抗议运动。国民党不少头面人物接二连三发表谈话，说什么“强奸只是法律问题，不应涉及政治问题”，污蔑抗暴斗争是“小题大作”，甚至无耻地说如此势必“影响中美邦交”等等。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还召集党政军各机关和大学校负责人联席会议，商讨对付学生抗暴行动的

^①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北京市档案馆编，光明日报出版社版，第58页。

对策，封锁学生抗暴行动的消息。国民党卖国媚外的嘴脸，与广大人民的爱国义愤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这不能不进一步激发了教会大学师生的爱国主义觉悟和对国民党的唾弃。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各种危机进一步加剧，广大学生同其他人民一样，挣扎在饥饿线上。国立大专院校的公费，每人每天的菜金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或一块豆腐，有的只能以盐水煮菜皮汤就餐，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5月17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5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成立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20日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日举行请愿。上海也成立了国立大学学生联合会，决定派代表与杭州学生代表组成联合代表团，参加5月20日的宁、沪、苏、杭学生联合请愿。5月20日，上述四城市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齐集南京，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为主，共6000人，举行了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21日，上海学生讨论成立了“上海市学生抗议‘五·二〇’惨案后援会”，沪江、圣约翰、东吴等校学生，冲破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建立了“后援会”，进行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5月31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选举圣约翰、东吴等7校为主席团。

在北平，5月20日晚，华北14所大学的代表通宵讨论，组成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燕京、北大、清华三校代表被推为驻会执委。燕京大学32教授发表宣言，认为“青年学生之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要求教育的运动，是由于不满政治现状和在困难环境中感觉苦恼的必然现象。……青年学生……纯洁的心地不应乱予曲解，横加诬蔑。……我们建议目前各地学校教

授正视现实,积极联合起来,……进行持久的努力”。^①6月1日,北平各学校代表举行“民主广场”(北大操场)命名式,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除常驻代表外,还加派了代表出席,并献诗一首:“抬头见民主,低头见地土,地上鲜血流,化作红旗舞。”6月2日,在为内战死难军民举行的追悼会上,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献上挽联:“死者是生者的榜样,永远怀斯先烈;今天为明天而战斗,坚决救我中华。”当天下午,“华北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代表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以扩展侵略势力为其目的;在援助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发动内战的同时,还扶植日本作为它控制远东的工具。在经济上推行“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恶毒计划。美帝国主义这种扶植日本威胁中国的政策,理所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发布“五一”口号中提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全国学生中掀起。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被确定为这次运动的重点学校之一。该校中共党总支认识到在这所美国教会大学开展直接反对美帝的运动更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决心把学生的政治热情很好地调动和组织起来。5月,学生自治会就美国扶植日本的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绝大多数学生表示要尽自己的全力扩大宣传,抗议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上海学生的革命行动,给北平学生很大的激励。5月30日,燕京、北大、清华等校学生自治会举行“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大会”,并成立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致电全国同胞、美国国务院、麦克阿瑟,抗议美国扶植日

^①《燕京大学教授对学潮主张宣言》,《燕大双周刊》第39期。

本的错误政策。6月4日,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身份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诬蔑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倘仍继续进行,可能招致不幸之结果”,并以“身在教会大学而进行反美扶日”的学生,“必须承受行动之结果”进行威胁。6月5日,平津各报均载有司徒雷登经过美国国务院批准的声明。司徒雷登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一般中间同学虽对他存有幻想,但也使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样的字眼含蓄地予以批评。进步学生都认为,司徒雷登的声明不特为美国扶日作了无理的辩护,同时也污蔑了所有爱好独立、自由、民主、有正义感的中国学生和人民。学生自治会于7日晚开会,通过决议:收集美国扶日资料寄给司徒雷登,请予解释;根据司徒雷登声明发表抗议书;原则决定罢课抗议;与北平各院校联络后采取一致行动。

二、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中央指示学生运动应当坚守阵地、保存力量、发展党组织以及护厂护校。各教会大学广泛开展了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圣约翰大学和震旦大学的医学院,组织了救护队,进行急救训练;沪江大学利用一个中共党员家中的有利条件为掩护,建立地下印刷所;东吴法学院中共党员卖掉家里给的金戒子购买印刷用纸。圣约翰大学的读书联谊会增设了讲解战争形势这一专题,参加者十分踊跃。他们还抄摘新华社播发的消息,张贴在校园里,供师生阅看。如报道北平西郊解放后,燕京、清华二校在几天内迅速复课;北平辅仁大学师生,在北平解放前提出“外国人走了,我们自己管”的口号,解放后,师生团结一心,安定教学。这些消息在圣约翰大学师生中

也引起很好的反响。

1949年4月,上海成立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圣约翰大学是长宁区总队的一个大队,总队指挥部设在校内。圣约翰大学人民保安队按院系分组,各组都有自己的集合地点,编好通讯联络网,人员可以在一、二小时内通知集合。当圣约翰大学的护校活动广泛展开时,美国教会中反动势力的几个代表出来阻挠,他们声称:“学校之安全与否,不必学生担心”,“美国教会决不轻易放弃约大”,“假若学校遇到剧烈骚动,教会将收回约大经济赖以维持的30000美元津贴”。这种威胁引起了广大学生以至教职员工的强烈不满。《约翰生活》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约大是中华儿女的约大,将由全体师生员工来保护。”随之,师生们组成的护校队,日夜轮流守卫。

上海各教会大学还开展了地区调查,绘制地形图。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分别绘制了从西站到曹家渡地区的地形图;东吴法学院绘制了虹口地区的桥梁分布图;震旦大学等校调查了南市地区的地痞流氓情况。

在湘雅医学院,中共湖南省工委指示湘雅地下党组织护院保产,把湘雅完整地交给人民,并成立了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部分老中青教师参加的全院性护院纠察队。7月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急电医学院南迁广州。凌敏猷院长洞悉国民党军政撤退,交通运输工具紧张,乃托辞搬迁需大量卡车,迫使省政府同意缓迁。8月,湘雅师生以欢快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入城,随后组织医疗队为伤病员治疗,并为解放军开办了化验员训练班。9月,驰名中外的湘雅医学院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教会大学学生争取和平、民主,迎接全国解放的斗争中,中共党组织作了许多具体而细致的工作,党员起了先锋骨干作用。

1934年，湘雅医学院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兰维廉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当学生自治会被取缔后，地下党的同志反复研究，决定由各班推选代表，组织班代表联席会。1948年暑假成立了班联会，为公开的群众组织，选举兰维廉为主席。又成立了生活团契，由党员魏书钧担任团契主席，组织开展各种符合学生要求的进步活动。另外还组织了小型读书会、民歌社、铁牛剧团。1949年长沙解放前夕，在中共长沙市工委的组织安排下，湘雅停课，上街搞宣传，党员汪学仁从地下印刷厂取回铅印的传单、宣传品，向市民广泛宣传。

在圣约翰大学，早在1938年下半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至1943年，该校的地下党员已有二、三十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战斗在这所教会大学的共产党员总数共约250人。圣约翰大学总支根据学校的特点，开展各类团契活动。在1946年上海“六·二三”事件以前，以各院系党员为骨干的团契就达30多个。党员对周围同学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政治态度、思想观点、兴趣爱好、特长等，都比较了解。每次重大事件，党员或以社团、团契为阵地，或与积极分子一起，访问同学，听取反映，开展宣传引导。有些信奉基督教的学生称赞有的党员“比牧师和校友更好”。圣约翰大学总支团结了一支约300人的积极分子队伍。1946年春，圣约翰大学成立全校性的积极分子组织——烛光团契，参加者200余人，成为中共党总支培养和教育积极分子，发挥积极作用的一种有效形式。

为了指导教会大学的学生运动，中共上海党组织于1946年5、6月间建立了教会大学区委，成员有张耀祥、李兆雄（马明）、王宝元（王子成）。1948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进步分子，党指示各地有被捕危险的党员撤退、转移。中共上海局教会大学区局作了调整：由吴康任书记，委员有张耀祥、季梅

先、吴坤、毕玲，积极领导了教会大学学生迎接解放的斗争。由于党组织的精心领导，上海地区教会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人数不断增加。抗战胜利时，圣约翰大学党员 60 人，沪江大学 29 人，东吴大学 15 人；天主教控制的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大，校规较严，三青团和“圣母军”势力较强，此时还没有中共党的力量。到 1946 年“六·二三”前后，圣约翰大学中共党员已增至 100 余人，沪江大学 44 人，东吴大学 28 人，震旦大学 4 人，震旦女大 7 人。1948 年秋季，教会大学撤退一些已暴露的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开辟工作，1949 年 4 月，各教会大学中共党员又得到了发展。圣约翰大学从 50 多人增至 100 多人，沪江大学（含商二院）从 21 人增加到 40 人，震旦大学（含震旦女大）从 3 人增加到 19 人。

富有爱国心、正义感、充满理想的教会大学学生，他们不能容忍美国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政策和蒋介石的卖国专制独裁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起来反抗和斗争，亲身经历了埋葬旧制度的生死斗争，和各界人民一起，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和接管，使学校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第三节 大陆教会大学的消亡

一、最后的阴谋策划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我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收回国家的一切主权，其中包括西方帝国主义在华的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管理权和文化教育权。

在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不断向各教会大学发出指示，要求尽可能维持基督教大学创办的宗旨。1949 年 12 月

17日,托事部给各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信中说:“只要还可能维持这些大学的基督教特性与影响,”托事部就会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法来支援”这些大学。为什么还要支持共产党政权下的教会大学呢?托事部指示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造就为‘教会’‘国家’服务的有特殊能力、深孕着基督教原则人格的、有作领袖才能的青年男女。”甚至进一步要求“能适应着变更的环境,修改行政、教学和别的方面的大学生活,使之比以前更基督化”。

1950年,托事部在《人民中国统治下的一年》的总结中,更加露骨地对抗中国人民接管教会大学。他们说:“学校中各种团体代表们所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很显然是一个混合的祸毒。”对于一年来的课程改革,他们深感不安,企图压制开设共产主义课程,宣称“教会学校中如果要讲授共产主义的课程,或其他未经托事部批准的课程,则各校自己要设法筹备这些经费”。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托事部授予中国教会大学两条锦囊妙计。一是不要改为国立,“而由在中国的基督徒团体直接管理”,只有保持私立地位,才有可能指望待英、美同中国政府建交后,重新取得教会大学的合法地位;二是尽量保持财经上的独立,这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有了财经上的独立,方有宗教和学术上的自由。“因为我们怕目前学校的经费若接受政府补贴的话,就有渐渐变为国立的危险。”^① 1951年1月16日至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会议。会议期间,联合托事部还电邀各教会大学派代表去香港商谈汇寄津贴事宜,企图引诱、阻挠我国收回教育权。经过研究和讨论,各校与会代表发表联合宣言,彻底地揭露了托事部策划的阴谋。

^① 1950年6月2日托事部给中国基督教大学校长的信。

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恶化,联合托事部最后的挣扎已回天无力了,中国人民终于顺利地接管了教会大学。

二、教会大学的消亡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接管工作,从总的方面看,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为一般性的接管。

随着外籍教员的纷纷离去,中国人接替西方人担任行政领导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新成立的董事会全部是中国人,西方人可以参加,但没有表决权。各校都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教员、行政领导人、学生、工人等代表组成。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务委员会成员 2/3 是教员代表,1/3 是学生、职工代表。金陵大学 19 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除校长外,教授 9 名,讲师助教 3 名,职员、学生各占 3 名。各校取消了训导处,改设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还来不及接管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共中央确定了“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1950年5月29日至6月14日,中央教育部召开的高教会议,邀请了6所教会大学的代表参加,会上专门讨论了管理私立教会大学的章程,总的方针是实行校长负责制,强调政府的政策不是排除私立学校,而是帮助其发展。

根据中央的精神,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原校,逐步改革”的方针,确定了鼓励开学的政策。鉴于教会大学办学条件较其它私立学校要好,政府期望他们恪守政府法令,并容许他们暂时接受美国津贴,只要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人民政府教育法令,便准允立案登记。但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

要的。

在这一阶段，教会大学的课程作了重要的改动。学校的宗教目的被取消，适合国民党法西斯专政需要的三民主义等课被废除。增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及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时事等课。1950年7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领导的决定》的文件，明确规定高等教育唯一合法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材，要求毕业生具有科学与技术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就根本指明了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

党对教会大学的方针政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教会大学负责人拥护，他们都能遵从政府的法令，称新政府的人员是十分诚实而讲道理的，其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迅速转变成在一切重要方面均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全国性制度，教会大学在中国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体化。

第二阶段是对教会大学的全面接管。

1950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因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参战，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大陆在美的全部财产，中国政府于两周后作出相应的决定。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接济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规定：（1）原全部或大部分由美国津贴的学校，如无法改由中国私人出资办理，原则上改为公立。（2）原经费一部分来自美国津贴，另一部分来自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应改组其董事会和学校行政，行政权应属中国校长。但此类学校中表现十分反动者，政府应予以接办。（3）原学校经费之一部分来自美国津贴，大部分靠学费收入及中国私人筹募者，排除去一切外国籍董事，改为完全的中国人民自办的私立学校。

1951年对20所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的处理结果是：（1）接收后改为公立的11所：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原接受天主教会津

贴)、协和医学院(接收后改称中国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接收后部分系科改为山西农学院,部分系科与山西大学工学院及西北工学院合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收后三校合并称金陵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接收后二校合并为福州大学)、华中大学(接收后调整为华中师范学院)、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接收后改称华西大学)。(2)接收后,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的9所: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

为了顺利地完成接管工作,党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多数。当时教会大学普遍地存在着“教员怕减薪调职,学生怕降级”的现象。为了消除这些顾虑,中共党的各级领导人多次强调:“绝大多数的教职员是可以团结、可以进步的。”^①对教会大学工作人员的处理,注重了“尽量给予生活和出路”,坚持做到了“教职员中除了少数特务分子被清洗外”,“大都录用”的原则。^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教会大学师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反美爱国热潮,大批学生志愿参军。如1950年11月,燕京大学就有100位同学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有的同学还下乡去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前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鼓励学生转入军事学校。金陵大学成立有校委会、工会、学生会等团体代表30人组成的“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表宣言,郑重宣告:“美帝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要坚决摆脱美帝的影响,反抗美帝的侵略!”“我们多少年来深受美帝文化侵略的毒害,在思想意识上不自觉地作了美帝的俘

^{①②} 《长江日报》1949年11月22日,1949年10月13日。

虏”，现在应是觉醒起来的时候了。

1950年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代表奥斯汀发表演讲，强调所谓美国给中国的“支持”与“帮助”，遭到教会大学师生强烈的谴责。12月25日，武汉一批留美学生和各个教会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奥斯汀的演说，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表示支持这个声明；湘雅医学院举行了一次反美与控诉大会；岭南大学师生要求用中文的大学规章来替代英文的，并要求另选校歌来替代表现“奴隶思想”的校歌；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奥斯汀的伪善和美国的文化侵略。其它教会大学也相继举行抗议集会。

教会大学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及控诉运动，促使广大师生日益觉醒，他们认识到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或学校的利益；从而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教会大学的传统决裂。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中国大陆教会大学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第六章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节 正确认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大凡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艰难和苦痛，而恶的动机往往会产生预想不到的结果。如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势力对美洲的入侵，虽伴随着无数印第安人头颅的滚落，却是美洲纳入世界文明的先奏；英国侵略者对印度的统治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

同样，一手拿着《马太福音》，一手拿着粉笔和教科书的传教士，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乃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异物，是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性质的殖民活动，这是任何人所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兴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顺应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某些“媒介”的作用，这是同当时传教士的办学初衷相背离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8页。

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为什么能够发挥某些不自觉的“媒介”作用呢？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我们似乎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区别上得到一些启示和较为合理的解答。

（一）西方殖民主义政治与基督教传教的区别。

传教士充当了“文明的先锋”和“探险队”，而教会大学在传教中又起着“尖兵的作用”，成为“特别的用来帮助传教的工具”，这就使得基督教与列强的殖民政治一度有过紧密的联系，基督教入华与诸列强的扩张政策有着共生、依附的关系。两者各不相同，但又互相利用。殖民主义者利用教会办教育“和平地征服世界”；而教会则以其军事、政治力量为后盾，并从那里获得大量经济上的资助，来从事包括办教育的各种传教活动。这个共同的如何控制中国的政治目的是彼此默契的，也为众所周知。然而在近代宗教改革后出现的政教分离运动以及 19、20 世纪现代基督教的“世俗化”倾向，都促使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某些“淡化”。另一方面，传教事业又受到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这股强大的革命洪流的冲击，曾迫使不少的传教士代表人物希望以“超政治”的面目出现。由于这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应该说是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

何况，基督教新教是宗教改革后的产物，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它的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封建、半封建制度及其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给予了强有力的冲击。基督教教义本身如主张平等（“人人都是上帝的女儿”，“彼此是兄弟姐妹”）和牺牲精神（效法耶稣为世人殉难的十字架精神）等，这些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曲折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还有西方的先进管理制度和发达的工业及科学文化在基督教渗入的同时一并涌向中国，震撼了中国大地，引起一部分爱国青年强烈的反思，从而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富国强兵的政治思潮，成为推动

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因素。可见，教会和教会大学已不自觉地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种传播“媒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旧中国的基督教界固然不乏虔诚的基督信徒，甚至做了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帝国主义政治统治、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马前卒。相反地，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员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基督教中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区别。

西方传教士乘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狂潮来到中国，在侵略者的舰艇和大炮声中，以“超政治的”、“纯洁的”面目出现，他们抱着为耶稣征服崇拜“异教”的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宏愿，把教育作为“上帝特别赋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企图以办教会大学来提高教会的形象，并改善传教的质量和功效。他们还懂得，为减少传教方面的阻力，不能单纯依靠基督教本身来瓦解和取代中国文明，只有在基督教背后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可有成效地渗入中国社会精神新旧嬗递中的空隙。这种愿望也只有通过办教会大学的途径和方法来加以实现。然而这一战略性的调整，在客观上又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进行文化改组的现实。

教会是维护非理性认识的堡垒，大学则是理性主义的阵地，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场所，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教会大学并没有如当初传教士所企望的那样，办成传教士自我封闭的神学基地，而是为基督教本身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开辟了道路。教会大学的专业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必然超出单纯的基督教传教事业的范畴，而汇入更大范围的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从而成为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

(三)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区别。

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教会大学的本意,是“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但教会大学还不同于专职的神学院,“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教会大学中来。特别是经过20年代中期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教会大学先后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这标志着教会大学从传教向以世俗教育为主的方向转变,不少教会大学的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如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1936年甚至公开提倡“信仰自由”的原则,他说:“本校无宗教之分,唯本信仰之自由。”他还曾为人书联道:“孔佛耶回,有教无类。亚欧非美,天下一家。”^①

实际上,宗教教育在教会大学中所占比重也并不大。如岭南大学在本世纪30年代设有医学院、工学院、商学院、神学院、农学院和文理学院共约30个系,所开科目逾400种,但神学院所开科目不过社会训义、基督人格、有神论科学关系等10余门,其余都是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皆适合时代,足应要求”的世俗教育。而世俗教育的大力开展促进了西学的大量引进。

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技术、科技文化获得迅猛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西方文明先于东方。在政治经济上,资本主义为争夺商品市场,在刀光剑影中不断进行扩张。这反映在文化领域里则逐渐呈现出一股西学东渐飓风。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大学这个“中间载体”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闻所未闻”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基督教文化。这毕竟是一种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正当它在历史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时,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封建小农经济基础和重农抑商政策的桎梏,以及清王朝闭关锁国、文化统治和八股取士的禁锢而衍生了巨大惰性,其突

^① 《岭南校友》第13期,第18—19页。

出表现在封闭性、自大性和保守性。于是乎,由中西文化所组成的“文化场”自然会出现一种类似于热力学中所说的热流只能从“高温”向“低温”传导的现象。正象西方机器工业对中国封建农本经济的冲击一样,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也在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了工业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而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既经接触,必然会留下痕迹,文化既经交流,必然要相互发生作用。正如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起了瓦解作用一样,传教士在华办学校传播西方文化,犹如一剂为新文化催生的酵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并使之逐步演变为一个半封建社会而最终走向近、现代化起着促进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教会大学为媒介而传入中国的“西学”给中国封建社会的僵尸肌体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它刺激了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的发展,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客观存在对中国走向近现代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送来了反封建专制的精神武器,加速了中国思想界的觉醒和科学启蒙。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运动过程,而中国的教会大学既是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媒介和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在教会大学中长期任教的西方教职员工,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并且教会大学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了解东方社会,适应中国国情。于是就在“鬼谷先生”的声、光、化、电将中国士大夫的礼、义、廉、耻打得粉碎之际,“孔门弟子”的文章典籍也开始悄悄出现在大洋彼岸,给西方带去了东方文化的灿烂。但“东学西渐”比起“西学东渐”在同一时期来说,所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微弱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副产品

而已。

第二节 西学东渐的一个载体

一、西方科学技术东渐及其对中国科技近代化的某些促进作用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科学已从经验描绘上升为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并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的思想一旦指导、渗透人类社会生活,就会起到改变人们观念以至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同时,也开始了西学东渐的新时期。西方近代文化挟雷霆之势,涌进古老的“天朝帝国”,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长期封闭之门一经打开,早已弥漫于世界的“欧风美雨”就必然要袭来、渗入而不可遏止。西方近代科技也恰似强劲的西风源源不断、无孔不入地渗入中国,对中国僵化、保守的科技思想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冲击波。而教会大学在中国的诞生,既适应了这一顺乎历史潮流的西力冲击,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这一方兴未艾的事业。如果说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尚不能形成“大气候”,只是一个孱弱的起端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力冲击波则掀起了西学东渐史上的第一次浪潮;而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形成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那么以教会大学为中介而导引的西学东渐,则是这股滔滔巨浪中独具风格的一朵浪花。“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大海”。本节仅采集教会大学在农林学、医卫学等方面的几滴水花以窥一斑。

(一)农林学的日新月异。

中国有 3/4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依靠农业生活。教会大学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地调整教学方针、方法及所开设的课程,而对农林学科的重视则是为适应中国国情必然采取的措施。其中金陵、岭南、齐鲁等几所大学在这方面应当说是做出贡献的。

金陵大学十分重视农业问题的科研和教育。它下设农学院,农学院下又分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和农业研究所三部分。大学本部开设农艺学、森林学、植物学、蚕桑学、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植物病虫害学、农业教育学等 8 个系和致力于推广宣传的推广部。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创办“发轫于拯救灾荒之宏愿,所有事实根据于防灾之计划,直接所以谋民生之安全康乐,间接即以图国计之巩固充裕也”。^① 根据 1940 年出版的《工农学院研究设计一览》所载,农学院创办宗旨在于“授于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业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金大农学院在这方面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农林科开始创办之时,“经费艰难,设备简陋,教授学生,寥寥无几”,后经“教职员工极力同生,教实两界之热诚赞助,社会官方之认真督促,事业日隆,贡献日多”。

金陵大学农林科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过探先列举十端如下:

1. 本科防灾之研究,在中国为唯一之事业;
2. 开设的森林专科“在中国之中部,实为高等林业机关”;
3. 森林与水奔冲刷关系之研究,不仅在中国为创举,亦足

^① 过探先:《金陵大学农林科之发展及其贡献》,《金陵光》,民国 16 年 11 月,第 16 卷,第 1 期。

以引起世界之注意；

4. 农林科首先创办农业推广部，其方法多为各机关所采用；

5. 其推广事业，日益进展，直接受惠之农民每年至少在 10 万以上；

6. 农林科首先以科学的方法开展农业调查及乡村社会之研究，发表的报告切实精翔，足以矫正空言叙述之习惯；

7. 开展的作物改良方法的研究，足以促进国内各农事试验场之革新；

8. 农林科植物病害及牛疫防治方法，均合于实用，裨益于农家经济甚钜；

9. 它自产优良桑苗 10 万株，精选无毒蚕种 30000 张，为中国蚕业机关中之事业最大、成绩最优、用费最省者；

10. 农业专修科及乡村师范学校素以教、学、做三者并重，足为中国农业及乡村教育特开生面；而郭仁风教授所著之乡村学校农业教科书，注重设计实习，中外人士认为是最切实用之教材。^①

金陵大学在我国水土保持研究方面也有它一定的业绩。

从 1922 年到 1927 年，森林系美籍研究教授罗德民博士和助教任承统等为了研究黄河泥沙及防治方法，奔波、苦干了 6 个春秋，对鲁、豫、晋、陕、甘等地的植被和水土流失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先后在青岛、永宁等地开创了土壤侵蚀试验。从 1924 年到 1926 年，他们分别在山西沁源方山、宁武东寨和青岛林场等处设置径流泥沙试验小区，观测在不同暴雨、不同植被情

^① 参见《金陵大学农林科之发展及其贡献》，《金陵光》，民国 16 年 11 月，第 16 卷，第 1 期。

况下,坡地水土流失量的变化,这是在我国用径流小区观测研究水土流失方法的开始,为以后水土保持观测试验奠定了基础。

1933年前后,董瑞采、陈恩凤等又开设了森林改良土壤和保土学等课程,介绍有关土壤侵蚀的基本原理及防治方法,对加深人们对水土流失危害的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1933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下设有林业垦殖组,开展水土保持工作;1935年林垦组改为林垦设计委员会,主要工作人员大多是金陵大学校友。抗战期间西迁后,该校在天水成立陇南水土保持实验区。与此同时,土壤学家彭家元等于1940—1941年在内江进行“土壤冲刷量与作物生产关系”试验,董瑞采于1941—1945年在成都南郊金陵大学农学院农场进行“雨量、坡度及作物与紫株土侵蚀的影响”试验。此外,在推广良种、改良土壤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金陵大学在农业方面对中国所作的贡献,堪称教会大学之首。如胡适评价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贡献时谈到“金大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的初期领导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者,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教材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当前的困难问题来做研究,因此使金陵大学农学院“在20多年之间,发展到全中国农业科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全中国作物品种最重要的中心,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展史的一叶,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叶,是很值得记载的”。^①

金陵大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农林学的教育研究上为其他教会大学开辟了一条创造性的道路,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华西

^① 摘自胡适于民国45年8月29日为《沈崇翰自述》一书第二部《中年自述》所作的序(台湾出版)。

协合大学也争而仿效，尽管规模稍微小一点。

岭南大学在 1918 年已开设农科课程，致力改进中国生丝的质量；它自 1915 年就建立了一个植物标本系，到 1924 年已汇集中国及东南亚 12000 余个植物品种；它还提出了一项关于蚕丝改良的研究计划，获得广东省政府、广东基督教教育会和一些中国商人的支持；岭南大学还根据中国农业发展，特别是广东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本世纪 20 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 30 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 5 个系，当时的校长称：“中国是农业国……纵使农学院每年只造成专长五名，十年得五十名，但以五十人同心合力，亦可使一省之农业改观。”^① 岭南大学经年来研究成功的多穗水稻，早造有 400 种，晚造 1100 种，以“改良东莞白米”为最；在园艺方面，学院也成功地进行繁殖荔枝、番瓜和柑桔等水果的试验，而且进一步改良了从夏威夷和东南亚进口的许多新品种果树，“对广东省新兴农业计划助力极大”。^②

岭南大学农学院长期以来还注重南方农作物病害的研究。据植物病理室估算，广东每年谷类、水果、蔬菜受病而造成的损失超过数千万元（1936 年币值计），因此农学院植物病理室经过 9 年多的研究，采集病害标本 3000 余种，鉴定了广东甘蔗病理 19 种，果树病害 32 种，以及谷类、蔬菜，花卉等 300 余种病害。并且搜集整理各国防治这些病害的方法，结合广东的具体情况加以修改，编成小册子广为散发，指导农民防治农作物病害，取得相当成效。^③

齐鲁大学在 1925 年起的近 10 年中，“许多因素使它遭受挫

①③ 《岭南大学校报》，第 8 卷，第 18 期。

②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247—248 页。

折”，“非常不得志”。^① 齐鲁大学不得不为自己谋求一个新角色，决定从培养从事教会工作的毕业生而转向集中力量培养“能够满足农村和城镇人民需要的男女青年”。^② 1927年，齐鲁大学神学院已开始在济南东部一个叫做龙山的小镇进行农村工作，且在引进改良品种、发展家禽生产、开辟荒地果园、开发毛织工业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1930年春，齐鲁大学广智院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事业展览会，展出的内容包括小麦、大豆、玉米的良种以及如何科学选种的图表文字，灭虫用的农药及器械，凿井和灌溉技术模型（灌溉模型直观地展示了如何用虹吸的方法将黄河水提升到堤外灌溉两岸的农田），有关科学养蚕、养蜂、养鸡的图片材料（其中有一只济南合众养蜂场特别的玻璃蜂箱，使观众能清楚地看到蜜蜂在蜂箱内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和在一些乡村办农民合作社改良旧习俗等方面的内容，^③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医卫学：中西医由冲突而趋向融合。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大批来华和教会医院的设立，西方医学迅速传播。西医不仅弥补了中医学日益暴露出的不足，也开始改变中国人的就医观念和卫生习惯，一些新式医学院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拔地而起。据统计，到协和医学院建立时，这种学校已达24所，外国人和中国人各开办11所，中外合作开办2所。11所外国医学院中有8所是教会医学院：齐鲁医学院、华西医学院、福州协和医学院、盛京医学院、华北女子协和医院、圣约翰医学院、哈克特女子医学院，还有一所系英国人在杭州开办的。中外合办的两所是美国耶鲁布道会与湖南官绅

^{①②} 《中国教会大学史》，第275页。

^③ 王梓伸：《济南广智院忆旧》，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合办的湘雅医学院和由中国方面创办、美国医学家负责教学和管理在广州众医医学院。^①

而在近代中国,能从最高水平上追踪世界医学的发展,给中国医学界介绍来先进的西医西药知识,并为中国社会培养出第一批高质量医学科学家的自然科学机构应首推被誉为“中国的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教学、科研、临床三位一体的医学院,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座医学科学研究的象牙之塔,科研占有重要的地位,培养学生也是从科研入手的。正是在这里,中外籍医学家团结一致,以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堡垒。如步达生教授和中国学者裴文中、杨钟健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古生物学研究和北京猿人的发现;施来特和陈克恢等研制麻黄素的成果及药理系进行的对中药的研究;福斯特、李宗恩、钟惠澜等对中国常见的寄生虫病和黑热病的研究;津瑟、谢少文等对斑疹伤寒的研究等等。^②所有这些研究,对中国医学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教会学校的讲坛,已如前所述。而教会高等学校创建以后,不仅讲授自然科学,也先后讲授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中国人从传教士那里,了解了很多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在教会大学里哺育成长的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莘莘学子,更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

① 贾得道:《中国医学史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3、294页。《献词集》,第75页。

② 协和医大:《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的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历史的辩证法又一次得到证实。教会大学在客观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科学与进步,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步伐。

(一)新闻学、心理学、商业经济学、社会学等新兴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的移置。

1. 新闻学

中国在本世纪 20 年代以前没有自己的新闻专业,直到 1924 年燕京大学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毕业生聂士芬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新闻学系,当时叫报学系。30 年代初,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正式成立“密苏里—燕京合作基金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马丁和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等曾在该系授课,在新闻系播下了民主、进步思想的种子。新闻系的主修课由专职教师主讲,一年级修《新闻学概论》,二年级学《新闻采访与写作》,三年级修新闻编辑和报业史,四年级学新闻社论;另外还开设选修课,如文学、政治、历史、法律等。燕京大学后来迁至成都,新闻系由蒋荫恩主持系政,他还主讲“新闻学概论”等课程,他给学生们讲系统的新闻自由、新闻真实报导要以事实说话的理论,强调记者采访要有艺术性,要力争到第一手资料,得到最新颖的内容,写作要生动、活泼,有趣,要能吸引读者,引人入胜。该系十分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学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还成立了“燕京通讯社”,发行中、英文版《燕京新闻》作为该系学生的实践场地。《燕京新闻》以其新闻报道真实赢得了众多读者。燕京大学新闻系和它的旗帜《燕京新闻》为中国后来新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 心理学

金陵大学文学院于 1940 年秋,将原有哲学心理学、教育学

等合并,成立一个哲学心理学系。当时为适应抗战需要,除开必修课以外,还开设有军事心理学即应用心理、战争哲学及人生通论等课程。该系教授除讲课外,多从事著述,取得了硕果累累的研究成绩。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也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在成都合办儿童行为指导所,专门收治一些有异常表现的儿童,如孤癖、喜怒无常、多动、口吃、迟钝等心理或生理疾症,治愈或有显著进步的达88%。^①总之,教会大学从理论到实践为中国未来心理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 商业经济学

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推进,西方的商业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被“嫁接”到教会大学中来。这些学科的东来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经济管理人员,同时它的开设也为增强中国学生的商品和经济意识以及工商业等的管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华中大学文学院就设有经济商业系。该系开设的课程注重理论与实用相结合。实用学科包括统计、会计、商业教学、货币、银行、国际贸易等。实用课程的开设使学生在4年的学习中能具备各种应用学问,得以谋求职业。理论学科主要有经济原理、金融原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财政学、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毕业后能独立担任研究工作或进一步深造。

上海沪江大学为适应上海及全国商业发展的需要,在30年代初就在城中区添设夜商学院,以满足城区职业青年就近进修的需要。商学院下设有管理学、会计学、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等系,另外又开设了银行、会计、国际汇兑、商业管理、外语等专

^① 肖鼎瑛:《迁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见《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292—294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修科。

4. 社会学

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是在燕京大学成立的。192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两名毕业生步济时和甘博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发表了《北京,一次社会调查》一书,该书引起了司徒雷登的兴趣,遂聘请二人到燕京大学任教,并成立了社会学系。该系一成立就得到普林斯顿大学驻北京机构——“普林斯顿在北京”的大力支持,双方共同建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社会学系初建时,存在鲜明的外国特点和宗教性质,后来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系,她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二)民主、自由思想的输入

教会大学是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西式学校在中国的强行移植。但是,思想文化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西方的科学民主意识以及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潮也就能在这里“来去自由”,再加上“教会大学”这块招牌的特殊保护作用,使广大师生在中国近代历次民族民主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燕京大学在这方面是个突出的例子。

燕京大学是在中、美两国注册的大学,因此体制和风气上都深受美国“校园民主”的影响。正如该校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和校歌歌词“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所倡导的那样,燕京大学的学术空气比较自由,“要是你愿意,你可以从马克思研究到克鲁泡特金,一直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①由于外来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教会大学的政治空气一般比较活跃。以燕京大学为例:在10年内战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燕

^① 唐海:《记司徒雷登》,《燕大双周刊》,第17期,1946年。

大周刊》第6卷第9期刊出了《法西斯问题专号》，共发表论文11篇，其中有：《法西斯思想体系》、《法西斯与中产阶级》、《中国法西斯运动现状》、《中国法西斯主义之发展》、《法西斯运动在中国》、《中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制度下的妇女》以及有关法西斯理论的书评。在《中国法西斯运动现状》一文中，作者黄华就公开揭发了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蓝衣社，撕下了它的遮羞布。在国民党侈谈“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时，《燕大周刊》上发表了《闲话〈宪法修正案〉》和《宪法给了我们什么？》，戳破这一政治骗局，嘲笑国民党的“五五宪草”根本行不通，它不过是一堆自相矛盾的废话。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乡村建设”热，《燕大周刊》还发表了《死路一条——乡村运动能救中国吗？》等文，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和抗日才是中国的出路。又如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曾广泛涉猎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对资产阶级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下过一番苦功，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讴歌自由、平等、博爱，初步形成了自己民主共和主义的政治思想。

（三）进化论的引进

作为19世纪自然科学方面的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被零星介绍到中国来。1806年，严复开始译述英国赫胥黎的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取其前半为书名《天演论》，比较系统地、准确地介绍了达尔文学说基本内容。这是进化论传入中国来的主要途径之一。但同时，进化论也在教会大学中西方自然科学的移植过程中夹带而来。如教会大学中开设的地质学课程中就零星地讲到进化论。最早传入我国的地质进化论著作，即1873年美国传教士马高温和我国学者华蘅芳合译的赖儿的重要著作《地学浅释》（原名《地质学原理》）就谈到不同化石种类确定不同岩层的形成时期、物种的灭亡、自然界与生物界变化的一致性等等。尽管只是夹带些进化

论的零言碎语,但它对一些思想家的进化论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范谦衷在《生物系回顾》中写到他在金陵大学“讲授显微切片学、进化论、生物学史、优生学课程”。^①而且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方面的书籍也在教会大学流传,如陶行知正是在金陵大学求学时系统地学习了严复介绍的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孙中山也曾在中英书院和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也正是“其学课较优,而比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②,西医书院的比较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孙中山接受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是在这里,孙中山“专心致意于学业,勤恳非常”,“午夜起床燃灯诵读”,博览群书,“但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而且他的“思想受此二书之影响为不少也”。^③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东学西渐

中国与欧洲之间在古代和中世纪很少直接交往,欧洲虽然自古以来知道东方有个丝绸之国,但并不知道它就是中国。昔日的《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游记也已被遗忘,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只是一篇朦胧的传奇。^④

16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仅是一鳞半爪,到16世纪中叶欧洲天主教传教士陆续东来并在17世纪初打入中国宫廷后,通过他们的介绍,西方才重新逐渐对中国有所了解。由于明

① 《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19页。

② 《孙中山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

③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中册,卷六,第431页。

④ 何兆武、何高济,《读利玛窦的〈中国日记〉》,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期。

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教士把中国的经籍和文字作品译成外文，纷纷传播到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个“中国文化热”。1615年出版的《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第一次精确而忠实地描叙了中国的宫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利玛窦夸张地赞扬中国：“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据说，最早的中国书西文译本，是罗明坚译的西班牙文的《明心宝鉴》；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讲到利玛窦“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除利玛窦译四书外，其他传教士也先后翻译有《大学》（《中国的智慧》）、《中庸》（《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和由葡萄牙人郭纳爵、意大利人殷铎泽将《论语》译成拉丁文（比利时人卫方济把《大学》译为《成年人之学》，《中庸》译为《不变之中国》）；《易经》由法国人雷孝思译为《中国最古之书易经》；《老子》一书的欧洲文译本最早出现于1750年；《道德经》也分别由卫方济、雷慕沙、傅圣泽等人译出。^①

中国古代哲学经传教士传播到欧洲后，曾经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有过相当的影响，先后对笛卡儿、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杜尔哥、歌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产生过影响。并且，由传教士传入的中国文化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甚至路易十四的情妇彭帕杜尔夫人也养起了中国金鱼，法国宫廷贵妇整天不离中国折扇。^②

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当时往往是同教会学校尤其教会这个“中转站”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里略举几个事例以明之。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②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燕京大学在美国霍尔基金会帮助下建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它旨在通过两校合作,来“促进中国文化及汉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工作”,内容包括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美国和中国通过互相派遣研究生及访问学者的人才交流、出版学术刊物、出版古籍和编纂工具书、添置图书、扩大双方图书馆等几个渠道,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首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华进行2到3年学习或不定期研究访问的学者对东学西渐作出了不少的工作。如:

魏鲁男(Ware James Poland):1929年—1932年在华攻读研究生,专长中国六朝时期史和译释《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

施维许(Swisher Earl):1931年—1934年在华研究中国现代和当代历史、共产党中国和国民党中国。1935年以后在科罗多大学任教,把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传授给美国学生。

毕乃德(Bigger Staff Knight):1930—1935年来华深造,著有《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等书。

卜德(Bodde Derk):1931—1935年来华读研究生,1948—1949年又作为福布莱特研究学者在中国,专攻中国哲学。在1951—1952年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卷一、卷二译成英文,并著有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著作多种。

顾立雅(Creel Horrlee Glessner):1931年—1935年在华读研究生,专长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制度。著有《中国的诞生》(1936年)、《孔夫子其人和神话》(1949年)、《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1935年)。

戴德华(Taylor George Edward):1930—1932年在华读研究生,专长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著有《为华北而斗争》、《变化中的

中国》等书和论文《太平天国叛乱》等等。^①

其次,哈佛燕京学社还通过出版学术刊物、编纂工具书、购买中国图书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东学”。如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编辑出版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自1936年4月创刊,一直延续到今天。自1941年11月起,它的远东中心又出版了《远东季刊》,研究东亚及太平洋诸岛问题。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人员也从事一些辞书编纂工作,自1935年起,他们曾进行了根据中国旧辞书如《十韵汇编》、《佩文韵府》、《康熙字典》、《龙龕手鑑》等的条目编纂《汉英大辞典》,但由于工作繁巨,战事阻挠,迄今尚未完成。哈佛大学还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另建图书馆汉和图书馆(今名哈佛燕京图书馆)。汉和图书馆到1950年已有东亚语言方面藏书22.45万本,它在短期内跃居于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第二大东亚图书馆,^②并且包括一些中国善本、珍本、抄本古籍,使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迅速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研究中国学)中心,迄今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作用。

教会大学传教士花之安曾用德文和英文著述,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向德语和英语国家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在西欧颇负盛名。它的主要外文著作有《儒家汇纂》(1872年德文出版,1875年英文版)、《中国宗教科学导论》(1873年德文版,1879年英文版)、《孟子思想》(1877年德文版,1881年英文版,1897年重版)、《中国著名男子名录》(1889年英文版)、《中国著名女子名录》(1890年英文版)等。

传教士往往以征服者自居,向西方介绍中国总的倾向是贬

① 参考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48—152页。

②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过于褒,有的著述带有深刻的偏见。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出于“要改造中国,就要找到中国人性格的根源”的目的,于1892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特性》,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6个特点。他把中国封建主义腐朽落后的旧意识和恶习,夸大为中国人共有的特性。象这种带有偏见性的译著几乎随处可以看到。

第七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第一节 教会大学世俗化、正规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科学传授和学术辅教,是基督教在近代社会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传教布道方式。这不仅是欧美各国基督教所努力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积极推行的方法。

在历史上,许多国家的学校教育出现同宗教的产生几乎同样古老。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其中包括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宗教是被颠倒了的世界观,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需要利用学校教育所具有的“劝谕”和“教化”作用,来传播宗教的教义,扩大宗教的影响。宗教经典的研究必须要从原本的文字,结合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进行探讨。为了能阅读宗教经典,僧侣和教徒需要识字,因此,教会在施行宗教教育的同时,有时也会施行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这种教育归根到底也是服从于神学的目的。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宗教利用学校教育的具体形式及其实现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在古埃及,公元前 4000 年就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学校。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尊崇太阳神和法老,但即使寺庙学校也传授内容广泛的世俗知识。在古印度,学校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附庸。两种宗教都鄙薄现世生活,引人走向消极人生。古希伯来人以犹太教为立国之本。国家沦亡后,他们把爱国的希望寄托在耶和华的身上,因而学校教育与宗教教育紧密结合。

12 世纪,由教会学校转变而来的大学逐渐在意大利、英、法

等国产生。到14世纪,欧洲的大学已达80所。17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迫使神学逐渐地去适应科学。”^①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此指出:“17世纪,在西欧基督教世界中确立了宗教宽容,这是近代西方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之一。”^②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的进步,已逐步改变了它们在中世纪作为宗教婢女的地位,而其不断胜利发展,又迫使宗教去适应科学与哲学的观念。1699年,英国国教会在国内成立基督教知识促进会,1701年又成立国外福音宣传会,1814年英国及海外学校协会成立。

19世纪在基督教史上被誉为“伟大世纪”和“新教世纪”,而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它又被誉为“科学世纪”。正是这个宗教与科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时代,给近代入华传教士的高等教育事业的世俗化和正规化提供了文化思想土壤与社会活动背景。

著名传教士狄考文曾列举教会学校应当重视教育的三大理由:①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②注重科学可使教会学校出名;③开设科学课程可使毕业生更有能力成为社会的领导者。“藉教会学校传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提供物质方面与社会的贡献。此种贡献至为需要,最易证明,且最实际,与大众乐意接受。”新教“自由派”更主张广义的、间接的传教方式,注重开启民智的工作,认为“教会需要更多的科学、更多的报纸和更多的书籍,需要更多的公共演讲和科学仪器,……不但要强调宗教,而且要强调健全的政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简明真理。”^③因此,以学辅教乃是近代基督教极为重视的传教方式。

① 罗素:《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

②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71页。

③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1896, p. 307.

爱因斯坦有一句哲理名言：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传教士不仅可利用基督教文化发展而来的科学威力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而且广泛的推行西式教育更能制造出一个有利于促进人们改宗基督教的社会环境。宗教与社会的双重需要，成为基督教在华高教事业世俗化、正规化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近代中国，这种世俗化、正规化发展趋势更为急促。这是因为：第一，西方列强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及其控制的海关、税务、邮局等部门，大量需要为他们服务的各种专门人才。1890年后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到中国传教去”的热情支持者；海外传教与海外扩张进一步结合起来，使海外传教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华教会大学正是美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产物。为适应西方经济掠夺的需要，教会学校不得不加速了向世俗化、正规化转变的过程。

第二，自“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掀起了反宗教教育和反奴化教育的斗争。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就是最明显的标志。这股在教育战线上反帝斗争的滚滚洪流，不断地向教会大学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猛烈冲击，也就更加推动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和多功能的发展。

第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夺取中国的教育权，各教会大学也需向专业化、世俗化推进。由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和国立大学的崛起，使教会大学越来越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作为西方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它们必然不断地重新调整宗教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之间、学校当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便顺应中国的民族情绪；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实体，它们又需要在各教会大学之间，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之间，展开激烈的竞赛和竞争，看谁更能适合中国国情，办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模

范”大学来,以便夺取中国教育的控制权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早在1877年美英传教士设立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即1890年改名为“中华教育会”的会上,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luim. P. Paskes)就有过自白:我们的目的,在于“取得和保持对中国人民及政府正在提倡的教育运动的控制权”,并“准备着指导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

教会大学向世俗化、正规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改变课程设置,加强近代科学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教会大学都把宗教课作为必修课。到了30年代,大多数教会大学取消了强制性的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此时校方更注重基督教精神的潜移默化,把宗教宣传活动趋向于由“粗俗的宗教形态”改变为“有修养的哲学形态”。传播福音只能在政府控制的教学计划所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另一方面又大力加强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如理、工、农、林、医等等。

2. 为适应社会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旧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在这种环境下,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每一个教会大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司徒雷登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以培养一种合作、建设和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要变成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①

1886年,美以美会传教士库恩非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要教会学校把每一个人培养成教会工作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此,为满足学生今后就业的多方面需要,学校应开设

^① 《燕大新闻》,1934年12月18日。

包括英语、科学及其他学科在内的多种课程。^① 第二年,卜舫济也提出教会学校应该“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并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②

燕京大学先后建立了制革、农科、劳工统计调查科、教育专修科,宗教事业与社会服务科等一系列职业学校。1927—1928年,燕大的职业教育达到顶峰,学生占在校生总数26%,成为燕大转轨变型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此外,英语课作为“感化蛮族的工具”受到了普遍重视,已成为招生的一大吸引力。其它如教育系、商业系、新闻学系、体育系,工程、图书馆、幼稚师范等专业纷纷建立。

3. 提高入学条件,充实教师队伍。

过去,由于教会大学的宗教目标使学校无法聘到热心传教而又有学问的教育工作者。1881年,《教务杂志》上有人针对当时一个教师同时兼几个系的课程,而且往往是临时性的或兼职性的状况写文章建议:每一所教会学校应该“至少有一名把全部时间用于教育工作的外籍教师”。这反映了教育自身的要求。20世纪初,中国教育会执行委员会的8名成员以教育会的名义向欧美各差会发出呼吁,要求增派专职教育工作者入华。呼吁书指出:鉴于中国已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只派专职牧师入华以宣讲福音为主的政策必须进行修改。以后应特别注意选派经过专门训练的、从事教育工作的平民信徒入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需要专职教师。^③中国社会不欢迎“传教士”,但欢迎“教育家”。

① C. F. Kupf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Nov. 1886. p. 417—421.

② St. John's University, 1879—1929, Shanghai. 1929. p. 7—8

③ *An Appeal to Foreign Mission Boards for Trained Educator for china*,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 1902, p. 619—621.

4. 实现联合办学,提高学术水平,力图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

实行联合办学,扩大规模,增加投入,可以加强学校的实力。到20世纪20年代,主要教会大学不仅已基本成型,而且开始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时西方在华所办学校的学生数占中国学生总数的32%,其中初等学校为4%,中等学校为11%,高等学校竟达80%。^①那时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的有山西、北平大学2所,另外还有私立大学5所,而在华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却有16所。^②其间除个别是20世纪以后新建的外,绝大多数是单个差会所办学校或原有教会学校的合并。为加强各基督教大学的联系与合作,1919年成立了“全国基督教大学和专科学院联合会”。在实行组织上的联合归并后,还要求各教会大学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课程设置,大力提高学术水平,重点发展自己的专业所长,形成一个专业教学科研中心。如南京金陵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先后办起农林学院。南京的动植物病虫害研究、小麦玉米棉花的品种改良和岭南的园艺、水稻栽培方法的研究等,都形成各自的特点,在这一领域中居领先地位。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圣约翰大学的商科、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业、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等等,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拳头专业,从而增强了自己同其他教会大学以及中国国立大学互相竞争的能力,为这些学校赢得了声誉。

然而,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和正规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它作为传教工具的性质。教会大学一方面要对中国国情作出反应,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乃至争取成为当时的“模范”大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② 陈景骞:《中国近代教育史》,第23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学;但是另一方面又需适应西方列强的要求,不断把中国推向半殖民地殖民地化的轨道,确保传教事业的发展及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因此,教会大学在世俗化、正规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内部各要素必然互相影响,体现出教育自身规律的作用。但是,教育自身规律的体现又必然要受到生产关系、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它是影响教会大学世俗化的决定性因素。离开社会性质谈教育自身的规律,进而肯定传教士的活动,认为他们一直在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在朝着世俗化正规化方向不受任何限制地走到底,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教育性质的原理。因此,就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来说,只有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才能最后彻底地走上世俗化、正规化的健全轨道。

尽管如此,近现代中国教会大学的世俗化、正规化发展趋势,却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导向作用

一、洋务运动时期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对近代化的进程往往起着先导作用,其基础是政治、经济的变革;同时,教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遵循着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承继性、延续性原则,它的近代化启蒙,往往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19世纪60年代由洋务派发动的“自强新政”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为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前提;中国的特殊国情,又决定了教育的近代化不是来自自身的自觉行为,它的近代化的肇端与教会大学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内外交困的历史际遇,使中国传统教育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集中表现为科举制的岁暮途穷。科举制规定,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命题范围,制义格式以八股文为统一标准,致使学人士子一意“代圣贤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与科举制相应,教育内容则以朱熹集注的《四书》和《五经》为范本,又令臣民恪守《圣谕广训》中“敦考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等训条。按照这种模式塑造的学生,严重脱离社会实际,根本不适应时代需要。

与中国传统教育江河日下的颓势形成鲜明对照,西方蓬勃发展的近代教育,以传教士为媒介,逐步传入中国。1893年11月,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1842年,米怜把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的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接着,为了“推进上帝的事业”,^①传教士纷纷在五个通商口岸甚至内地设立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在学制、管理、教育理论等方面都迥异于中国的旧式书院。这期间,曾游历美国的学者李圭,深有感触地说,美国教育“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是以课程简而严,教法详而挚,师弟间情洽如骨肉。尤善在默识心通,不尚诵读,则食而不化之弊除;宁静舒畅,不尚拘束,则郁而不通之病去”。^②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把西式教育和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对比,着重阐述西式教育教学内容的讲求实效、教学方法的启发自觉、教学思想的倡导自由。教会学校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客观上适应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要求。因而,它的出现就不能不从教育体制内部冲击着、瓦解着本已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使之呈现出一种势在必行的变革态势。19世纪60年代,以洋务运

① 《中国丛报》第二卷,第42页,布鲁因图书馆发行。

② 《环游地球新录》,第106页。

动为契机,这种态势终得以向现实转换。中国的教育踏上了姗姗来迟的近代化的历程,即开始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改革运动。

中国教育改革,是以建立新式学校为标志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讲求“算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洋务派提出开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语文、翻译西书、成立译书局等任务。1862年,第一所外国语学院同文馆开办于北京,这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开端,也是清政府转变对西学态度的开始。除同文馆外,还出现了一批培养方向明确的专业化学校——军事学堂。如: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开设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器学堂,以培养制造枪炮的人才;1866左宗棠在福建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以训练造船与驾驶的水师人才;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他又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等等。这些新式学校的规章制订、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的确立等,无不直接或间接接受教会所办学校的影响。

从课程设置来看。在教会学校未开办之际,中国封建的私塾里,成天读的是“四书”、“五经”,没有什么新学课程设置可言,教会大学的兴起,使他们透过这个“窗口”,了解到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是可以纷呈多彩的。如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开始把文人学子从封闭的单一的故纸堆里解放了出来。最初的同文馆,聘请西人教授英文、法文、俄文等,只是一种实验性质,到1868年算学馆成立,从学习西文进到学习西学,这所翻译学校才逐渐向一所高等学校过渡。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Martin)出任同文馆总教习,这所学校才逐渐变成设有实用科学课程的学校。同文馆引进的新课程有:一、算学——1868年,由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任教习;二、化学——1866年,由法国人毕利干(M. A. Billegwin)任教习,编写了第一本中文化学教本;三、国际公法——1869年,由丁韪良讲授,翻译出版了中文的第一部《万国公

法》；四、医学生理——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德贞(Dr. Dudgeon)讲医药与生理课；五、天文——1877年，首由美国人海灵敦(Harrigion)讲授；六、物理——1879年，首由美国传教士欧礼斐(C. H. Oliver)讲授，他后来任同文馆总教习。^①

教科书的编写。随着教会学校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教科书问题自然提上议事日程。这时，传教士编写了一些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教科书，如公理会教士江戴德编写了地理书、谢卫楼编写了外国历史书、谢卫楼夫人编写了生物课本、狄考文编写了算术书、汇文学校首任校长李安德编写了自然地理书等。为了统一编写出版教会学校教科书，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187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成立了益寰会，后改名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该会发行的除宗教教科书之外，有不少数、理、化、天文、地理、历史以及生物、卫生、体育等方面的教科书。我国近代最早的“教科书”一词，就由此而来。它出版的这些教科书，如《心算初学》、《代数备旨》、《测绘全书》等则成为我国新式学校的通用教科书。

教育思想的引进。西方实用科学的开设，可说是对封建旧学陈腐之气的大扫荡。这种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兴办的学校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在兴学之初，他就派梁鼎芬到文华书院(即后来的华中大学)了解学堂的教学体制、方法和课程设置等等，在课程设置上涉及到农、工、商等各个方面，并且他强调，不但要学“西艺”(西方自然科学)，而且要学“西史”与“西政”。这说明，西方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已开始渗透到没有聘请洋教习的中国人自办的学校里。这是传统教育的结症所在，

^① 丁韪良：《同文馆记》，《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中华书局版；吴宜良：《京师同文馆略史》，《中国近代史料》二编，1957年，中华书局版。

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坚冰既已打破,航道迟早会畅通的。

以上所述新式学校的建立、西学课程的开设、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引进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会大学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破坏者,又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者。这种奠基作用,缩短了中国教育自身近代化的摸索时间,又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演进确定了基本的格调,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历史不会停顿,洋务时期的教育改革,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帷幕。古老的中国教育,必将在教会大学更强劲地冲击下,进一步向近代化迈进。

二、戊戌维新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打开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通道。中国开始改变对西方的态度,西方文化利用这种有利时机,以磅礴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凌厉攻势,教会大学中的西方传教士充当了这种攻势的急先锋。他们抓住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朝野为之震惊的时机,大肆宣传兴办新学与西学的重要性。在戊戌维新前后,发动了一次颇有声势的宣传运动,对百日维新推行的教育改革制造舆论。

1881年,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发表《振兴学校论》,批评中国人古训至上,所学范围太狭,不过“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已;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于学。另一位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曾任《上海新报》编辑、江南制造局翻译、上海广方言馆英语教习,后来又在吴淞创办中西书院。从1868年起,他就在上海主办《教会新报》,1874年该报改为《万国公报》。该报除刊登中外新闻外,一半篇幅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政制、史地及社会生活

习俗等。他写过许多批评中国旧教育制度的文章,认为“中国人才之不振,由于教化之不兴,”^①主张改革科举兴办新学,先在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并建议“请英、美等国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教育)”;又主张先设立师范,“还聘英美通人为山长”。^②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提出类似建议,撰《七国新学备要》,鼓吹中国大兴西学,设教育部。

在戊戌前夕,西方传教士进行的这场宣传改革的运动,其领袖人物是李提摩太,其中心组织是广学会,其中心任务是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教理知识,即推广教会的教育。但其活动范围却不在下层,而是结交权贵,并在维新派知识分子中广为联系,做上层分子的“启蒙”工作。广学会的机关刊物就是林乐知主持的《万国公报》。当光绪推行新政之时,为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129种新书,其中广学会编辑出版的占29种。维新派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有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论文共36篇,只比康有为本人的文章少两篇。

除广学会外,1890年,西方传教士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又组织了中国教育会,李提摩太任会长、林乐知任副会长。教育会鼓吹变法的重点在改革教育,企图在维新派兴办新学的教育改革中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以取得顾问、教习或总教习的地位。教育会于1896年成立一专门改革委员会,推举林乐知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创设总学堂议》、李佳白起草《改革中国考试制度议》。狄考文的建议以教育会的名义于1897年4月呈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二年,又以广学会的名义向总署呈送《速兴新学条例》,并分送各省督抚。1890年,

① 林乐知:《格物致知论序》。

② 林乐知:《治安新策》。

两个联合会发表《推广实用条例》，拟定新的考试制度与新学课程表，以推广教育改革。^①

由此可见，戊戌时期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改革施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宣传活动也是较有成效的。

首先是对中国思想界的触动。传教士从人数上说，其量比较单薄，但它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却是巨大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培养了一批要求变革现实、变革教育的中坚力量。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直接受到《万国公报》及广学会其他宣传品的影响，康有为在1882年经过上海时，曾购买了不少广学会的书籍并订阅了《万国公报》。梁启超1895年在北京期间，除与李提摩太结交外，也阅读了广学会大量出版物，包括《万国公报》在内。他在《时务报》发表的政论，有不少是《万国公报》宣传过的言论。其他如谭嗣同、翁同龢以及光绪帝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②

其次是对兴办新学的宣传，收到明显的效果。一般来说，人们对教育危机的感受，要晚于器物层次及制度层次，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揭露，对兴办新学重要性的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维新志士思考中国“积弱”的深层原因，认识到传统教育“其实无用”所造成的人才“虚患”，是中国贫弱的根本问题。这种认识在统治层内也引起了共鸣。全国上下发出了教育救国的呼声。大量的新式学校不断涌现，成为戊戌时期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有50多所。这些学堂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中国人自己第一次创办的上海经正女学堂和广东乐平女学堂。有的学堂以理工科为主，象谭嗣同在家乡办的浏阳算

①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第65—69页，1980年版。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76—277页。

艺学堂,还有天津中西学堂、杭州蚕学堂、武汉农业学堂等;有的文理合一,如京师大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有的以武备为主,如各种武备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从开办到课程设置,乃至教员聘请,无不与教会学校与传教士进行的宣传活动有关。

三、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

19世纪末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教育史上带有转折性的20年。这期间,传统的教育制度几经颠簸,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新的教育制度以诏令、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逐步完善;各级各类大学纷纷建立。这其中,既与传教士的多年鼓吹有关,也同各级各类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在世俗化发展中的借鉴作用分不开。

1. 官立大学的兴办。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的学制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教会大学兴起,二是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人对西文、西学的强烈渴求。

在这期间,教会大学的兴起,如雨后春笋。除新教教会创办的13所大学、天主教会创办的3所大学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学院和专科学校,广布全国各地。这就强烈地刺激着中国,构成了中国兴办大学的外在压力。同时,国人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提出了学习西文、西方知识的要求,在当时中国没有自办大学,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毕业生。1898年广学会成立11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教士们在各省都受到中国学生的包围,要求帮助他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或某种西方科学,……自1895年改革运动开始以来,各省都显示了类似的趋势。由于一些改革派获得地方大员的同情与支持,有关西式学堂与大学的消息在内地人们的通信中传送频繁,……商人们和传教士们

经常被找去当顾问。信件从各地飞来,要求本会为它们推荐外国教习。”^①正是在这两种内在压力下,1896年孙家鼐呈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8月,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在北京建立。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除了国立大学外,各省纷纷设立高等学堂。据1909年统计,全国共设置了3所国立大学,23所省立高等学堂和97所高等专科学校。这些新式的高等学堂,往往聘请传教士为总教习或教习。京师大学堂在开办之初就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1895年,盛宣怀创办中西学堂(1903年改名北洋大学堂),秉承李鸿章旨意,请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任总教习。丁停办中西书院,全力筹办这所我国最早的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新大学。他广聘美国人任教员,扩大美国影响。1902年,丁家立又获得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即北洋大学预备学校)总教习的职务,后来成了直隶全省西学督导。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我国南方第一所高等工业学校——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聘请美以美会传教士福开森为第一任监院。此外,这些大学,有一个时期除国学课程外,很多课程都用外语讲授,用西洋的课本,由此可见,传教士和教会大学在我国新制大学中影响是比较大的。

2. 新式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引进。

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作为学校办学的根本指导方针,西方传教士从来就没放松过在这方面的努力输送,企图最大限度地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1873年,德国著名传教士花安之出版了他的《德国学校论略》和《泰西学校论略》,介绍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教育制度。不久,总理衙门又委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研究和报告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1883年,他完成了这个报告,题)

^① 杰西·格·卢茨:《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5—86页,台北,1980年。

《西学考略》；1892年，李提摩太所著的《七国新学备要》一书出版；1896年，林乐知将日人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振兴文学成法》译成《文学兴国策》二卷。这些论著都不同程度地和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前后，传教士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困，全国上下要求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时机，再次掀起了介绍西方教育体制的高潮。由于处于大动荡的年代和大变革的舞台，来不及对西方教育制度的优劣进行仔细辨析和下一番排沙拣金的功夫，因而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新学制——《癸卯学制》基本上是从这些论著或译著中抄袭过来的。这个以欧美特别是日本为楷模的教育制度，与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相比，又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应该说，传教士对这个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

3. 教育宗旨的变革。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都以尊儒与忠孝为其教育宗旨。这一宗旨经过教会大学的影响，洋务、戊戌时期的冲击，到晚清有所变化。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中，规定“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在《钦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的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学”。1906年学部又规定各级各类学校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办学宗旨。这一教育宗旨里虽仍强调“忠君”、“尊孔”为其根本，但毕竟把“尚实”的思想第一次以章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对民国教育宗旨的制定有直接影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的教育宗旨是在批判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前提下，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是一个以注重道德为主的教育宗旨。这一宗旨牵涉到教育应培养具有什么样精神风貌的社会公民，其实就含有教育应为发展中的社会服务的求实思想。

“求是”教育宗旨的确立，科举制的坍塌已指日可待。1905年，清政府终于下令废除延续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封建的教育体制竟比它的政治体制更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点，相当深刻地说明了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影响。

当然，我们在恰如其分地肯定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历史作用时，应该明确，教会大学所以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能起一定的催化作用，其根源还是在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教育近代化提出了要求。如果没有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的世俗化发展，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也迟早会要出现的。

第三节 对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

一、在理、工、农、林、医、体专业设置方面的先驱作用

延续1000多年的中国旧式科举考试制度以教授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为主，严重禁锢了士子们的聪明才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遂贫弱。”^①而教会大学在教学方针上注重“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适应社会需要”，强调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在教学方法上，重视智力开发，提倡自学；主张学术思想自由，既有严谨笃实的学风，又有较为活跃的学术氛围；在教学内容上，他们在“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的思想指导下，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教

^① 严复《救亡决定》，《侯官严氏丛刻》。

育只讲“义理、辞章、考据”的“科甲正途”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体能标准,广泛地开设各种西式课程,进行有关的专业设置,给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这主要表现在理、工、农、林、医、体诸方面的专业设置,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驱。

在早期狄考文创办的文会馆里,西学课程占的比重就很大,包括数学(含有代数、几何、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生物学、测绘学、量地学、航海学、心理学、是非学、音乐等,还有万国通鉴、富国策、二十一史约编之类中外史地、政治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① 马六甲英华书院首任校长米怜在起草英华书院章程中规定该校“既教授中国的知识,也教授欧洲的知识”,所谓欧洲的知识包括近代自然科学如天文学、数学在内;^② 1835年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章程附则也规定马礼逊纪念学校讲授“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③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数学、生物学、生理学、天文学、动植物学、“格致入门”、化学以至地质学都先后列入教会办的书院课程。登州文会馆(山东齐鲁大学前身)以“理化天算科教授生徒,对学生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有些外国教育家如日本的平塚益德,称赞该校“以特别教授算学、理科为目的”。^④

1881年成立的上海中西书院(后并入东吴大学),也相当重视西学,学生从第三学年开始授以数学启蒙,第四到第六学年先后授以代数、“格致”、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化学、重

① 李伟凯:《狄教与文会馆》,《华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三期。

② 邹明德:《鸦片战争前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③ D. Mac. Giuirray, *A century of Missions in China* p. 646—652.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④ [日]平塚益德:《近代支那教育文化史》第四章。

学、微积分等,第七、八学年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课程,则授以航海测量、天文测量的专门学问。^①当时的书院创办人林乐知在其所作的《中西书院报单》中还提及到校内“格致馆(即理化实验)格物化学等器具、药水均已预备”。^②

金陵大学于1921年改文科为理科,理科含化学、数理二系及医学先修科。1933年正式成立化学工程系。理学院还开办了化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从事高深之学术研究。研究所当时所开设的课目就有: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有机定性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化学动力学、化学热力学、电化学、脑体化学、营养化学、化学工程原理、工业化学、化学工厂设计、化学史等。^③

金陵大学的农科也是中国农林教育的先导者。

1914年,传教士裴义理在金陵大学创办农科。1915年,添设林科,以培养林业专门人才。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称农林科。这是我国最早的农林科。1930年,改称农学院,下设8个系,即:农艺、森林、植物、蚕桑、农业经济、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教育;一个农业专修科;一个推广部和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农艺学研究所、园艺学研究所。

农林科(院)在教学上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推广,要求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都得参加研究工作;同时,注重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规定有四个学期及一个暑假的实习时间;实习劳动不足者毕业前必须补足;社会服务的项目和时间,学生必须认真完成,不合格者不予毕业。^④

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端于教会办的医学校。第一位来中国

① 《五大洲女俗通考》第10集,《耶稣教美以美会镇江女塾功课章程》,1904年。

② 范约翰:《上海清心中学滥觞记》,1910年。

③ 沈彬康:《化学研究所的回忆》,《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06页。

④ 《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85—86页。

的传教士医生伯驾于 1837 年在广州为他的三名中国助手开办了第一个传播西方医学的医学班。1866 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嘉约翰在广州开办了华南医学校。他在广州从医 50 年,翻译、编写了西医药书籍 34 种,如《种痘书》、《卫生新编》、《体用十章》四卷等。不但介绍了西方医药知识,而且解决了中国教育史上无医学教材的问题。

19 世纪后半期起,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一些新式医学院纷纷建立。如:北京协和医学院(1915 年)、山东医学院(1910 年)、华北协和医学院(1904 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14 年)。一些教会大学还设医学院或医学专业,如齐鲁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等。医学院引进中国传统医学所没有的一些科学诊疗手段,诸如解剖、化验、注射、手术、以及 X 光线等。课程有解剖学、外科学、组织学、药理学、生理学等,这些名称都是主要由传教士组成的中华博医会统一规定的,是中国前所未有的。

教会大学最早提倡体育运动,并列入正式课程。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新事物。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来看,该校于 1883 年设兵式操,1890 年,学校举行第一次学生运动会,学生踊跃参加。此后,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并施以相当训练,从 1890 年到 1929 年间,学校陆续建立了田径赛和足球赛场,还有健身房和室内游泳池、网球场、篮球场以及各种体操器械,并于 1929 年建成一座交谊室大楼。在组织方面,1895 年,成立了学校体育会;1914 年 5 月,组成华东六大学体育会(即上海的圣约翰、南洋、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杭州的之江大学)。体育会经常举行体育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棒球和篮球。在 20 世纪初举行的国际田径运动会上,中国代表队的队员大都是教会大学的学生,可见教会大学在体育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二、开我国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等社会教育的先河

传教士在从事各类职业教育的同时,还从事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等社会教育,以此作为提高传教功效和教会学校声望的手段。这些教育在我国尚属首创,客观上为我国教育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中国的女子教育发端于基督教教会学校。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妇女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基督教传教士使女子走出闺阁,冲出封建礼教桎梏,接受教育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的1825年,设在马六甲的中国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即开始招收女生。^①“三十年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妻以利纱在广东设立女塾,当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创办女子学校之始。”^②1834年,若干英国妇女组织了“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其促进会成员阿尔德塞女士于1844年在宁波设立女塾。据统计,1844年至1860年间,教会在五个通商口岸共设立了11所女子普通学校。之后,随着清政府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教会女校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876年,有女校121所,学生2100余名。1895年,有女子小学225所,女学生4262人;女子中学69所,女学生2096人;女子书院及培训班14所,女学生有416人;总计6798人。^③

在所有这些教会女校中,较为著名的是林乐知于1890年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该校设置的课程有汉语、英语、史记、地理、算学、格致、图画,兼授西国女红针黹、风琴等。针对女学生的

① 香港英华书院特刊编辑委员会编:《英华书院170周年纪念特刊》。李志刚:《英华书院有史为证》,1987年7月。

②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商务印书馆,1922版,第232页。

③ 《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上海,1898年,第二部分,第362页。

特性,十分注重西洋音乐、舞蹈,设有音乐、舞蹈、表情法等课。该校对后世影响甚大,1903年美国监理公会创立的“上海女书馆”“所定课程,教法悉仿中西女塾”,有高级中学、小孩院、师范院。

教会女校的勃兴以及郑观应、梁启超等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号,难产的中国自办女校——正经女校,终于在1898年产生了。这所中国人自办的最早女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上都以中西女塾为模式,并聘请美国传教士林梅蕊为西文总教习。教会创办女校是有其如意算盘的,即认为女子易接受基督福音,他们又是或将是中国一代人的母亲,对他们进行基督福音的熏陶,易于向社会扩散。但它抢在中国女学的前面,使女子获得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标志着旧教育只有男子享有教育权格局的崩溃,随之在中国妇女中出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要求不缠足、甚至参政的潮流。所有这一些,我们都应给予肯定的评价。

给予女子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创办女子大学,也是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独辟蹊径。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派到福建传教的女传教士伊丽莎白·菲希尔在一次聚会上发表讲话说:“我要投下一颗炸弹,即人们给咱们女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子多少教育,那就一定也要给女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经给男子大学教育,那就一定也要给女子大学教育。”^①1904年,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成立,1909年即有4名学生修毕大学全部课程。此后,又先后成立了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又是在教会办的女子高等学校学生中最早获得女学士学位的。^②仅金陵女子大学从1919年到1925年,就共有大学毕业生近9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

^① L. Ethel. Wallace: *Hwa Han College—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校基联合会,第2页,1956年。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

我国的教育界、科技界及其他领域作出了一定贡献。

实现高等学校的男女同校学习,也是教会大学领先。如广州岭南大学,早在1905年就招收女生,1918年正式实行男女同学。^①在旧中国,第一所正式招收女生的学校是北京大学,于1917年开始招收,但只准他们参加旁听,尚未批准女生进入本科和预科肄业。

教会女子大学为中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我们应恰如其分地肯定这一点。但也要看到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需要,中国高等教育的门最终将为女子敞开;而中国女子在摆脱封建桎梏,争取自身自由解放的过程中,也自觉地去追求新知识,接受新事物,并显示了自己吸收高深学问的能力。

1877年,梅理士夫人在山东登州开设了中国第一所聋人学校,按美国方式教育中国聋学生。除读书外,另传授各种手艺,诸如制鞋、木匠等等。1907年,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组织了一个有12个盲人参加的传教会,教给盲人以各种生活能力,使他们能够用盲文读书,并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到1914年止,全国有13所盲校,毕业400余名学生。这类学校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为残疾人开设特别学校在中国是第一次,其中有些特别的教学方式一直流传至今,如最早编排的哑语、盲文及有关课本均源于这些学校。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第三册,第38页。

第八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新式 知识分子的成长

第一节 教会大学有利于人才 成长的若干特点

一、办学宗旨的二重性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传教士多年来的传教布道工作就象“把种子撒在水中”^①一样遭到了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很快走上了“以学术为媒”传播基督教义的道路。在他们看来,教育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天生的强烈的亲和力,这使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②通过教会大学培养出“掌握真正科学精华的”中国牧师和教会领导人,进而利用他们的倡导,影响中国人心,“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③达到为基督征服中国的最终目的。因此,自教会大学创办开始,传播基督教义、以基督精神占领中国青年的思维空间,便成了教会大学不可或移的办学宗旨。美国传教士罗炳生曾经指出:“教会大学在课程方面,本与国立大学大抵相同,其所异于一般大学之处,即在

① *Archives of America Board of Commissioner for foreign missions.* 16. 3. 12. /5. / 28 16. 3. 12. /2. /154.

②③ 狄考文在1877年全国基督教大会上发言。*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1877. p. 171—180

教授宗教与造成宗教的环境,这就是基督教大学特殊的贡献,倘使在这方面失败,无论其他事业的功效如何,已失去其特殊的本质了。”^①

美国新教圣公会曾议订了一个《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其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有:“教会学校是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标志,以传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来,学校的当局和作为教会代表的主教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和促进学校的宗教特点。”^②

为了贯彻执行宗教教育宗旨,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如圣约翰大学自1865年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时期起,到1952年为止,在漫长的办学过程中,一直强制性实行宗教教育,每日清早即有“晨更”,每周两次“晚祷”,学生都必须参加,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师生都要做“礼拜”,参加圣经课。在礼拜堂中由学监点名,记下缺席学生的名号,缺席次数稍多的学生,便由校长亲自“训话”,如果圣经课不及格,就得留级或不予毕业。^③1927年,在汹涌的“非基督运动”冲击之下,圣约翰大学不得不表面上实行“宗教教育选修制”,但校方仍以各种方式诱骗学生,实际上毫不松劲地继续贯彻宗教教育方针。据统计表明,该校在1938年到1945年7年时间内,除校方统一规定的共同宗教课程有“宗教与现代问题”、“宗教与人生”、“基督信仰”等十几种外,各系还总计开设了44门宗教课程。在宗教活动方面,每年都召开“布道大会”,邀请“著名牧师”到校发表宗教演讲,企图在非基督教学生中激起一些“兴奋”作用。布道之后,校方便派出许多基督教学生分头在非基督徒学生中进行拉拢、劝导。如果发现有人受了“激励”,马上便鼓动他们在班级中表示态度,有时甚至在大会上站

① 《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26年9月。

②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

③ 参见《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活动》。

出来“做见证”，表示愿意接受基督教，这些初步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学生，便成为了“慕道友”。以后，再由牧师不断地进行“开导”、“帮助”，直至吸收为教徒。

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意识强烈、思想和行动“越轨”的学生，教会大学订立了名目繁多的校规，进行严格的束缚和限制，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意识地压制学生，不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沪江大学《学校惩戒规则》第二条第八项明确规定：“在校内外参加未经学校及政府许可之组织与活动，或其他违反学校及国家禁令之行动者应予严惩。”^① 英人圣公会会长曾断然指示下辖大学：“学生会会有政治意味，不准组织。”^② “圣三一”的英人校长对学生说：“英国人所办学校，有关领事在广州，断不能循你们的情，任听你们中国人自由。”^③ “圣心”的法人校长则欺骗学生：“你们的命运在华府会议中决定了，无庸你们去救，你们也是救不来的。”^④ 岭南大学美国人校方也明确规定，“教会学校只可宣传宗教，不许谈论国事。”^⑤ 向来以思想活跃而著称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校方的严格控制下，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前，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甚至连“五四”运动的狂飚也未能触动这一片沉闷蛰息的土地。^⑥ 帝国主义教会的层层压制，旨在培养中国青年学生羔羊般温顺的品格。正如《广州“圣三一”学生宣言》中指出：“他们是想引我们背着进化的道路后退，制造成头脑简单、奴隶性成的民族，任以他们宰割。”^⑦ 当学生运动一旦掀起高潮，校方便一面与反动政府相勾结，对进步学生予以迫害镇压；一面则对学生进行拉拢分化，削弱其斗争力量。

① 参见《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活动》。

②③④⑤ 《向导周报》，第72期，1922年7月2日。

⑥ 参见《1919—1949年北京青年运动史》。

⑦ 《向导周报》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上述宗教教育宗旨及治校方法，固然培养了一批虔诚的宗教教徒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亲信；但也正是从这种思想动机出发，他们提出了“不致使宗教成为科学的敌人”，要“兼蓄并输”，和“人格”风范的培养等等，这又在客观上有利于我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

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若干特点

(一)注重科技教育。

传统的中国教育，一般说来，是不够重视科技教育的。相反，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或者只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迷信的附属品——如天文、历算、五行、方輿之学；或者被贬作不齿于学术正流的“小术”、“方技”——如医学、农学、工艺学等等，而不见重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知识分子。即便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王朝也只创办了几所技术和军事的专门学校以应急需。186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竟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大学士倭仁、御史张盛藻等人群起攻击天算设科是“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强调“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最后皇帝亲自出面保驾，才保全了新生而脆弱的天算馆的生命。由此可见，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封闭狭隘性是何等严重乃至可笑。而帝国主义者出自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直接兴办掠夺性工矿企业，就地培养科技人才的需要，利用了教会大学这个特殊的阵地。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说明科学如何能以这些各种各样方法帮助一个民族，我们将会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他们的朋友，相应地会得到中国上层官员们的尊敬和称赞以及全国人民的信任。”然而，这在客观上却促成了许多中国科技人才的成长。

为加强科技教育，依靠单纯的理论知识学习和积累显然是

不够的。几乎所有教会大学的理科院系都比较重视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例如协和医学院在建校初期,便强调实验操作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把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课堂讲授不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相应地减少其所占的时间,临床前期的课程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学年,进行启发式教育;进入高年级之后,便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临床见习培养自学、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室训练主要体现在临床前期各科的教学中,一、二年级的课程均伴随着一些初步实验室学习,在第三、四学年,要安排一部分时间供学生参加科学实验,学生也可以利用选修时间或假期,根据各人兴趣,各自选择实验研究课题。这种训练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要求在短时间内即搞出发明和创新,不贪图急功近利的效果。^①

为加强科技教育,教会大学还注重把科技推广到社会。

应当指出,尽管“科学技术”常常作为同一概念使用,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重要区别的。科学,是人类在研究自然现象过程中所构造的一系列理论系统,因此,科学从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而技术则是人类操纵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手段,本身就是直接的生产力元素。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科学知识,常常是与农艺、手工艺技术相分离的;而近代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理论科学走在前面引导,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在中国,这种科学理论为生产服务的历程,应当说是发端于教会大学。科技教育走向社会,既能使初次尝试科技裨益的中国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从而抬高教会的地位,更大范围拉拢人心,又能直接培训一批掌握实践技能的知识分子,

^① 参见《协和校史》,第18页、第21页。

为他们在华的金融贸易、工矿企业服务。教会大学当局开展了推行科技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其原则贯彻到具体的教学和科研之中,成为中国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之一。尤其是在各校的农科、医科、工科和应用文科,这一特点更加显著。

金陵大学农学院长期推行“研究、推广与教学相辅并进”的办学方针,其宗旨在于“授予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的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它的最大特色即是将农业科技理论联系中国农业实际,注重推广。1922年上海各纱厂为建立棉花原料的可靠来源,曾联合要求并资助金陵大学农科推广植棉。为此,金陵大学开办了农业专修科、农业推广部,以满足这种需要。此外,金陵大学农学院还先后引进和培育了改良棉花“爱字棉”、“脱字棉”,改良小麦“金大26号”、“南宿州61号”,改良水稻“1386号”,改良玉米“南京金字皇”、“铭贤金字皇后”,以及改良蔬菜品种40余种,并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开设试验农场23处,分派学生参加良种推广、农场管理及技术工作。^①

协和医学院也很重视科技教育为社会服务。著名的协和三大科学宗旨之一,即是医学与卫生知识的传播。与此相适应,1921年,洛氏基金会聘请专家兰安生(John. B. Grant)来主持协和公共卫生教学;根据他的建议,1925年协和与北京市政府警察局订立协议,合办东城“内一区”的“第一卫生事务所”,为该区的50000人口进行卫生服务,并以各种形式详细负责地进行卫生教育和宣传,同时作为医学生和护士生的实验基地。“在这里,学生可以学到工厂卫生、妇幼卫生、环境卫生和传染病管理等知

^① 《金大农学院通讯》,复刊第3期,1947年。

识。”^①“卫生中心的存在推动了北京和其他地区公共健康和卫生活动的开展”，出现了警察机关督促居民清扫街区，居民就环卫工作提出建议，以及外地来信索要卫生工作经验等新鲜事情。^②事实表明，在这种“实验站”方式的带动和影响下，中国的局部地区已经开始萌生了某些细微的悄然的变化，这种变化如若健康地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的改变。

此外，还有沪江大学的“夜商学院”、“沪东公社”、“乡村服务社”，金陵女大的“乡村服务处”、“儿童服务实验所”，岭南大学的农业学院，东吴大学的法科，圣约翰大学的商科，文华大学的图书馆专业，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和社会学系，都为科技教育的社会化及推广作了大量的工作，给相对闭塞、落后的中国农村带去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中国广大地区落后、苦难的状况也启迪了青年学生的思索，不少人开始了立志报效祖国的思想升华，这是帝国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二）“中西文艺，兼蓄并输”。

在旧中国，与公立大学同步成长起来的教会大学构成了费正清所称的那种“外来影响的触角”；^③其中西杂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多少游离于中国政治之外而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又为“中西文艺，兼蓄并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东西文化经过长期激烈的冲突、碰撞，终于逐渐交融，蔚然成为教会大学一大办学特色。

燕京大学所呈现的“国际性”色彩是教会大学“中西文艺，兼

① 《话说老协和》，第170、172、174页。载《协和校史》第18页。

②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27. p. 265—266.

③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New York Harper and Row 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92页。

蓄并输”特点最鲜明的写照。

司徒雷登在创办燕京大学之初，曾亲拟要把它建成一所“国际性”学校的办学方针。^①他鲜明地指出“燕京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②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来自耶稣的两句格言“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这本是带有宗教色彩，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是一经与燕京大学的环境相结合，便成为师生们共同追求的理想之光，虽然“有些校友不承认他是基督徒但却承认校训是他的终生目标”。燕京大学的校园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其建筑外部一律采用中国古典风格，配以小桥流水、湖光塔影，使人置身于中国文化的浓厚情调中，而建筑内部则装置以最现代化的西方设备。用司徒雷登的话说，这种建筑本身就“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③燕京大学的教师来自英、美、法、德、加拿大、瑞典、日本等国家；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夏威夷、爪哇等地的华侨。尽管国籍、信仰不同，但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平等相处，形成了一种有凝聚力的校风，被司徒雷登誉为“燕大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活跃学生思想是有利的。

教会大学在中华民族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狭小环境，拥有一些国立大学所没有的特权，中国当局很难在这个小环境中正常发挥职能，如同埃德加·斯诺于30年代所描绘的燕京大学，“这里有点儿象一个小型的租界，警察被拒之门外。”^④一般来说，由于教会大学当局有意识地引进西方文化，使青年学生与西方思想乃至西方社会有着较多直接的接触，以至当时西

①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 73.

② John. L. Stuart. “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 9. 24.

④ 《胡佛研究所尼姆·威尔士文献指南》，第55页。

方有代表性的思潮在教会大学学生中都可以找到一定数量的追随者,燕京大学图书馆甚至保证学生可以借阅一些在其他地方列为禁书的典籍(如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学生的思想普遍比较活泼且有一定的自由度,既可以接触反动的东西,也可以接触进步的东西。这比较国立大学来说,教会大学的青年学生一方面更容易有机会接触外来的进步社会政治思潮,并从中受到先锋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经常地直接感受到外国势力在政治、宗教、种族偏见上的刺激,因而诱发出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投身革命洪流。特别是由于教会大会在旧中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享受治外法权和各种特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就戏剧性地成了进步活动的庇护伞。如赵荣声在《三十年代燕京大学中共党的活动》的回忆中所说的:

这时燕大学生会还没有和党取得联系,为什么他们劲头那么足,首先行动呢?这是因为:

①数年来党在燕京大学的影响依旧存在,马列主义思想继续传播,已经积蓄成一股不小的力量。

②党的反蒋抗日政策未变,目标清楚。

③党在白区所办的进步刊物,左翼文化运动,教育引导着这些学生。

④校外进步朋友其中有的是党员的影响。

⑤1935年夏秋之间,张申府、刘清扬、徐冰等借用军警不能进入的美国人办的学校,开会筹备组织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鼓励了燕大学生会的同学。

⑥曾任燕大新闻学系讲师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非常痛恨法西斯,反对日本侵华,常常向学生会负责人透露一些消息,例如日本如何得寸进尺,……国民党如何投降卖国,蓝衣社如何组成……

⑦……宋庆龄迅速回信，……叫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行动，不能再相信‘读书救国论’那一套。同学们果然行动起来了。^①

(三) 强调人格风范的培养。

欧美国家在华创办教会大学，深涵“为基督征服中国”的目的，这反映在它的校训上，首先提倡的便是基督文化的奉献精神，而不是中华民族素来放在首位的国家意识培养，但这奉献精神的倡导在客观上对中国青年学生养成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人格模式是有裨益的。

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定为“厚生”，这个词源自基督教《圣经》中“约翰一书”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话与耶稣所说的：“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意相近，其最终目的是“在世上建立上帝之国”。当时金陵女子大学用“厚生”作为校训，其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或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

岭南大学明确强调“施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② 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则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它所强调的“岭南精神”，原是拼合基督教的服务和友爱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和平等精神、革命的爱国精神及健身强国的体育精神四种优良传统而成。^③ 至于基督教精神，钟荣光校长曾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皆有牺牲服务之精神，

① 见《燕大文史资料》第5辑，第84页。

② 《私立岭南大学一览》，广州岭南大学编，民国21年3月出版，第21页。

③ 启天：《论岭南精神》，《岭南通讯》第六期。

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①岭南大学的校训是“今之学者为人”。所有这些,不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但都要求学生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这是奉献精神的最的体现。这种教育,固然在原则上不同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但却有利于人格风范和道德情操的培养,有利于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建立,是有利于学生成才的。

第二节 中国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涌现

一、一批批民族觉醒的先导者

教会大学的广大受教育者出生在中国历史正值末代王朝崩溃和共和国诞生的艰难时期。他们的一生经历着政治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尽管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和效忠思想仍然统治着大多数人的头脑,但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教会大学的世俗化发展,客观上引进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已经开始而且毫无退缩地拍击着旧中国古老的思想堤岸,给正在谋求着变革现实的中国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掌握西方科技文化,另一方面则深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蹂躏的痛苦,这些便内化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从而涌现了一大批为民族觉醒而奔走呼号的先导者和报效祖国的科学家。据燕京大学校友、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雷洁琼回忆:“燕京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自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开始,在历次学生运动中,燕

^① 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之计划》,广州岭南大学出版委员会,民国十七年五月第三版,第25页。

大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献身民族、民主运动,为我国革命事业、创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①而地处反动势力统治中心、宗教气息相对浓厚的金陵大学,同样“具有光荣的爱国民主传统”。^②仅就这两所教会大学的青年学生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发展中,摆脱了教会教育的樊篱,积极投入了革命洪流的情况来看,的确是令人深思的。

早在汇文书院时期,金陵大学青年便发起过南京的“拒俄运动”,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以卢生为领导,倡议“练习兵操,弄成军国民之体格,当时热切的响应者即有100多人,第二天的演讲大会,还在早晨便有50人左右到达会场”。^③

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5月9日,金陵大学学生便毅然冲破了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参加了国耻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了爱国示威大游行。当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金陵大学1914年毕业生陶行知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随后,金陵大学学生许哲又组织了南京中学生联合会,把运动的波澜推向更广阔、更深层的领域;5月28日和6月7日,金陵大学学生又两次罢课,上街向市民演说,陈昌盛等4名同学曾遭反动军警逮捕,虽遭残酷毒打,仍拒不屈服。^④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金陵大学学生立即发表通电,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并到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向工人宣传,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等活动,涌现了一大批先锋战士。“五四”后四个月,该校学生陈赓平、陈韶奏加入中国共青团,随

① 《(燕大文史资料)序》第三辑。

② 胡畏等,《金大师生的爱国民主传统》,载《金陵大学史料集》。

③ 参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301页。

④ 转引自胡畏等,《金大师生的爱国民主传统》,载《金陵大学史料集》。

后转为共产党员；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一部分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同学开始觉醒，转向左派。1926年，便有秦元邦、熊士杰两人以国民党左派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赴广州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出师北伐。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金陵大学建立了中共支部，1926年下半年先后加入党组织的有秦元邦、熊士杰、郑旺华、汤仁博、于铭之、杨德翘、方于清、杨济民、丁廷洧等人。^① 这批先行者很快成了“革命的火种”，在广大同学中积极传播着爱国救亡的真理。

这个时期的燕京大学，也从久蛰的沉闷气息中发出了一声怒吼，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燕京大学学生终于冲出了校园，参加全市高校示威大游行。在段祺瑞政府的屠刀下，23岁的魏士毅倒在血泊之中，成为燕京大学第一个为国殉难的烈士；她的牺牲，启迪了燕京大学许多热血青年的觉醒。

30年代初期的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同时涌现了很多觉悟青年。金陵大学的陈景星早期追随国民党，1929年初目睹国民党的日趋反动，一度陷入彷徨之中；7月底进入金陵大学后，很快为马列理论所吸引，参加了党的活动，不断接受党的教育，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社会上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② 他积极开展活动，引导了一大批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0年8月，陈景星被捕，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和他同步成长的石璞，还在15岁时就曾愤然地说：“只有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中国才能得救，别无他路可走。”他1929年底加入共青团，表示“在南京，不

^① 转引自胡畏等，《金大师的爱国民主传统》，载《金陵大学史料集》。

^② 姜伟，《陈景星烈士事迹（1908—1930）》，《金陵大学史料集》。

准备杀头,就不要加入共产党,我是对着敌人的枪口加入共青团的。”不久,石璞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9月4日,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17岁的年轻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①

这个时期,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张牙舞爪,燕京大学学生很快投入到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2年春,毕仲文、张印堂、杨缤等组成了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在先后担任书记的毕仲文、杨刚、董文田、李苻昌、张同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积极的活动,涌现了象杨刚、张兆麟(燕大学生会主席)、王汝梅(黄华、执行主席)、陈翰伯、龚维航、张淑义(“河北学联”主席)、陈洁(学联党团书记)、虞悦、赵志萱……等杰出的先驱战士。据统计,从1933年9月到1937年7月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参加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的党员有牛文颖、张淑义等46人,按1935年秋季燕京大学注册课发表的学生总数(为历年最高峰)的880人计算,这46名党员占全校学生总数的5%强。^② 先驱者擂响的鼓点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教会大学部分学生和广大中国人民沉睡的意志,“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此刻的金陵大学也到处印着先驱者奔波的足迹。还在1931年11月,金陵大学热血青年便组织了51个队上街募捐,支援马占山将军东北抗日。农学院三年级学生王玉培,歃血宣誓,加入“上海青年援马团”,北上抗日。^③ 而祁式潜、胡笃弘、胡笃冲、李庚等觉悟青年则在自身迅速成长的同时,带动着周围同学的进步。他们先后成立了南京秘密

① 《石璞烈士事迹》,《金陵大学史料集》。

② 赵笑声:《三十年代燕京大学中共党的活动》,《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

③ 《金陵大学沿革》,《金陵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册》。

学联和“体群社”，组织对中国农村建设问题、青年前途问题、恋爱问题、人生观问题的讨论，开展抗日救国问题的座谈，把更多的同学团结在自己身边，以至于当时只有 500 多名学生的金陵大学，参加秘密学联的就有 30 余人，^① 参加“体群社”的社员就有 60 余人。^② 不久，祁式潜、李庚、胡笃弘等同学加入中共党组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启迪广大同学对现实的思考。1934 年，日本领事馆建造旗杆与金陵大学北大楼等高，广大师生目睹太阳旗高挂在中国土地上，十分气愤。郑槐，宋恕等 30 余人发起了“速树旗杆”倡议，全校师生一致响应，踊跃捐助。1935 年 10 月建成高出日领事馆旗杆 10 尺的钢管旗杆，南京人民扬眉吐气。^③

1937 年抗战爆发后，青年学生很快进入了抗日救亡的角色，涌现了一些为民族存亡积极奔走的呐喊者。燕京大学学生阎述诗揉和国破家亡的愤慨谱出名曲《五月的鲜花》，响彻在每一寸救亡的土地上；杨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写出一系列“匕首投枪”似新闻作品；黄琪等革命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解放区，把年轻的热血洒在革命的土地上。金陵大学学生杨畏云、罗光斌成为“五大战时服务团”歌咏队的骨干；汤克淞担任成都学生抗战宣传团第三团负责人；王煜等积极组织成都青年民主协会，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团结在党的周围，成为党在成都学生工作的得力助手。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普遍反对，金陵大学进步青年先后在成都、南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1946 年 3 月，在学生党员王璵的领导下，中共成

① 《金大师生爱国革命传统略记》，《金陵大学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35 页。

② 胡畏等：《金大师生的爱国民主传统》，《金陵大学史料集》。

③ 参见《金陵大学史料集》。

都工委成立,把“民协”的工作转向深入具体地做群众工作,以唤醒民众意识。7月,统一的金陵大学中共党支部诞生,首任书记李元升,支委华擎甫、张一诚,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先后培养了舒泽湘(学生会理事长)、肖能昭(监事长)、李夜光(学习部长)、嵇才华(女生部长)、相重阳(福利部长)、刘德华(康乐部长)等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到解放前夕,金陵大学支部已有30名党员。^①燕京大学学生则积极起来成立了自治会,其中不少同学异常活跃,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推动了更广大的同学投入到民族解放的大潮。^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的广大热血青年很快投入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

历史的事实证明,在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弥漫着宗教气息的角落里,广大青年学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家深重的灾难中觉醒,成为民族觉醒的先导者,他们的流血牺牲和忘我奋斗,唤醒了其他同学和周围群众沉睡的意志,奋起投身到民族、民主解放的洪流。先驱者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发扬。

二、大量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

伴随着广大民族觉醒先导者同时出现的,是教会大学大批专家学者、建设人才的逐步成长。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先后培养了众多的农学家、医学家、林学家……,这批新式知识分子无论是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哲学观点上,都同旧式文人、士大夫大相径庭,他们是促使封建教育制度崩溃的动力之一,是中国

^① 胡畏等:《金大师生的爱国民主传统》,《金陵大学史料集》。

^② 赫鲁:《暗夜闪光的旗帜》,《燕大文史资料》第2辑,第228页。

过去和现在走向世界、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社会积极因素和带头人。

金陵大学从 1888 年到 1952 年夏季院系调整前夕为止,学生人数总计 11196 人,其中毕业生共计 4475 人,包括本科生 3170 人,专科生 1206 人,研究生 79 人,医预科生 20 人;此外还有修业生(肄业生)共计 6721 人,其中本科生 5981 人,专科生 632 人,研究生 67 人;商科及医预科 41 人。^① 1948 年,金陵大学达到全盛状况的时期,全校分文理农三院、22 个系、4 个专修科、7 个科学研究机构,在校学生已有 1100 多人。^② 绝大多数学生热爱祖国,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其中涌现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和建设人才。

该校农学院自 1914 年开设到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的 38 年间,先后开设九个系、一个研究所和一个专修科,历届毕业生及在校学生计有研究生 50 余人、本科生 1400 余人、专科生近 1000 人、函授班及培训班结业生 600 余人,总数约计 3000 人。^③ 其中许多人成了知名学者、科学家,如“百万花棉”培育者,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亚洲暨远东区办事处顾问的章之汶教授;对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建立贡献卓越的孙文郁教授;在农业上第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粮食作物的王绶教授;我国植物病学、真菌分类学和植物病毒学早期开拓者之一的魏景超博士;早期著名棉花栽培育种专家、奠定我国棉花研究基础理论的郝钦铭教授;第一个赴美学烟草栽培得硕士学位后,又学农业经济得博士学位的唐启宇教授;荣获中国农学会“从事农业科研五十周年表彰奖”和中国科学院“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周年荣誉奖”的戴松恩博

① 戴邦塞:《1888—1952 年母校学生人数》,《金大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130 页。

② 《金陵大学史料集前言》,第 1 页。

③ 《农学院简史》,《金大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51 页。

士；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博士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在台湾或国外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知名科学家，如张德慈教授、路家声教授等，也都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农学家传》一书，所列出的58名农学家中，有18名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占总人数的32.2%。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的业绩由此可见一斑。^①

该院理学院自1888年至1952年间共计毕业生1074人，其中本科生887人、专科生152人、研究生15人、医预科生20人；此外还有修业生2039人，其中本科生1835人、专科生166人、医预科生24人、研究生14人，^②涌现了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如南京大学第一位学部委员，受到世界知名学者李约瑟高度赞扬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方训博士；在荷尔蒙研究上有重大突破的李卓皓教授；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领导者、中国近代生物化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应睐教授等等。据统计，现在尚在上海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的金陵大学电机系毕业生还有20人。^③

该校文学院从1888年到1952年间共计毕业生1173人、修业生1986人，是金陵大学自创办以来持续招生、毕业人数最多的学院，^④为祖国社会科学研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有出任教会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主持金陵大学校政几十年之久的著名教育家陈裕光教授；有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建设、蜚声海内外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博士等。以1937年到1945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英语系仅毕业的7名学生来考察，个个成才，吴德耀、杨树勋获得博士学位；喻德基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

①②④ 戴邦寒：《1888—1952年母校学生人数》，《金大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30页。

③ 《电机系校友在上海》，《金大一百周年纪念册》。

院代理院长；李铸晋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张志公现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北京语言学会会长；危亚楼现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由此可见，金陵大学文学院学生的成才率是相当高的。

燕京大学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社会科学家，如一生著述近 300 万字的历史学家齐思和教授、聂崇歧教授；蒙元史、民族史学术权威翁独健教授等；著名的社会学家有：40 年代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柯象峰教授，被授予“哥伦比亚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章的吴文藻教授、费孝通教授、林耀华教授等；突出的文学家有谢冰心、凌叔华、许地山、吴世昌等；杰出的新闻战士有萧乾、新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事业奠基者之一的陈龙、现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等；此外，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心理学家茅于燕教授等也都是学有专长的杰出社科人才……

应该提到的是，燕京大学除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之外，还培养了一些著名的医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如获得第 29 次南丁格尔奖章的第一位中国护士护理专家王琇璞副教授、当代名医吴阶平教授、我国神经外科的创始人赵以成博士、1986 年 7 月 8 日获“马太依国际奖”并被誉称为“中国石油化工巨擘”的侯祥麟博士，还有协和医学院院长方圻教授等。

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仅是欧美教会在中国所办 14 所名牌教会大学中的两所，从中涌现的民族先锋战士和优秀人才就如此之多。由此，教会大学在中国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是不难推测的，他们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祖国的一笔丰富财富。

三、两个典型人物的个案考察

(一)从严格宗教环境中走出来的叛逆者

——陶行知早期思想的形成

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的陶行知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教育家。在他1946年7月去世时，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题词。在国外，陶行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改革家之一”。^①他“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②在教会学校出身的近代知识分子中，陶行知的学生生涯比较具有典型意义。除了幼年所受的中国式的启蒙教育外，陶行知受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完成的。从典型基督教教义的环境中熏陶发展成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摆脱樊篱、升华成长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在教会大学里成长的过程。

陶行知早年生活的所在地——徽州，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之乡，曾涌现了如朱熹、江慎修、戴震等大思想家和大学者，以“徽州学派”闻名于世。自孩提时候起，陶行知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尤其是深受尊奉理性、注重经世的“徽州文化”的影响。1907年秋，当他回答谁是他最推崇的诗人时，他选择了“白杜”。在他看来，风格迥异的白居易和杜甫，“诗虽不同，但多为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白诗通俗、杜诗沉郁，感染力非常强。”^③他在宿舍的墙上写下了一句格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

① 克拉伦斯·林顿：《发展中国的教育模式——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序言》。

② 华莱士：《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伟大的教育家》。

③ [日]牧野笃：《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

作出一些贡献。”^①这已经多少显露出了一些中华民族面向人民大众的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的痕迹,而这种思想意识最清晰的显露则在以后他所创作的许多大众诗和毕生为之奋斗的“乡村教育”事业中。1908年,陶行知考入杭州医学堂,志在走医学服务民众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很快粉碎了他的少年梦想。杭州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对非基督徒的歧视性使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表示绝不能选择划十字的道路,三天之后便毅然退学,流落苏州。^②

生活的磨难给了陶行知深入了解人民大众生活的机会,从而升华了他童少年时候仅仅囿于思想意识的大众倾向和“中国人为中国作贡献”的使命感。有的文章曾这样记述到,实际生活“逐步丰富和形成了他的‘爱民、亲民、为民、救民’”的思想。^③亲民,即亲近人民,而所谓亲近人民则意味着教化人民而不是压迫人民,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体察民情。这种“亲民”观念的形成为其以后“爱满天下”精神的倡导铺垫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1909年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在校时期,他进一步涉猎了中国古代典籍,对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朱熹、王阳明、吕东莱等人的著作和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中王阳明的学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1911年开始钻研王学,把王学强调心力,突出自我,主张百折不回锐意进取的坚强意志,以及注重“知”、“行”统一的思想内核,作为自身道德修养所需的精神工具,从此找到了自己日后立身行事的指南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他甚至将名字先后改为“陶知行”和“陶行知”。他的毕业

① 歙县的安徽陶行知纪念馆馆长程仁浩确认这一草书是陶的手迹。

② 李楚材:《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种种》,《行知研究》第9期,1983年10月。

③ 《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选辑(1891—1981)》。

论文《共和精义》也是根据王阳明的“传习录”而写出的理解之作。^①

值得指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内蕴在陶行知的生活方式上有着十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在教会学校的学习,还是在美国攻读,还是作为留洋学生返回中国,陶行知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民族风貌,他曾一再声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竭力不留下些许西化的印记。1923年10月,他给妹妹文汉的信函,便是一个明显的写照,信中他说: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印棉裤套,一顶西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它完全是中国人了,觉得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几十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我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②

陶行知是1909年进入金大的。当时民族、民主革命澎湃的浪潮,已经引起了青年陶行知的深刻思索,他很快走上了急中国社会之所需、探索西方思想的艰苦历程。三年期间,他大量阅读了近代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政治学等著作,仔细探究孟德斯鸠、培根、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林肯、罗斯福等人的政治思想,期望获得一些有益于中国社会共和理想实现的启迪。他从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清醒的理性精神出发,有选择地吸收了一些有益的思想,形成了自己把西方思想中国化、特点鲜明的政治理想

^① 转引自[日]牧野笃,《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载《陶行知研究在海外》,第131页。

^② 《知行书信》,第25页。

和人生价值观。

首先,他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剔除了斯宾塞、达尔文主义的某些思想,深层次地吸收了达尔文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精神内核,坚信进化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天演”的必然结果。没有进化,便没有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他以进化论的观点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因循守旧的劣根性,提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时代课题,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基点出发,向广大人民敲响了自强保种的警钟。当时,他在《金陵光》上发表的10余篇文章,便大多阐述了这个思想,从而为他早期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

其次,在1914年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所表露出来的政治思想和人生价值观念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梭及其后继者的学说对陶行知的影响。文章把共和政治的根本精神归纳为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信条,并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予以“正名”界说,同时弘扬个人价值,指出“民苟愚劣,社会绝不能兴盛,社会欲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强调要“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机会”。上述观点体现了陶行知对“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论”、“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吸收和内化。

需要指出的是,陶行知这种对共和理想的“正名”界说,正折射着民国初年大起大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是对当时那些因求共和未得而失去信心的同道们的热情鼓励,而其对于个人价值的张扬,却抖露着他对以压抑人性为能事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批评。基于中华民族的斗争实践,有针对性地吸收、接纳、宣扬西方思想,这无疑是陶行知思想形成的一大特点。

最后,作为西方思想的一部分,基督教教义在陶行知的早期思想奠基中有着重大影响,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排拒与接纳,也正体现着陶行知基于中国化目的而接受西方思想的鲜明特点。基督教教义某些实质性内容(如救世、平等、博爱)和耶稣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勇于为自己的信仰和主义殉道的精神(基督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与陶行知产生了共鸣,因而也为他所接纳。而在另一方面,他则是毫不犹豫地拒斥了基督教教义中主张忍受、顺从、安分、等待的消极因素,坚决地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甚至亲身投入到武装起义中去,终于成为“一手筑起爱的丰碑,一手高擎憎的大纛”^①而奋进的先锋战士。

1905年陶行知入崇一中学堂的时候,中国教育史上正迎来了一个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期;经过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屈辱的失败,清政府迫于加强和维持统治的需要,改变了培养人材的策略,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开始谋求西方科学技术教育。在这一制度改革过程中,包括革命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逐步开始了从变法到革命方向的转变。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一步加深和全国各地救亡图存运动的风起云涌,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2000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陶行知作为一名政治热情很高、对民主政体给予极大关注的青年学生,自然也就没有囿于金陵大学反复灌输的基督教教义,而是迅速地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和民主运动的冲击,除勤奋学习外,踊跃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他发起组织了各种爱国演讲会、展览会、运动会,举办爱国募捐等活动,一旦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赶回家乡参加了余德民领导的屯溪阳湖余家庄起义,亲身参与了群众反清的武装斗争。他担任县议会秘书,直到

^① 许宗光:《陶行知》,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次年才返回金陵大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又先后建立了若干爱国主义者协会,倡办《金陵光》学报,任中文主笔,在上面发表 12 篇论文和 2 篇译作,宣传共和思想,揭示国民劣根性,抨击社会腐败现象。1912 年 2 月,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推行反共和的路线,陶行知目睹如此历史演变事实,深感伤心失望。他说:“爆竹声喧,桃花颂献,旗悬五色,乐奏八音。此非吾校庆祝民国三年元旦之盛景乎?我之好祥,奚不如人?然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逢故曰欲致吉利语,而噤嚅不能启口。视此国家,对兹社会,皆哀有余,而乐不足。”^①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开始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进行剖析,探索重建共和的路线。1914 年,陶行知撰写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便是这一探究的总结。他的文章批评和鼓励了那些因求共和未得而失去信心的同道,表明了自己更坚定的理想,决心走向革命化的道路。

由上可以看到,作为金陵大学首届毕业生的陶行知,他所以在以后成长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杰出战士,是同他在歙县崇一学堂、杭州广济医学堂和南京金陵大学这三所教会学校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在金陵大学的 3 年(1911—1914 年)大学教育密切相关的。陶行知在进入金陵大学以后,正是在这个俨然西方列强的“文化租界”的特殊环境中,在这个政治上相对民主、思想上相对自由、文化上相对开放的环境中,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形势下,从爱国救亡的基点出发,比较迅速地在思想政治和人生价值观念两方面奠基,迈入了新的人生境界。其主要标志是:一、在哲学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新型的世界观;二、政治思想上,热烈向往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极度憎厌民主共和之敌;三、价值观念上,强调民

^① 陶行知:《民国三年之希望》,《金陵光》第 4 卷,第 8 期,第 2 页,1914 年 1 月。

本和个性,批评国民劣根性,认定国民的改造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即是说,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进一步拓宽了视野,振奋了精神,最初确立了自己今后服务社会的方向,基本铸造了自己的道德风范和人生信仰。

从热血青年到革命战士

——黄琪烈士在燕京大学的成长历程

黄琪烈士原名黄辉容,生于1925年5月11日,在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4,原籍四川新繁(今四川新都县一个镇,在成都附近),后迁居北京。其父是京绥铁路工程师,母亲也是一位具有高中文化的知识妇女。抗战以前家庭生活和谐、安宁。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全面侵华,10月北平沦陷。黄琪的家庭和广大北平人民一样都被践踏在侵略者铁蹄之下;由于物价飞涨,单靠父亲工资维持的全家生计艰难。1942年,黄琪年仅14岁的六弟黄辉宏,因患胸膜炎无钱治疗而至夭折;1944年五弟黄辉寰又被迫过继给新繁一位叔祖母为孙,姐弟从此远隔天涯。国家的苦难和家庭的不幸遭遇,常使黄琪痛不欲生,尤其是目睹了沦陷区广大人民苦苦挣扎而无力摆脱的亡国奴生活,黄琪逐渐觉悟,她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痛苦的现实”?这时她阅读了一些能够找着的进步书籍,对高尔基的《母亲》、《海燕》以及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作品爱不释手,感觉到了书中隐隐透现的几丝光明,思想渐渐地转向进步,时刻梦想着到南方参加前线的抗日战争,她曾经在诗中流露“我愿翼生双翅啊,早日回到南方”。

1944年暑假,黄琪考入了成都燕京大学外语系,而这时的燕京大学已成为成都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各种社团活动非常活跃,民族、民主意识高涨,无异于一座革命的熔炉。内心深处早已潜植下革命种子的黄琪,一踏入燕京大学便很快投身于时

代的潮流，迅速成长起来。

燕京大学有一种叫“团契”的学生组织，受 30 年代在英国兴起的牛津团契运动的影响很大，它把基督信仰生活化，不注重教义理论，更不墨守基督教仪式，把基督教教义概括为几条生活准则和一些生活方式，主张身体力行；参加者互称契友，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同时也为青年男女学生提供交际、活动的场合和机会，增进个人品德修养，丰富学校生活的内容。“团契”运动是 1924 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欧美教会变相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一种新方式。但是，深重的民族灾难使燕京大学青年很快摆脱了团契的宗教束缚。成都时期的燕京大学，团契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多数团契的宗教色彩愈来愈淡薄，而民主、自由的政治气氛日渐浓厚，广大青年通过团契活动，传阅进步书刊，探讨国事和各种社会问题。1944 年底，黄琪参加了当时较有声望的“启明”团契，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她经常利用星期日到成都郊区金牛坎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生活。不久，她被吸收为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秘密组织“民协”，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1944 年 11 月 11 日成都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大游行，反抗国民党政府对成都市市立中学学生运动的武装镇压，最后迫使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和四川省警察局长“引咎辞职”。这件事，给了黄琪很大的信心和鼓舞，她更加认识到了民主的潜在力量。1945 年 2 月，国民党抓捕的以补充兵源的农民壮丁遭到当局的残酷虐待，黄琪所在的“民协”掀起了募捐慰问壮丁的高潮。看到壮丁们遭受毒打的累累伤痕，目睹饥寒交迫的壮丁拿着同学们送的烧饼含恨死去……，黄琪逐步地看清了国民党的狰狞面目，开始思索、探求：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她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

1945 年 5 月 4 日，“民协”组织了成都市各大学的学生举行营火晚会，纪念“五四”运动 26 周年，黄琪等同学演出了活报剧

《放下你的鞭子》，把晚会的救国、民主气氛推向了高潮，晚会后又举行了火炬游行，黄琪一直坚决地走到队伍前列，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发扬‘五四’精神”的口号。

这时，黄琪还参加了燕京大学的海燕剧团，先后演出了曹禺的《日出》，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宋之的的《刑》，吴祖光的《少年游》，夏衍的《芳草天涯》和陈白尘的《岁寒图》，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1946年6月初，燕京大学“民协”宣布了“党号召国统区知识青年到中原解放区，迎接抗战胜利”的消息。尽管舍不得年邁的父母和亲切的兄弟姐妹，但祖国的召唤和对党的忠诚信念在黄琪心中激起了更大的波澜。7月，黄琪和几位同学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完成了自己从一个热血青年到革命战士的升华。1947年1月22日，黄琪壮烈牺牲在革命的土地上，是鄂西北游击区作战来第一个英勇献身的女青年战士，年仅22岁。

黄琪烈士成长的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广大热血青年对救国救民真理的苦苦思考与探索。黄琪在成都求学的这两个年头，正是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之时，和其他同学一样，黄琪除了勤奋学习，还踊跃投身于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没有把自己隔离于民族危亡、国家破碎的痛苦现实之外，毫无疑问，这与当时成都燕京大学如火如荼的革命思潮的兴起不无联系。正是黄琪烈士这样小小的浪花构成了燕京大学民族民主洪流的涌动。黄琪烈士终于在这民族、民主的时代大潮中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升华，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附录 1] 21 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①

辅仁大学

1912年,中国天主教爱国教徒马相伯、英敛之向罗马教廷建议创办学校,后因欧战停顿。1919年起正式进行筹备,1925年夏开始招生,定名“辅仁社”,1926年正式取名为辅仁大学,校址在北京定阜大街一号(即原涛贝勒府)。初办文科,1929年9月添设理学院及教育学院,并附设医学先修科及美术专修科。1932年,原辅仁之“本笃会”因经济关系不能继续支持,改由天主教“圣言会”接办。1937年6月开办文理两研究所。1938年9月始招收文科女生。1946年秋增设农学院。1949年6月农学院及美术、家政、人类3系停办。人民政府接办前共设文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3院12系。

1950年暑假,天主教“圣言会”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以补助经费为要挟,侵犯中国人民的教育主权,辅仁大学师生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0年10月12日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接办辅仁大学,这是我国人民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该校除哲学、经济、社会3系和西语系部分师生分别并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外,其他都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名遂取消,在原校址基础上建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

^① 这个附录参考了原教育部高教一司苏温昌整理的《二十一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

燕京大学

成立于 1916 年，由美国的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和英国的伦敦会等 5 个基督教差会所合办。它是由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及北京的一所神学院合并组成的。校址先设在北京盔甲厂汇文大学内，女校部在灯市口，到 1926 年始全部搬到北京西郊海甸新址。司徒雷登是于 1919 年 1 月 31 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的。

学校成立之初未分设学系，仅设文理科。课程初为本科 2 年，预科 2 年，后改为本科 4 年、预科 1 年，并逐渐分为 3 个学院——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不久，自然科学院改为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1932 年秋停办宗教学系及体育学系，1934 年停办地理及地质学系，改欧洲语及英文两系为西洋语文系，并停办法律学系。

解放后，于 1950 年改理学院为理工学院，添设机械、化工、土木 3 系。

1951 年 2 月 12 日，人民政府正式接收燕京大学，改为公立大学。

1952 年院系调整中，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校名取消，校舍、校产归北京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1906 年，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圣公会及伦敦医学会在京合办协和医学校，校址在东单三条 5 号。1915 年，罗氏驻华医社（后改为中华医学促进会）接办，将校名改为协和医科大学，1929 年定名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1941 年因日军侵入而停办，所有建筑及设备由日军改作陆军医院及

血清研究所。1947年始复校。

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外国津贴,解放前每年由中华医学促进会补贴60万美元,占全年经费支出的85%以上。由于经费充足,该校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远东第一个设备完善的医学教育机构。

1951年1月20日,该校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接办,改为公立大学,同年4月,改名为中国协和医学院。自1952年起该校划归军委卫生部领导。1957年学校停办,与中央卫生实验院合并,组成中国医学科学院。1959年又在此基础上恢复并重建中国医科大学。

津沽大学

1920年,天主教耶稣会发起在天津成立天主教高等学校,1921年始筹备,1922年9月15日开学,校址在天津六区马场道141号。始设预科,1925年分工商两科,1933年定名为私立天津工商学院。1937年工科分土木工程及建筑工程两系,商科分会计财政及国际贸易两系;1943年添设文学院,分国文系及西语系,1945年秋添设史地学系及家政学系,1946年秋添设机械工程及工商管理两系。1948年10月改名为私立津沽大学。

学校经费一半来自外国津贴,一半靠学杂费收入。

1951年6月,天津市教育局为培养中学师资,就津沽大学文学院现有基础扩大筹设师范学院;为节省人力物力,又将天津土木工程学校并入津沽大学工学院,代办土木工程专修科。同时,天津私立达仁商学院并入津沽大学。

1951年9月学校改为私立大学,校名仍称津沽大学,于9月25日正式由政府接收。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该校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各系并入南开大学,原天津教师学院并入津

沽大学师范学院,在原津沽大学校址基础上改建为天津师范学院,1958年改名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更名为河北大学。

铭贤学院

1907年,美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成立了一个“铭贤”社,“纪念”在我国义和团运动中死在山西汾阳、太谷等地的传教士(系该学院毕业生)。1909年,孔祥熙自欧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受“铭贤”社之委托,先在太谷创办“铭贤”小学,同年又增设中学班次,1915年方增设大学预科,1922年又复停办,至1929年乃又创办农工二科;“七七”事变后曾经山西运城及河南、陕西等地最后迁至四川,至1940年始办3年制专科,1943年改为4年制独立学院。四川解放后,于1950年秋,正式迁回山西,设有农、工、商3个学院,共分农艺、畜牧、机械、纺织、工商管理等5系。

解放前该校的董事会受欧柏林大学铭贤社控制,董事长系孔祥熙兼任。铭贤社每3年派1至3人到该校工作,起支配监督作用。学校基金有75万美元,始终存放在美国银行,年息35000美元,每年由铭贤社转经北京公理会分四期寄来。学校经费主要来源于此。

解放后,自1951年1月起经费由山西省人民政府拨给,1951年10月正式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时,工商管理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纺织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并入山西大学工学院(现太原工学院),农学、畜牧两系保留并加以扩充,改名为山西农学院、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圣约翰大学

原名约翰书院,是美国圣公会于1877年在上海极司非而路(后称梵皇渡路)开始筹建的。在合并了圣公会1865年设立的培

雅书院和 1866 年设立的度恩书院之后,于 1879 年 9 月正式开学。1890 年开始设置大学课程,仅有大学生 2 名,至 1895 年有大学生 6 名,1899 年才有大学生 27 名。1905 年正式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区注册立案。1906 年始设置文、理、医、神 4 个学院。1927 年,除医、神两院外,全部停办,在校外租屋授课,曾改名为丁卯学社,1928 年又在原址复校。

学校常年经费约为 70 万美元,其中学生缴纳的学费收入约 10 万美元,占 15% 左右,其余均由美国圣公会负责。

解放初,学校共分 4 院 13 系,即文学院:中文、外文、历史、教育、政治、经济、新闻 7 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4 系;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 2 系;医学院,不分系。全校以医学院及外文系较著名。

在 1952 年院系调整中,文学院外文、新闻 2 系并入复旦大学,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4 系及教育系调至华东师大,政治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经济系调至上海财经学院,土木、建筑两系并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调至上海第二医学院。校址归华东政法学院。

沪江大学

始创于 1906 年。先由美国南浸礼会宣教会传道士万应远和美国北浸礼会宣教会传道士柏高德向美国南北浸礼会筹募基金 12 万美元,于杨树浦军工路购地 165 亩兴建校舍,定名为上海浸会大学,由柏高德任校长,另设一神学院,由万应远任院长。1911 年,美国南北浸礼会另派传道士魏馥兰来中国主持校政,将大学和神学院合并。1915 年,改称为沪江大学。1920 年实行男女同校。1927 年神学院分立。日军侵占上海郊区后,校本部为日军所占,学校遂于 1941 年停办。之后,由同学会出面,一面在

沪办“沪江书院”，一面在渝办“商学院”。1948年在原址复校。

学校经费来源主要靠收学费，占总收入的85%左右，其他由美国教会补贴。

解放初学校共设文、理、商3个学院，文学院有中文、外文、教育、政治、音乐等系，理学院有生物、化学、物理等系，商学院有工商管理、会计、银行、国际贸易等系。全校以商学院规模较大，化学系办得较好。

1951年2月14日由政府接办，改为私办公助。在院系调整中，理学院物理（除电讯组）、生物、化学3系及文学院和法学院中文、外文、社会3系调至复旦大学，物理系电讯组调至上海交通大学，教育系调至华东师大，政治系并入华东政法学院，财经学院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4系调至上海财经学院。校址现为上海机械学院校舍。

震旦大学

1903年，爱国天主教徒马相伯出资在上海徐家汇旧天文台原址开办了震旦学院，首届学生共20名。由于马相伯在校内从事革新政治运动，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遭到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反对。1904年耶稣会调法国传教士南从周到校任总教习。1905年春，南从周乘马相伯病假期间，独揽大权，压制学生，激起学潮。马相伯不得已而辞职，并率全体学生退学另建新校，在徐家汇李公祠内创办了复旦公学（即今复旦大学前身），聘请中国籍人士为教师，一切行政由中国籍人士管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震旦学院于是由法国传教士自行招生开课，改由天主教耶稣会办理，1908年迁入当时的法租界新院址（即今重庆南路280号），南从周任院长。学校开办时仅设预科和法政文学科，预科3年，正科3年，规模尚小。只招男学生。自迁到

法租界后即添设医科,并以广慈医院为专门实习医院。不久又增设工程科。到1932年始改称为震旦大学。1935年设立法学院,医学院和工学院,规定法科,工科修业年限为4年,医科修业年限为6年。学校在罗马注册,受教皇的传信部控制。

学校经费来源有三个方面:学生缴费占50%,教会补贴占30%,校产及其他收入占20%。解放初该校设工、医、文、法4个学院。工学院有土木、化工、电机3系;医学院不分系,附设牙医专修科;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法学院设法律、经济2系。学校以医学院办得较优。

1951年2月15日,华东教育部正式宣布处理震旦大学,改由中国人民自己办理但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以补助。同年8月,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并增设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4个夜专修科及托儿专修科。1952年2月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并入。在院系调整中,该校中文、外文、经济、化学(包括家政系营养组)4系调整至复旦大学,教育系调至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土木系调至同济大学,电机系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调至华东化工学院,托儿专修科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医学院调至上海第二医学院,校址归上海第二医学院。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1937年由天主教圣心会创办,校址在上海长乐路139号,校舍系圣心修道院筹款建筑,地产系圣心修道院自上海天主堂拨用土地之一部分。该校与震旦大学并非同一教会所办,为便于在中国立足,在国民党时期名义上与震旦大学合而为一,行政上与经济上完全不相关。因此,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9月即改为独立学院。

学校经费来源,学生缴费占70%,教会补助占30%。

全校分、文理两学院，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教育系、经济系、社会系；理学院有化学系、家政学系。学校设备比较简陋。

1951年2月23日，华东教育部接办了该校，改为私办公助。同年8月，与震旦大学合并，原校名遂取消。原校址的一部分现为向明中学所用，一部分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院所用。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文、理两学院的前身是广文学堂，校址在山东潍县。广文学堂是1903年由文会馆与青州英国浸礼会库寿龄所办之广德书院大学班合并而成的。文会馆原址在登州，前身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登州开设的蒙养学堂（系教会小学）；于1873年始有中学课程，1876年正式改名为文会馆，教授学生物理、化学、天文、数学等科。

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济南共和医道学堂。1881年美国长老会在济南设立医学堂，当时英国浸礼会也在青州开办医学堂，1906年2校在济南合并，改名为共和医道学堂，同年北京协和医学校一部分学生资送来济，嗣后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堂亦并入济南共和医道学堂。

1917年青州之神道学堂、潍县之广文学堂先后迁济南，与共和医道学堂合并，易名为齐鲁大学，分为文、理、医、神4科。1929年神科脱离该校。1937年起，因日军侵华，学校停办，次年秋在四川成都复课，1946年秋全校迁回济南。1948年文理学院迁往杭州、医学院迁福州，1949年华东、华南全部解放，杭州之文理学院、福州之医学院，均先后返校。

学校经费主要依靠美国教会津贴，占总收入半数有余。

该校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历史地理系、经济系；理学院有

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天文数学系、药学系及农业专修科，并有试验农场，医学院不分系，附设护士专修科、医事检验专修科。学校设备在国内的大学中是较为完备的，医科有相当基础。

1951年4月21日政府正式接办该校，改为私办公助。同年8月，文学院中文、历史两系合并于山东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天文数学系调至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3系调至山东师范学院，药学系调至华东药学院，经济系调至山东财经学院，农业专修科调至山东农学院，医学院医本科、药专科调至山东医学院。山东医学院址迁入齐鲁大学原址。

东吴大学

1901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就苏沪两地之存养书院、博习书院及中西书院大学院合并组成东吴大学，当即向美国田纳西州政府立案，校址为苏州博习书院旧址。中西书院是美国纽约监理公会总布道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81年在上海兴办的，1882年设立大学院，后迁到苏州办理，即成为东吴大学的一部分。1915年监理会又在上海东吴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设立一所法科学校，称为东吴大学法科，1927年改称东吴大学法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独立单位，它是美国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唯一的法科学校，目的是培养实施领事裁判权的人才。苏州东吴大学校本部是文理学院，设有物理系、化学系（附药学专业）、化工系、生物系（附医预专业）、中国语文系、英文系、社会系、经济系、政治系等9个系。

学校学杂费收入占总收入的60%左右。

解放后，东吴大学校本部原设的政治系停办，社会系于1950年调到复旦大学。1951年1月起，学校改为私办公助，由政府接办。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化工系调至华东化工学院，经济

系调至上海财经学院、化学系的药学专业调至南京药学院,生物系的医预专业调至上海第一医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调至华东政法学院,留下的物理、化学、生物、中国语文、英文等系与江南大学的数学系、苏南文教学院的教育系、艺术系于10月11日正式合并,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校址在东吴大学旧址。

金陵大学

该校前身是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汇文书院是美以美会于1888年在南京创立的,宏育书院是由益智书院(1894年由美北长老会创办)和基督书院(1891年由基督会创办)于1907年合并而成的。1909年宏育、汇文两书院合并改称为金陵大学。

学校初设文科,1914年起增设农林科,1921年改文科为文理科,1930年调整院系设文、理、农3学院,1937年因抗战西迁四川成都,1946年迁回南京原址(天津路2号)。

该校经费大部分系美国津贴,占80%。

解放初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分设政治学组)、教育学系、哲学系、社会福利行政学系等8系及国文专修科1科;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化学工程系、电机工程学系等6系及电影播音专修科1科;农学院设农业经济学系、农艺学系、植物病虫害学系(分植物、昆虫两组)、农业教育学系、蚕桑学系等9系及农业专修科1科,附设农业试验及农业推广部。

1951年1月起政府决定将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并成立了两校合并筹备委员会。1951年9月19日举行了两校合并改为公立庆祝大会,宣告公立金陵大学成立。同时,决定停办哲学系、地理学系、蚕桑学系及医学先修科等;体育系、教育系、外文系、社会系、历史系、电影播音专修科、农业工程系等

暂停招生；家政系、社会工作学系及社会福利行政学系合并为儿童福利系。

1952年院系调整中，中文、外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8系调至南京大学，电机、化工2系调至南京工学院，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工程、农业经济4系及农业专修科调至南京农学院，经济系调至复旦大学，教育、儿童福利2系及托儿专修科调至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及体育专修科调至华东体育学院，音乐系调至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播音专修科调至中央电影学校，校名取消，校址归南京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1913年，英美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基督会共同提议为“造就女界专门人才”而合办女子大学，并商定在南京选择校址。1915年秋正式开学，定名为金陵女子大学。1925年秋，上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所办的体育师范学校并入该校体育系。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学校经费绝大部分来自美国津贴，约占90%。

解放初，该校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工作学系；理学院有生物学系、化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体育系及体育专修科、音乐系、家政学系及托儿专修科。

1951年9月19日，正式与金陵大学合并，校名逐取消，原校址归南京师范学院。

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由美国长老会于1845年所创办。当时学生仅30人。1867年迁杭州皮市巷，改名育英义塾，

继迁塔儿巷,1885年更名为育英书院,开始有高等教育之计划,分正科预科,1890年增设英文科。1907年,学校购江干六和塔西新校址600余亩,1911年全部迁至新校址,因江为名,定名为之江大学。初设文、理两科。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州立案。1926年添设商科与建筑科。1930年改名为之江文理学院。1937年“七七”事变,部分迁屯溪,部分迁上海。1940年改组系科,设文、商、工3学院。1947年又改称为之江大学。

学校经费一半来自美国津贴,一半来自学杂费收入。

解放初学校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教育学系、政治系;商学院有工商管理系、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建筑工程系。

1950年度起文、商、工3学院调整为文理学院、增设数理学系、生化学系;财经学院设会计学系(附统计组)、企业管理系、财政金融学系、贸易学系、经济学系;工学院增设电机工程系。

自1951年2月起学校改为私办公助。1952年2月学校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由浙江省教育厅领导并开支经费,校址由浙江师院使用。当时,中文、外文、教育3系合并为浙江师院,土木、机械、数理3系调至浙江大学,建筑系于1951年寒假调至浙江大学,1952年暑期又调至上海同济大学,财经学院会计、财政金融、贸易、企业管理4系于1951年寒假独立成立浙江财经学院,1952年暑期又调至上海财经学院。

福建协和大学

1911年3月,由世界基督教大会教育组主席高绰约翰发起,征得福建省各基督教会的同意,在福州成立建校筹备会。1915年5月25日正式成立校董会,学校定名为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2月于福州仓前山租赁旧俄商茶行正式上课,吸收福州

英华、格致、三一及闽南英华、寻源 5 书院高年级学生为学校第一年级学生、总共 81 人，专任教师 5 人，兼任教师 4 人。1922 年于鼓山之麓、闽江之滨的魁岐乡建筑新校舍。

学校初设文、理学院，1936 年添设农学及农业经济 2 系，开办了农事试验场。1942 年成立文、理、农 3 学院，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外国语文学系、教育学系；理学院有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农学院有农艺学系、园艺学系、农业经济学系、农业教育学系。

学校经费 80% 来自美国津贴。

1950 年 12 月下半月起，该校即断绝外国津贴，由政府拨给经费。1951 年 2 月，人民政府批准接办协和大学，2 月 16 日正式成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合并筹备委员会。同年 4 月 12 日合并，接办完成，改名为福州大学。1952 年该校农学院与厦门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福建农学院，财经学院调至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调至该校，1953 年改名为福建师范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1905 年美国美以美女布道会派人到福建调查，决定在福建筹建高级女校。1908 年正式成立董事部，校址定在福州仓前山岭后。学校有文理两院 6 个系（即文史、西文、教育、数理、化学、生物等系）。

学校经费 80% 来自美国津贴，

1951 年 4 月 12 日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福州大学。原校名逐取消。

华中大学

该校系 1924 年 2 月由前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与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由美国圣公会、复初会、雅礼会及英国循道会、伦敦会合办。校址在武昌县华林街 1 号。初设文、理、商、图书馆 4 学科。成立 3 年后，因武汉政变停办。1929 年 8 月恢复。湖南雅礼大学与湖滨大学又相继并入该校，遂将原有 4 科改为文、理、教育 3 学院。

学校经费 80% 来自外国津贴。1951 年起拒绝接受美国津贴，同年 4 月起与美英断绝关系，由政府接办、资助。1951 年 7 月，私立华中大学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合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成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学校始确定为高等师范性质。1952 年在院系调整中，该校经济商业系和地理组调至武汉大学和河南师范学院，原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的化学、国文两系，广西大学的生物系以及湖北省教育学院并入，同年 11 月，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 年，海南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科、南昌大学俄文科、平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又相继调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校址仍在县华林。1953 年 10 月 20 日，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建于 1920 年，创办人系美国圣公会教士韦棣华女士。初附设于私立文华大学内，称私立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科。1929 年改称为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自 1951 年 2 月起即与美帝断绝关系，1951 年 4 月至 7 月，接受中南教育部的补助经费，改为私办公助。同年 8 月 16 日正式宣布由人民政府接办，由私立改为公立。1953 年 8 月并入武

汉大学,校名遂取消。原校址现住有华中师范学院和武昌 33 中教职工。

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美籍牧师哈巴在 1888 年创办的格致书院,地址在广州沙基金利埠。1898 年迁广州四牌楼,有学生 17 人,教员 3 人。1900 年迁往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1904 年在广州河南康乐购地盖屋,学校由澳门迁回康乐。1914 年开办文理本科,始称岭南大学。1921 年成立农科,1928 年增设商学院,1930 年增设工学院,1936 年增设医学院,1937 年增设理科研究所。

建校初在美国纽约设有董事局。学校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学杂费收入。来自美国的捐款,1928 年至 1929 年度仅占总收入的 0.28%,1929 年至 1930 年度占 3.88%,1931 年至 1932 年度占 2.25%。英圣公会、英惠师礼会、美长老会及天主教会仅派人到校教学,未提供经济补助款项。

1950 年 12 月起学校即拒绝接受外国津贴,1951 年 1 月开始由中南教育部补助,改为私办公助。1952 年 10 月在广东省各高校院系调整中,与中山大学及其他有关高校合并,其中农学院与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工学院与中山大学、华南联大工学院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组成华南工学院,医学院与中山大学医学院合并组成华南医学院,文理学院合并到中山大学,儿童福利组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调至华南师范学院,校址归中山大学,校名遂取消。

华西协合大学

1905 年由四川基督教浸礼会、公谊会、卫理公会、英美会联

合创办于成都南门外,后圣公会加入合办。1924年因招收女生,浸礼会、英美会等女布道会也参加办学。学校初设文、理、教育3科,分预科正科2级,各定3年毕业,当时仅有外籍教员10余人,学生10余人。1914年增设医科,1915年添设宗教科,1919年复增牙科,自1933年后调整为文、理、医牙3学院。至1949学生已达1404人,教师238人,职员143人,工警142人。

学校经费大部分来自外国津贴,1944年至1945年度外国津贴占总收入的92.2%,1945年至1946年度占96.13%,1946年至1947年度占80.86%,1947年至1948年度占87.9%,1948年至1949年度占87.33%。

1951年1月4日成都市军管会派代表到校实行军管,同年10月6日,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接办,改为公立,学校改称国立华西大学。1952年1月文学院教育学系合并至四川大学师范学院,3月牙学院更名为口腔医学院,牙周学系更名为口腔内科学系,文学院哲学史学系取消哲学组,更名为历史学系;10月文学院中国语文、外国语文、社会、历史4系及文化、边疆两研究所,理学院生物、化学、数理3系与博物馆调入四川大学,音乐组调入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经济系调入四川财经学院,重庆太学医学院调入该校,该校自是改为医科性质的高等学校,1953年10月6日,更名为四川医学院。

求精商学院

1940年秋,重庆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原有私立求精中学基础上办起了私立求精商业专科学校,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3科,校址在重庆市曾家岩。1947年秋改为私立求精商学院,分设银行、会计、工商管理及国际贸易4学系。1949年9月起学校曾停办,直至1950年4月才恢复。

1951年9月学校由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正式接办,改名为西南贸易专科学校,1952年8月,并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又并入西南财经学院(即现在的四川财经学院)。

主要资料来源:

1. 中央教育部保存的接办教会大学档案材料。2. 中央教育部保存的院系调整档案材料。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4. 李清悚、顾岳中:《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5.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6. 《中国高等学校简介》。7.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8.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9.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0. 《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旧中国的教会大学》。11. 陈垣:《辅仁大学反帝斗争胜利一周年》,《光明日报》1951年10月15日。12. 《文汇报》1951年1月31日:《回到祖国的怀抱》。13. 中山大学校刊1980年10月11日:《岭大小史》。14. 《文汇报》1951年3月10日:《接管后的协和医院》。15. 《新华日报(重庆)》1951年10月12日《记华西大学举办的一个展览会》。

[附录 2]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国教会大学史》，(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2.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3.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顾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4. 《中国近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
5.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章开源、林蔚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6.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李清悚，顾岳中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
7.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李桂林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8.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李楚材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9. 《燕大文史资料》，第 1—5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0. 《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1. 《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周洪宇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12.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13.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北京市档案馆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
14.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15.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16.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
17.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
18. 徐以骅:《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5期。
19. 吕达:《近代教会大学课程的特点及其评价》,《教育评论》,1990年第3期。
20. 曾钜生:《西方教会在华办学问题初探》,《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2期。
21. 梁碧莹:《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3期。
22.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
23.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4. 《从东吴大学看“收回教育权运动”》,《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25. 何迪:《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年第5期。
26. John. L.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27. *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 Shanghai, 1896.
28. L. Ethel wallace: *Hwa Han College—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 1956.
29.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27.
30. *An Appeal to Foreign Misson Boards for Trained Educator for China*,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 1902.

后 记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原已列为《近现代中国国情丛书》的一本。当时提出的编书要求是：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读性，对这三性应统筹考虑，既要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写完初稿。但这时丛书编委会的编辑计划却中途停止，小书因以搁置。尔后，在这个初稿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才形成现在这个册子。

在成书的过程中，我写过几篇关于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论战方面的文章，深感教会和教会大学的问题，虽在建国以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近现代教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专著和论文中，有过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然而就今天来说，是否还可以以更开放的态度和更广阔的视野，对教会大学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更为冷静的思考。我想，应当是可以的。这里，只不过是一次较系统的尝试而已。希望学术界和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这本小册子在撰写的过程中，曾得到我处研究生游和平、刘春湘、陈立龙、许晖、彭爽等的大力协助；初稿完成后，承蒙国家教委原高教司司长夏自强、著名教授龚书铎二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书稿由停顿到问世，承湖南教育出版社大力帮助，给以机会，特致深切的谢意。

谭双泉

1994年10月于长沙岳麓山

